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年 第6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3 吴志成,戴长征,方长平,袁正清,郭 锐,
黄鹏飞,信 强,梁 斌 / 站在历史的十字
路口——国家安全、全球发展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政治研究

- 44 理查德·萨克瓦 / “政治的西方”与“政
治的东方”——冷战后俄罗斯与西
方关系的根源
- 60 黄 晨 / 现代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
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国内与国际秩序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 87 门 镜 / 欧盟与俄乌冲突：困境与出路
- 107 宋黎磊 / “海间联邦”构想与波兰外交
思想溯源
- 129 熊启跃,赵雪情 / 美欧对俄罗斯经济制
裁的逻辑、影响及启示
- 157 张 煌,杜雁芸 / 俄美军用人工智能竞
争的战略稳定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附录

- 191 《俄罗斯研究》2022年总目录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У Чжичен, Дай Чанчжэн, Фан Чанпин, Юань Чжэнцин, Го Жуй, Хуан Пэнфэй, Синь Цян, Лян Бинь

Стоя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глоб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3)

Ричард Сак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Запад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осток: корень проблем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44)

Хуан Чэнь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ысл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ак либерализм формирует внутренни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60)

Мэнь Цзин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и конфликт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дилеммы и пути выхода (87)

Сун Лилэй

Концепция «Междуморье»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ольской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и..... (107)

Сюн Циюе, Чжао Сюэцин

Логика, влияние и уро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анкций, введённых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129)

Чжан Хуан, Ду Юньянь

Риск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РФ и США и пу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157)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2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Wu Zhicheng, Dai Changzheng, Fang Changping, Yuan Zhengqing, Guo Rui, Huang Pengfei, Xin Qiang, Liang Bin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Global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3)

Richard Sakwa

The Political West and the Political East: The Sources of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44)

Huang Chen

The Origin of Thoughts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How Liberalism Shap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60)

Men Jing

The EU and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ilemma and the Way Out (87)

Song Lilei

The Intermarium Concept and Origins of Poland's Diplomatic Thoughts... (107)

Xiong Qiyue, Zhao Xueqing

The Logic, Influ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U.S. and EU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129)

Zhang Huang, Du Yanyun

Risks to Strategic Stability of Russia-U.S. Competition in Milit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Governance Path..... (157)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国家安全、全球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志成 戴长征 方长平 袁正清
郭锐 黄鹏飞 信强 梁斌

【内容提要】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围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表述、新倡议，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安全面临严重失衡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变”的新论断和“四大赤字加重”的新判断，深刻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关于“四大赤字”的解决，和平是前提，发展是关键，安全是保障，治理是路径。中国致力于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夯实国际安全价值基础；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实现文明共存；推动“发展型和平”，以务实举措破解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难题；树立和增强自主创新意识，积极应对科技封锁的威胁。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把握大势，看清前路，在对外工作中始终处于主动。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 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中图分类号】D82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003(41)

*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特别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论及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与国际局势、国际秩序、全球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阐释和学习，形成了这篇笔谈文章。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

吴志成*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外工作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仅总结了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全面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辉煌成就，对新时代新征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战略谋划和全面部署，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表述、新倡议，是一篇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勇毅前行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的新表述，^①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展现了我们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认识的新高度和实践推进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5 次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这一郑重宣示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宗旨原则和使命责任。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性风险挑战也变得日益复杂严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强调人类整体命运与利益休戚与共，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崇高目标，也是世

*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2 页。

② 同上，第 60 页。

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指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共同奋斗的方向。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双边、地区和领域等不同方面，谋划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在双边层面，推进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等 12 个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地区层面，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等 11 个区域命运共同体，以及在卫生健康、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安全、发展等领域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了从“一方领唱”到“众声合唱”的多重跨越。这一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决议或宣言，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凝聚了国际共识和各国人民的力量，彰显了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思想感召力。特别是在疫情肆虐、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命力不断彰显，已经为全球合作提供了强大动力，积累了宝贵经验，必将持续为增进全人类福祉发挥重要作用。对此，印尼前国会议长马祖基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满远见，是中国领导人为人类实现长远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以充满哲理的论述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期待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地球家园。^①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新论断，^②从而将中国与世界、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贯通在一起，彰显了我党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天下胸怀和既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三变”新论断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四大赤字加重”新判断，深刻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

① “专访：期待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访印度尼西亚前国会议长马祖基·阿利耶”，新华网，2022 年 11 月 13 日，http://m.news.cn/2022-11/13/c_1129125314.htm

②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4 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①。“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②。这是对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世界格局演变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人类进步潮流和历史大势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也是谋划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必须充分考虑的时代前提。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和平与发展遭受严重挑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面对当下世界百年大变局、世纪大疫情与俄乌冲突的交织叠加，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动荡变革、不稳定不确定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始终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脉搏，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正确的历史航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③的新原则，不断丰富和巩固中国外交的宗旨原则，塑造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风范。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在他国后面亦步亦趋实现真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3 页。

② 同上，第 60 页。

③ 同上。

正的强大和振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坚强基石和根本方针，是我党百年外交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结晶，也始终贯穿中国外交的整体历程，必须不断发扬光大。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立场，制定自己的外交策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二十大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②，展示负责任的和平发展大国形象。

2022年初俄乌发生冲突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各方停火、止战、和谈，强调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强调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这“四个都应该”较好地平衡了法与理、利与义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处理俄乌冲突的客观公正立场，维系了与各方关系的总体稳定。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卷入冲突、没有参与对俄制裁、没有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的国家，既与俄罗斯保持着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援助，得到相关各方的理解，美欧也没有找到对中国实行延伸制裁的借口。即使中美两国对待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态度并不一致，但2022年11月14日的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在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本国利益与相关国家利益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契合点，超越了非黑即白的简单选边思维，反映了中国外交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决定立场和政策的风范。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② 同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这两个全球新倡议。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类安全的理论升华和实践拓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新路径新平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面对全球发展治理的复杂严峻态势，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站在国际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倡议为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擘画了蓝图，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安全赤字更加严重。为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这一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引，以相互尊重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不仅符合各国人民对加强全球安全合作的普遍期待，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也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发展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应用成果，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命运与共的高度统筹国内与国际、贯通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智慧。推进落实两大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安全共同体，要求国际社会以合作应对挑战，以行动加强治理，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特别是世界大国更需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展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守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和态度，既是两大

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践行两大倡议、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支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的新主张，展现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这种新变化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总体上看，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核心作用发挥得不够，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还未能实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还受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严重干扰。西方一些国家依然固守冷战思维，信奉零和博弈逻辑，维护自身强权霸主地位，不甘心接受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和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的现实，阵营对抗特别是大国博弈竞斗的风险上升。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价值观差异被蓄意夸大，国际文明交流对话体系受到严重扭曲，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当下大部分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机构主要是由美西方大国主导建立，没有反映和体现当前改善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不足。一些全球治理制度的实际效能存在许多短板，运转不灵、作用失效的情况经常发生。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和迫切改革的需要，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与核心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主张国际上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反对将实力地位视为“有道理”、“有道理”的判别标准，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多边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2 页。

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的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反映国际力量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各国的意愿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①的新呼吁，站在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和国际社会精神道义的制高点，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的价值指引。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议者、弘扬者和践行者。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也是各国共建更加美好世界的普遍信念和价值取向。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和平和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安全保证与物质基础，公平和正义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制度与秩序保障。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包含的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彼此紧扣，形成了一个内涵十分丰富、逻辑极为严密的有机整体，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晰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契合世界人民的精神认同和价值追求，有助于实现中国价值理念与世界价值共识的对接共鸣。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和构建实践的深化拓展。各国人民只有坚持和奉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在获得全球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才能在全球多元领域落地生根，在不同层次深化走实，才能真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转变成为人类的现实福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3 页。

② 同上。

后俄乌冲突时代如何构建国际新安全格局*

戴长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吹响了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深刻强调了构筑“新安全格局”的重要性，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①。当今时代，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俄乌冲突久拖未决，大国关系剧烈变动，全球核安全态势令人担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安全面临严重失衡风险。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思考如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构建后俄乌冲突时代国际社会的新安全格局。

一、当前国际安全格局亟需重塑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均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大国竞合关系加速演进，欧亚大陆安全态势持续恶化，区域极端势力不断兴风作浪，非传统安全问题冲击传统安全体系，“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繁发生……国际安全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从全局上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重塑国际安全格局，目前国际安全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国安全格局加速失衡，新冷战阴云初现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可以被视为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内生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经历了30余年被打压之

*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数字环境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策略研究”，以及北京市对外开放研究院高端智库重大项目“统筹北京安全与发展研究”、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中国之治’及其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戴长征，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53页。

后，俄罗斯再也不愿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安全格局中处处退让，不愿以牺牲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换取与美国的“貌合神离”。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逐步民粹化、右倾化、保守化，美国又将经过改革开放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定义为新的竞争乃至遏制的对象。特朗普政府发动的中美贸易战、拜登政府全力推进的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竞争塑造”（Compete to shape）战略，都使中美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了充满了不确定性。奠基于大国合作与谅解基础之上的二战后国际安全格局，正被西方大国一步步摧毁，中美关系、俄美关系，甚至西方大国之间、西方大国内部的关系，都呈现出严重失衡态势。新冷战阴云出现，人类必须避免大国关系再次走向对抗、冲突，甚至战争。

（二）欧洲安全架构面临瓦解，区域冲突危机升级

俄乌冲突的发生，在区域安全层面产生的直接影响在于瓦解了原有的欧洲安全架构。特别是随着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战略疲态的不断显现，原有的以俄罗斯为重要一极的欧洲安全架构全面崩溃。不仅是乌克兰力图加入北约，甚至被称为“千年中立国”的芬兰和瑞典也选择加入北约，彻底放弃自身的中立国身份。当下，伴随俄罗斯撤出赫尔松等战略要冲，虽然后俄乌冲突时代的俄罗斯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自身在欧洲区域安全中的自主地位尚难确定，但伴随俄罗斯战略收缩而带来的安全真空的出现将成为某种事实。包括东欧、中东、中亚、北极等在内的广大“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局势均不明朗，区域冲突危险急剧上升，极易产生区域安全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安全议题不断拓展

当前，国际安全所涉领域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两分法界定，各类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构成复合叠加式的影响。一方面，诸如俄乌冲突等传统安全事件正在导致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危机，诸如粮食紧缺、能源匮乏、难民危机等衍生性安全问题正在冲击着区域与全球安全格局，造成系统性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发酵，不仅在非传统安全层面产生全球治理难题，更会进一步诱发传统安全问题的再现，带来冲突、动荡甚至

战争。特别是随着全球性交往的不断加深，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肆虐，以及星链卫星等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各国日益意识到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数字安全以及极地安全、深空安全、深海安全等已经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稳定所必须关注的领域。

二、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导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棋若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国际安全格局的调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构建新安全格局理念的提出，不但是基于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而且由于其指涉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当前调整和重塑国际安全格局也将起到重大指引作用。这源于新安全格局理念的三大理论意蕴。

（一）新安全格局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价值

关于新安全格局的表述最早出现于2021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时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①。此后，2022年10月，关于新安全格局的表述在二十大报告中被重点提及，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之一。从其思想渊源角度来说，新安全格局的提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与实践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设的理论结晶，集中体现了对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有效解决现实安全问题、提升整体安全水平的理论思考。从根本上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新安全格局理念来源于实践，经过了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检验，并在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引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2021年咨询报告》，习近平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11月1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8/content_5651753.htm

（二）以新安全格局统合国际国内两大安全空间

当今时代，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出的问题，究其根源并非仅仅在于国际层面，更与相关国家的国内安全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西方大国国内政治思潮的演化、重点区域国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国家破产等问题，均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新安全格局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互呼应，充分考虑到国际国内两大安全空间在深层次存在的危机传导机制，清楚地认识到，片面追求国际或国内的安全，是难以实现整体层面的可持续安全的。因此必须高度统筹两大安全空间，切断安全威胁的相互传导路径，这对于解决当前出现的国际安全格局失衡态势至为关键。

（三）新安全格局聚焦系统性安全问题

新安全格局理念关注的安全议题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致，涵盖众多相互联系的国际国内安全议题，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思维特点。就国际安全而言，一方面，新安全格局高度关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问题，重在夯实传统安全领域的稳定框架，为系统性安全的实现构筑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新安全格局也深度聚焦各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以“风险-韧性-能力”的全流程思路发现、处置、反思、检讨安全问题，有效提升对新风险的应对能力。与此同时，新安全格局理念的系统性也体现为“见树木思森林，览一隅而知全局”，体现为增强统合能力来维护整体安全格局的稳定，实现国际总体安全，这对于应对和解决当前国际安全格局的系统性困局尤为重要。

三、构筑国际新安全格局的策略建议

当今时代，国际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复杂多变，如何创新原有国际安全理论并探寻具有充分兼容性的安全观，以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是当前推动国际安全格局调整、构筑全新国际安全架构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将中国国家安全整体认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新安全格局理念的进一步明确，则为包括国际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领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具体而言，现阶段构筑国际新安全格局可在三大路

径上着力。

（一）打造多元化工具箱，筑稳国际安全的压舱石

全球化时代，一般认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会成为国家间关系稳定的重要压舱石，对于国际安全起着关键的作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在认识中美关系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方面，会比较强调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因素获得了超越其他问题域的影响力。但近年来，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加上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的不断发酵，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安全压舱石的作用明显下降。为此，构建国际新安全格局不仅需要关注经济，也需要打造涵盖多元领域的国际安全工具箱，通过更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与相互依赖来真正筑稳国际安全的压舱石。

（二）高扬全球安全倡议，夯实国际安全价值基础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冲突久拖未决，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持续升级，大国关系动态调整，国际安全态势动荡加剧。在此关键时刻，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主张，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安全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安全威胁、有效提升国际安全水平的诚挚愿望。现阶段，进一步高扬全球安全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必能不断夯实国际社会新安全格局的价值内核。

（三）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彰显中国方案的力量

俄乌冲突是当前国际安全热点问题的重中之重。现阶段，俄乌冲突对国际安全格局所产生的蚕食作用日渐凸显。俄乌冲突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直接当事方充分进行立场的调和，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促谈作用。而中国提出的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主张，也能够进一步彰显中国在国际新安全格局构建中的重要引领作用，体现国际安全领域中国方案的活力，为国际新安全格局的塑造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方长平**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与稳定发展，将大国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总体布局的优先和关键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①。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大国关系的新挑战，对大国关系提出的最新论断。理解二十大报告对大国关系的新论断、新表述，对于我们今后更好地运筹和发展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国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意义

（一）大国关系处于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关键地位”

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大国关系具有的全局性、战略性与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质和总体状况。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何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不仅攸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也影响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各大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将大国关系置于中国外交的“关键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当时的主要大国苏联结盟，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也促进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与主要大国美国关系的解冻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直接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与日本、欧洲等建立和巩固外交关系，也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建交，并于 1971 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得以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进程中的中国角色研究”（项目批准号：19AGJ001）的阶段性成果。

** 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1 页。

贸关系，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稳定，不仅影响大国关系的本身，还对中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乃至与多边国际组织的关系，起着牵引和带动作用。

（二）大国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是后冷战时期的美俄、美日、美欧关系，以及进入新时期的中美关系，都直接影响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冷战时期，正是美苏对抗导致了国际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双重挑战。20世纪80年代后，正是邓小平同志对美苏打世界大战可能性小的重新判断，确立了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冷战后，随着大国的集团对峙结束，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1世纪初，基于对国际环境特别是大国战略关系的综合分析，我们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进入新时代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美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美国在奥巴马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拜登视中国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全方位施压，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严重冲击。

（三）大国关系推动了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演变

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后冷战时期的一超多强，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更加突出，国际格局出现了新一轮重组。大国关系不仅直接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也塑造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必须承认，由于自身拥有的强大实力和影响力，大国在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方面确实具有绝对优势。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都是战争结束后胜利的大国之间根据自己或者集团利益对世界秩序做出的制度性安排，无论从价值理念还是从制度设计上来看，世界秩序都明显打上了主要大国的印记，体现了大国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偏好。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秩序面临着新的重构。推动世界秩序

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二、中国政府关于大国关系判断表述的演变

大国关系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一直占有关键地位。但由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大国关系本身特征的变化，大国关系的目标以及我们在不同时期对大国关系的诉求也有所差异，因此判断大国关系的表述也有所不同。

领导人讲话或者党的文件是我们对大国关系表述的主要体现。最初，大国主要指的是发达国家。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①。2003 年，胡锦涛同志在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布局^②，把大国置于中国外交布局的“关键”地位。2006 年，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③的外交总体布局。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继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④这时重点使用的还是“发达国家”的表述。

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关于大国关系的表述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二）”，《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②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91 页。

③ 同上，第 508 页。

④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16 日第 4 版。

⑤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9 日第 3 版。

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界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他指出，这是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发表演讲时再次指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②。这表明，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设定，不仅是不冲突不对抗，还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也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大国关系依然处于重要地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基于大国关系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来出现的新动向，我们对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又有了新的判断。报告提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④，在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的提法。

尽管不同时期，我们党和政府对大国关系内容的表述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党代会报告的表述，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都处于中国外交布局的优先地位，其核心内涵是追求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推动大国关系的战略稳定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

三、大国关系的新判断及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

① 详见“从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跨越太平洋的合作——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人民日报》，2013年6月1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第2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1页。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①的新判断。这一判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既是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大国关系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做出的新判断，也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发展大国关系的指导。

（一）和平共处

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同印度、缅甸一起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大国关系中和平共处的重要性，首先是因为大国之间和平共处依然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过去几年里，大国关系中出现的对和平共处的挑战更加突出了。

从历史上看，大国关系演变一直是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性因素，大国关系的复杂互动与战和变化，构成了大国兴衰的“历史主轴”。大国之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共处，无论是一战、二战这样的热战模式，还是集团对峙的冷战模式，都将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主导的集团对抗的终结，大国关系似乎迎来了和平共处的可能。但是，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冷战思维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随着中国的稳定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开始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渲染中美关系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战略竞争将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中国奉行“极限施压”政策，造成了中美关系的极大恶化。拜登政府并未实质上改变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对抗政策，选择刻意放大中美意识形态对立，并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胁迫各国选边站队，不断拉拢盟友编织对华竞争“小圈子”，并且动摇与掏空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挑动台湾问题。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并对华施加贸易战、单边经济制裁等压力，渲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甚至谋求对华“部分脱钩”，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同时，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俄美、俄欧关系的恶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大国关系恶化的挑战性与冲突性被放大。二十大报告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不发生冲突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底线，也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1 页。

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相互关系的重要基础。

（二）总体稳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以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国战略机遇期等相关论述，更加强调了和平共处对于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性，突显了新挑战、新问题对于国际关系格局演变与大国关系分化组合的复杂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尤其是保持和维系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塑造繁荣友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中美关系为例，我们要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特别是要保持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促进两国多领域对话，实现中美和平共处。中美以何种方式相处，能否实现和平共处，事关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美国以所谓的“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牵动中美关系下行态势明显，给两国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动荡性愈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是十分紧迫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格局，不仅包括中美关系的稳定，也包括中国同其他大国的良性互动与关系稳定。例如，构筑与助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维护好、发展好同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相互协作等。不仅如此，其他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与互动变化，也是总体稳定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俄乌冲突背景下，美俄、欧俄关系急剧恶化，大国冲突风险不断上升，全球发展利益与世界和平环境面临较大风险与不确定性。美俄战略稳定关系的存续、削减战略核武器对话机制的维系，对于降低全球核风险、形成“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全球共识至关重要。大国关系的相互关联与在世界范围内的全局性影响，也是塑造和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当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格局的现实意义愈益突出。

（三）均衡发展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关键的一组双边关系，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十分重要方面。但中美关系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促进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的构建，不能仅仅将目光停留或聚焦在中美关系上，不能仅仅重视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也要看到中国同其他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兼顾与其他大国的良性互动，均衡发展。中俄、中欧、中日、中印等大国关系必须予以重视，其他大国间互动关系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应增加对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关注，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新格局。要不断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增进两国战略互信与互利合作；要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新高度，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助推中欧关系取得新进展；要保持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稳定，尊重历史、面向未来，构筑新时代下互利共赢的中日关系。实现大国关系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入全面开展，进一步拓宽中国对外交往空间，增进大国战略互信，维护大国关系稳定与良性互动，在良性互动中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袁正清**

当前，全球性问题加剧，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探索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合作基础成为各国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在“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再度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条基于中国文明观的可行方案。

一、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全球性挑战意指关涉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亟需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各类国际危机叠加，世界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世界正处于危险境地，国际合作遭到破坏，地缘政治分歧不断加深，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气候危机持续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等多重挑战，使得可持续发展目标难以为继。^①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世界经济脆弱性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治理严重缺失、粮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等人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77）的阶段性成果。

** 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① See António Guterres, “Secretary-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77th session of UN General Assembly”, the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14, 2022,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22-09-14/secretary-generals-opening-remarks-press-conference-the-77th-session-of-un-general-assembly>

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①总体而言，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发展、生态与资源三大综合范畴，表现出长期化、外溢化、复杂化的整体趋势。

第一，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伴随中美之间的竞争以及乌克兰危机的不断演进，大国之间的对抗气氛进一步加剧，对国际合作形成了严重阻碍。同时，新冠病毒的变异及其带来的连锁次生灾害使得非传统安全风险愈加凸显，对各国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乌克兰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引发各国的普遍担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粮价持续飙升。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2 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2021 年，在 53 个国家或地区约有 1.93 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危机之中，较 2020 年增加了近 4000 万人。^②该数字自 2016 年以来已增加了 80%，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且急需粮食援助和生计支持的人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在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下，2022 年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持续恶化，在全球治理及国家治理层面均对各国形成极大压力。

第二，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受产业链供应链不畅、通胀攀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面临下行风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2 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 3.2%，较 1 月预测值下调 1.2 个百分点，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2.7%，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持续走低。^③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多边主义及多边贸易体制也正在经受严峻挑战。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占比日益加大，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未充分保障全球南方的发展权益与诉求，这不仅制约着多边主

① 参见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2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news.cn/2022-11/15/c_1129129807.htm

② See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2022”, *World Food Programme*, May 4, 2022, 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38913/download/?_ga=2.49346406.131396248.1670044499-362443907.1670044499

③ Se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022,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义的积极效用，也阻碍着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南北合作。

第三，生态与资源挑战交织，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带来直接影响。传统工业化进程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日益显现，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森林资源退化、水资源紧张、海洋资源过度利用及海洋污染、能源与矿产资源耗竭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与各国的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社会民生密不可分，正在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根据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2019年发布的全球《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报告，人类目前所使用的资源超出地球生态系统能够再生资源的74%，每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都标志着人类已经使用了地球整年的全部再生生物资源，这意味着自地球生态超载日起，人类将在耗尽全年自然资源分配量的情况下进入生态赤字状态。^①自1970年12月29日地球首次进入生态超载状态以来，超载日每一年都快速提前，2022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已提前至7月28日。生态与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结表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影响深远，亟需各国共同应对，同舟共济。

二、全球性挑战下的“四大赤字”

面对各种交织叠加的全球化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当前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的“四大赤字”，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②这一重大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安全”作为新的重点加入全球治理的赤字问题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③。背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① See “Ecological Footprint”,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our-work/ecological-footprint/>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06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面临全球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挑战，唯有正视全球治理体系和进程中的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变局，把握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

和平赤字指涉全球性挑战中的政治与安全问题。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强权政治等西方传统国际关系思维窠臼的影响下，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依然猖獗，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发展赤字**指涉全球性挑战中的经济与发展问题。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分配不平等、发展不平衡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安全赤字**指涉全球安全问题愈加凸显且逐渐泛化。各类安全挑战更具多样性、联动性和外溢性，国际安全风险加剧，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治理赤字**主要指涉在当前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威胁持续蔓延的形势下，全球治理体系及多边机制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中的缺失和不足，不仅体现在治理成效上，也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四大赤字”的日益加重指向了更为根本的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问题。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民粹主义、排外主义、霸权主义仍在蔓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更为突显，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严重侵蚀。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须秉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建立更加深入的理解与更加牢固的认同。在“四大赤字”的解决过程中，和平是前提，发展是关键，安全是保障，治理是路径。为破解“四大赤字”，更好地推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应坚持对话协商，促进多样化文明之间的共存、交流与互鉴，厚植互尊互信，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建立更加深厚稳固的合作基础。

三、基于中国文明观的全球治理方案

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

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①。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中实现共商共享、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中国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中国方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安全与发展。这一方案倡导世界各国在行天下之大道的时候，尊重文明多样性，汇聚不同文明的宝贵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所秉承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份以文明为内核的行动指南。

第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理性看待并接纳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地践行互尊互信，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高同各国之间的合作水平。从既有的全球治理实践来看，良好的互尊互信能够为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基础和保障。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成果，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并推进新多边主义奠定了基石。通过在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具体领域当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也能够赋予伙伴关系更加丰富的意义，使得中国与各伙伴国之间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产生联动效应，共享全球发展与治理成果，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公平正义。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第二，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正视各方关系以及其他领域的矛盾与分歧对共同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发掘文明差异性中的正向效应。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差异也并非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应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目前广泛存在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霸权主义给全球治理体系 and 世界秩序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①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国政府网，2021年1月25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

也从根本上威胁着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对此，各国应当在对彼此文明间的共性及差异有总体把握的同时，重视关涉国际社会稳定和人类安全的关键议题，寻求更多交流与合作的契机，使文明差异性的正向效应发挥引领作用，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劲动能。

第三，超越文明优越，实现文明共存，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各国一道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不断强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凝聚力，使得全球治理更加合理有效，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近年来，各种全球性挑战的不断出现，既突显了对于全球治理的巨大需求，也反映了当前全球治理的滞后与低效。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大国，这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与失衡。不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地区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意味着其对于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认同，而有效的多边合作需要全球治理机制和规范的支持。因此，未来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应坚持新多边主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以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平等化为原则，不断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凝聚力，使全球治理在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中更加合理有效。中国兼具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等多种身份，能够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实践为世界文明提供更具中国智慧的新方案，在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同世界各国努力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中国探索

郭 锐 黄鹏飞*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大格局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奋斗方向，擘画了宏伟蓝图。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促进世界和平和实现共同发展，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既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重中之重。

一、从消极的“安全化和平”转向积极的“发展型和平”的时代诉求

二战结束后，虽然没有再次爆发世界性战争，但因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历史纷争等矛盾的长期无法调和，世界范围内冲突不断，世界和平与稳定备受冲击，并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消极因素裹挟，世界和平被“安全化”动机左右，全球安全形势依旧严峻。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赤字和全球安全赤字的日益交互作用，在深层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世界性、时代性、历史性难题。

全球安全赤字在根本上源于全球发展赤字。俄乌冲突的持续化加上新冠病毒肆虐，导致全球经济链条断裂，国际发展合作动能减弱，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构建陷入停滞，全球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全球新时代的课题已经转化为深层次安全理念的外延化、安全目标的可实现化和安全手段的多元化。可以说，新时代呼唤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内涵化转型，即消除影响全球发展的顾虑，巩固维系全球安全的根基，丰富维护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手段，

* 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鹏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减少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制约因素，持续降低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风险水平，最终满足世界向“发展型和平”转换的时代诉求。

实际上，促进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非但不是零和博弈和单边主义的关系，而且还是推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场域，是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国际准则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有助于构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同国际形势背景下，不同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作出的重大判断、发出的重要倡议，不断丰富和传播着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问题的中国破解之道，持续为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从共同发展的倡导到提出面向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再到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的正式提出，无不体现了大国担当的中国风采以及在探索“发展型和平”道路上积极进取的中国作为。中国和平发展始终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中国不但强调自身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社会等要素的和谐和平发展，而且还是引领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以及引导全球安全走上对话、合作、和平新道路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建设者。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新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为人类社会通往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正确路径。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为根本遵循，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以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准则，以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为实现方式，以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为实现路径，内涵十分丰富。上述“六个坚持”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指明了破题方向，也为促进和维护全球安全明确了进取指向。而全球发展倡议则聚焦于世界各国发展的核心矛盾和关键问题，主张以全球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行动导向。可以说，全球安全是全球发展的先决条件，全球发展是全球安全的破题基础、长远目标和必行思路，两者的内在辩证关系和积极的建设性互动，契合时代诉求，有助于当今世界从消极的“安全化和平”转向积极的“发展型和平”新方向。

二、破解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可持续难题的必然要求与务实举措

当前，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遭遇多重困难与挑战。国家间结构性失衡、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生态气候变化、通货膨胀、数字鸿沟、贫困饥饿、大国战略竞争、冷战思维抬头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严峻局势。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备受阻碍，世界和平与稳定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的共有解决方案，全球性难题需要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全球规范，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优化全球发展模式和建立健全全球安全体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为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争取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新局面贡献了中国智慧。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新的重大主张，旨在促进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展领域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不断凸显，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无法置身事外。世界各国应秉持搁置争议、化解分歧、寻求共同立场的原则方针，发挥各自优势，彼此和谐相处，着力关注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迫切需要，共同携手应对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的严重问题，协力推进共同包容发展新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发展领域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创新驱动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重大理念，以对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要取向，以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理念，旨在进一步加大自身和全球重点领域发展的资源投入，为推动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优先，强调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国内大循环为内生动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中国并未把发展和增长前景仅仅定位于国内层次，而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等务实举措不断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将自己视为全球共同发展的建设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

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为破解全球安全和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理念与解决之道，彰显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的一贯立场。国家安全利益只能在国际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和反复对抗中实现，只有与时俱进地树立新安全观，积极扩大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探索安全合作新方式，才能够促进世界和平与实现普遍安全。全球共同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根本保障，也是解决复杂敏感的全球安全问题的关键要素。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长期严峻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①，这是切实维护各国主权、安全、核心发展利益以及务实促进和确保全球安全的根本原则。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实现方式，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最终目标。^②党的二十大报告以高瞻远瞩的全球视野、务实踏地的战略举措，真正地着眼于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长远目标与现实需要，通过战略统筹、创新驱动，不断探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共商共建共享之路。可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破解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难题开出了良方，是新时代中国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宣言书。

三、以制度性开放和制度性合作为战略引领与保障， 开创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新局面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谋和平发展、求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断发展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在塑造国际规范、引领国际议程、传播国际话语、处理国际事务、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等关键方面，越来越自信、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62 页。

② 参见同上，第 62-63 页。

自觉和自强。近十年的成功实践和巨大成就，不断丰富和强化了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中国主张，其重大成果已经广泛体现在全球认同、全球规则、全球合作、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这为中国以制度性开放和制度性合作为战略引领与保障、更好地提供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的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近十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合作平台成为践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全球发展新理念的活跃载体。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生效，同金砖伙伴一道稳步推进扩员进程，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发展惠及全球的负责任大国本色。此外，中国通过创办全球发展高层会议，设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创建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与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机构联合筹备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联盟（TVET），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与十余个国家合作生产新冠病毒疫苗，增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和药品供给，举办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共同发起全球青年发展计划，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及与全球伙伴共同构建农业、教育、卫生、生态等领域的多边合作网络等，这些举措集中体现了中国制度性开放和制度性合作的新理念、新作为、新进展，其重要成果也越来越多地以普惠化方式传导至全球各地，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更多认同。中国依托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国际开发协会（IDA）、全球环境基金（GEF）等国际机制，积极致力于为国际发展援助和全球发展合作投入更多资金、输送更多资源。中国以实际行动贡献世界，以积极的建设性、创造性姿态不断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旨在以共同发展为主线，持续引领世界各国更多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一心一意谋发展目标，而不是对各类安全问题过于敏感和耿耿于怀，不断诱发无休止的纷争和冲突。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朝着“安全化发展”向“发展化安全”转型，

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续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中国是一个有担当的、负责任的大国，愿意为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国策宗旨，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以深邃的辩证思维和富有远见的战略布局，紧紧抓住长期影响全球发展的“安全化”因素这一牛鼻子，同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理路来纾解全球安全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背后的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可以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也是对全人类提出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而妥善破解之道则在于高质量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在这方面，中国应继续积极有为、锐意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全球安全。

科技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安全前沿”*

信 强 梁 斌**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国家安全的内容单独成章，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更是为党和国家未来如何全面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针。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对我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也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新一轮技术变革主导权的掌握将从根本上决定未来产业经济发展的格局，进而推动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甚至将重塑全球经济版图和国际权力结构。有鉴于此，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成为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焦点和前沿。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科技安全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早在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便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 年 7 月 1 日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则从法律层面，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 11 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

* 本文是信强任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21&ZD170）的阶段成果。

**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梁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行了明确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①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期国家安全特征和规律的科学把握，也为指导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和 Work 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首先，科技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十分丰富，要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并高度强调各个领域安全的有机融合和统一。其中科技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下的决定性构成要素。随着中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时期，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科技封锁和战略打压不断升级，更加突出了科技安全对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科技安全，才能在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之际，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其次，科技安全对其他安全领域有巨大的辐射和联动效应。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安全都需要科技安全的支撑和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突出强调的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能源资源、核、太空、海洋、粮食、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安全，更是直接和科技安全紧密关联互动。在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科技能力的提升对于我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均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最后，科技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底线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如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之际，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②，赋予了科技安全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经历过近代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国深知，强大的军事实力永远是国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52 页。

② 同上。

生存的根本保障，而只有以高科技为后盾，才能为军事能力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二、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直接影响着大国战略竞争乃至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多年来，中国始终对科技事业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和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多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已然昂首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对于我国而言，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维持科技竞争力，尤其是有效应对科技领域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威胁，不仅事关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议题。

然而，纵观我国科技安全总体形势，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实力仍有不小的差距，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也成为部分国家制约中国发展、威胁中国安全的一张“王牌”。远有“巴黎统筹委员会”、“瓦森纳协定”的限制，近有美国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持续对我半导体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诸多高科技领域的无理打压，均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毋庸置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对华科技的遏制、封锁和“脱钩”政策，已然对我国科技安全构成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威胁，为此我方也必须未雨绸缪，沉着应对，才能有效维护我国科技安全。

首先，要清晰研判美国对我国科技遏制的政策走向。时至今日，美国对我国的科技遏制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战略层面的“科技脱钩”政策，亦即大力限缩甚至取消中美之间与敏感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相关的跨境贸易，管制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商品、技术、资本与人员等方面的交流，包括中止甚至取消政府层面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二是战术层次的“小院高墙”政

策，亦即在特定科技领域实行“选择性”脱钩断链。根据这一政策，美国政府将主导确定与所谓“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明晰的科技与产业边界，建立高耸的技术贸易壁垒（即“高墙”），以便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采取更严苛、更强硬、更大力度的对华封锁措施，而“小院”之外的其他科技领域则可以酌情保持与中国一定程度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要精准把握美国对我国科技遏制的政策手段。当前，美国对我国的科技遏制战略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来加以实施。一是推行更为严格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和禁运，目标不仅是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还不断延伸至广阔的民用科技领域，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来加强管制力度。二是竭力削弱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包括通过渲染所谓“中国科技间谍”，对相关领域内赴美求学和交流的中国学生、学者横加限制，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对美国科研机构内与中方存在合作关系的科研项目与相关人员进行“猎巫式”的司法调查。三是精准狙击中国高科技企业，其中以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极限封杀”最引人注目，而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我打压的力度不但有增无减，而且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最后，要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手对我开展科技遏制的态势。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其传统的外交优势与手段，推动甚至是胁迫其盟国共同对我国进行科技遏制。例如在特朗普任内，尽管美国的同盟-伙伴网络因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而略有松动，但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美国从未放弃要求其盟国联手加强对华科技打压和限制。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竭力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网络，并加强与其北约盟友的战略协作，包括设立美欧贸易与科技委员会，以合作应对所谓的中国“科技挑战”。具体而言，美拉拢西方国家进行对华科技遏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着力加强与盟国的合作，以经济利益与技术利益为诱饵，力争在中美科技竞争进程中将其盟国纳入美国的阵营。二是竭力挑拨其盟国与我国的关系，以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牌为筹码，敦促其盟国保持对华疏离，甚至迫使其盟国大幅减少对华科技交往与合作。

总体来看，美国近年来不断收紧对我国的科技交流窗口，影响所及，不

仅给我国企业正常的研发和生产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更是对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开展造成了重大阻碍。

三、维护科技安全前沿，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美国近年来对我发起的“科技冷战”固然使我国科技安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但与此同时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促使我国进一步树立和增强自主创新意识，激发和推动国内科技创新的步伐，积极寻求自主可控替代方案，以便尽可能早日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自立自强，尽快补强我国科技安全的弱点和缺口，从而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的科技屏障。历史终将证明，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应对方略，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技术遏制无法阻挡中国的前进步伐。

首先，从底线思维出发强化捍卫科技安全的能力。历经多年的发展，我国业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意味着我国在诸多行业不仅拥有较为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一批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而且为我国科技安全提供了极端情况下的终极保障。但与此同时，随着科技领域成为国际战略博弈日益重要的场域，各国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也变得空前激烈，中国由于高科技底子薄，短板多，也屡屡陷入被“卡脖子”的窘境甚至险境。事实证明，无论产业规模多么巨大，但是如果供应链的“命门”以及核心科技始终掌握在别国手中，那么一旦面对外部的极限施压，必将对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28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明确强调，“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①。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和变革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纷至沓来，未来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势必会遭受更强烈、更极端的打压，为此，二十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48页。

大报告明确要求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重大的、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

其次，要坚持以原始创新完善科技创新系统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质上依赖于创新，动态维护国家科技安全同样依赖于创新。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已经从 2012 年的第 32 位提升到 2022 年的第 11 位，同时我国的专利申请量连续 11 年居全球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一系列战略性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长足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使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步从依靠价格优势、规模优势转向依靠创新优势。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机制，通过创新实现科技进步，通过创新谋求科技安全。以此遵循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①。

最后，秉持开放心态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当代高新科技的发展无疑得益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但是随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依靠其长期形成的科技主导地位，“量身定制”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采取排斥、孤立、封锁甚至遏制政策，这些都对我国科技发展进步造成了重大阻碍。针对美西方国家掀起的这股逆流，我们应该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明确要求，在捍卫我国科技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借以有效地破解部分国家对我发起的科技遏制和围堵。当前我国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33 页。

水平、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正在形成，未来仍需以更开放的姿态，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在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中不断提升科技实力，维护科技安全以及国家总体安全。

面对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安全的统筹规划，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安全前沿和焦点，切实维护科技安全不仅攸关我国的经济民生、社会稳定，更攸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面对国际风云的变幻，我国唯有筑牢科技安全的防线，才能为国家总体安全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

【Abstract】In October 2022,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successfully hel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elivered a report, entitled “Holding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o the conference. In this report, centering on the theme of “promoting world peace, development and making endeavor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series of new theories, new expressions, and new initiative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enriched and developed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facing serious imbalance risks. The report put forward new judgments of “three changes” and “four major deficits”, and profoundly analyzed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oday and new challenges whe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garding the resolution of the “four major deficits”, peace is the premis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security is the guarantee, and governance is the path.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coordination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resolution of hotspot issues, and consolidating the valu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ina respects the independent choice of development paths and models by all countries,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realizing the co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s. In addition, pushing forward “developmental peace”, China takes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security. China establishes and enhances the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technological blockade. Looking seriously into the report and understanding in-depth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will help us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in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ee the way ahead, and always take the initiative in handling foreign affairs.

【Key Word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Аннотация】 Дв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КПК был успешно проведен в октябре 2022 года.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ЦК КПК Си Цзиньпин выступил с докладом на тему «Высоко неся великое знамя социализма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и сплочённо бороться з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модерн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данном докладе, посвященном тем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миру и развитию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и содейств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был выдвинут ряд новых суждений, новых изложений и новых инициатив, обогащающих и развивающи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идею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ынешня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претерпевают сложные и глубо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риском серьезных дисбалансов. В докладе 20-го съезда компартии было выдвинуто новое суждение о «трех изменениях» и новое суждение о

«четырёх основных дефицитах», а также глубок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ы н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ира и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стоящие пере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Касательно решения «четырёх основных проблем дефицита», то мир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развитие – ключо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 гарантией, а управление – путем. Китай стремится к содействию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эффективном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одействию решению акту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и укреплению ценностной основ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важению к правам народов всех стран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выбир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путь и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ю обменов и взаимообогащений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цивилизациями и достижению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мира в целях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агматичными мерами реш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зданию и усилению чувст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инноваций и активному реагированию на угрозу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блокады. Тща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доклада 20-го съезда КПК и глубо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ут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деи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помогут нам уловить общ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слож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чётко видеть путь вперед и всегда проявлять инициативу в наше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20-й съезд КП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де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сообщество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системы и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世界政治研究

“政治的西方”与“政治的东方” ——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根源*

理查德·萨克瓦**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创建和塑造了一个“政治的西方”，同时它也成为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宪章体系中最重要次级秩序之一。1991年冷战结束时，人们认为与之相关的机制、实践和机构（尤其是北约）也会解散，从而产生积极和平的新实践。然而，“政治的西方”却以胜利者自居，其实践和意识形态也变得日益激进和具有扩张性，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导致冷战所特有的消极和平卷土重来，引起了2014年“第二次冷战”和后来的乌克兰热战。但是，“政治的西方”只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西方。另有一个根源于古代的“文化的西方”，今天依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科学属于这个西方。俄罗斯当然是“文化的西方”的一份子，并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为之贡献良多。还有一个形成于过去500年间的“文明的西方”。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但也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繁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往往有些暧昧，既不断发现自己在现代化模式上落后于西方，又一直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模棱两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全情投入了“文化的西方”，却与“文明的西方”渐行渐远，与“政治的西方”彻底敌对。俄罗斯引领了大欧亚的构建，也为“政治的东方”更为广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寻求捍卫《联合国宪章》体系的同时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

【关键词】西方国际政治体系 俄乌冲突 政治的西方 政治的东方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044(16)

* 本文系理查德·萨克瓦教授于2022年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十一届东亚斯拉夫欧亚会议上的主旨演讲。经作者授权，在本刊发表。

** 理查德·萨克瓦，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政治的西方”与国际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了使这样的灾难不再发生，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宪章体系也从那时起不断形成自己的系统。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通过，强化了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为弥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功能失效，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安理会成立了。联合国还设立了20多个专门机构，涉及食品、卫生、文化等领域。这些共同创造了一个国际体系，也为国际政治运行提供了框架。

各国在国际政治层面展开斗争，形成了各种政治秩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关于世界秩序的著作中未能区分制度和秩序，这是许多当代现实主义分析中典型的类别错误。^①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正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国际秩序，却忽视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指导作用的规范和制度框架。对此，古典现实主义者却有着相当充分的认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思想家在他们的分析中考虑了意识形态和规范因素。^②此外，除了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还有世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整体格局，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民间社会团体等。上述四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当代国际事务的全部。^③

1945年后，随着战时同盟的解体，苏联在东欧建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并在1949年后一度与中国结盟。另一方面，美国从1947年开始通过马歇尔计划率先复苏了西欧经济，杜鲁门主义承诺支持民主国家对抗权威主义的威胁。1949年北约的成立仅仅是美国领导的对抗苏联威胁的“政治的西方”最为生动的一种表现。“政治的西方”的建立是为了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进行冷战，为此也制定了一套规范和制度。“政治的西方”

^①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 2014.

^② See Nicholas Ross and Grant Dawson, “Mearsheimer, Realism, and the Ukraine War”, *Analyse & Kritik*, August 24, 2022,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auk-2022-2023/html?lang=en>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1995.

在美国催生出了一种“双重国家”（dual state），它实际上是一种为冷战而建立的“杜鲁门主义”国家（“Trumanite” state），其基础是盘根错节的与“深层国家”（deep state），即政治、媒体和智库精英相联系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么不管其政治领导层在“麦迪逊主义”国家（“Madisonian” state）意义上——即在政党、选举和白宫政府中——如何变化，这种持久的冷战格局依然存在。^①

这个“政治的西方”把冷战结束视为自己的胜利。然而，当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结束冷战时，他呼吁的并不是“政治的西方”的价值观，而是《联合国宪章》体系的原则和规范。所以 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效结束了冷战的演讲非常重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摒弃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旧马列主义框架，他坚持认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强调“选择自由”、“国际关系去意识形态化”和“非军事化”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概述了一项全面的议程，新的积极和平秩序应以此为基础；这项议程强调了和平以外的内容，即没有战争。积极和平建议包括加强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关注环境问题等，基本原则是多元、包容与合作。^②

按照这一说法，重新加入文明的主流并不意味着加入“政治的西方”，而是以全人类的财富——《联合国宪章》原则——为最高准则，与“文明的西方”和解，正式结束 500 年来的矛盾心理。俄罗斯将以走向民主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身份加入其中，并逐步建立与完善人权和法治。苏联/俄罗斯将不再努力创造另一种现代化模式，而是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因此，指望俄罗斯接受失败的说法是根本性的理念错误，会带来深远而灾难性的长期后果。俄罗斯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是一个共同的胜利和对《联合国宪章》体系创始理想的回归，还是一个国际政治在应对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议题上向更多合作模式发展的重要时刻。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实现积极和平

① Michael J. Glenn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ouble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Gorbachev’s Speech to the UN”, December 7, 1988, https://astro.temple.edu/~rimmerma/gorbachev_speech_to_UN.htm

的愿景。

相反，“政治的西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践踏了这一时刻，从而延续了冷战政治风格所特有的消极和平。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治的西方”的理想和制度确实取得了胜利。1990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苏联也于1991年12月解体，作为继承者的俄罗斯也走上了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道路。但这个胜利的点不是俄罗斯的，俄罗斯坚持的是自己应该成为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的“共同缔造者”，这个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应当在《联合国宪章》国际体系核心的主权国际主义框架内。“政治的西方”在宣称独享胜利的同时，在实际上继续了冷战，从而也破坏了当时转型的可能性。

对于渴望作为独立主权大国重返国际政治的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沉重打击。而越来越多的关于威胁的意识也不断加剧了俄罗斯对自己地位的担忧。1991年苏联解体，但北约的存在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走上了东扩道路。1990年德国统一时，许多“政治的西方”的领导人反复而明确地对扩张予以否认。^①当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明白1994年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不是替代方案，而是扩张的附属品时，他警告说，“新欧洲是在倒退，就算没有退回冷战，也是退到了冷和平的状态”。^②新安全体系中似乎并没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③

更糟糕的是，在莫斯科看来，“政治的西方”后来自诩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一开始就是在篡夺本应属于整个《联合国宪章》体系的权利和特权。二战后，美国发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经济体制基础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安全结构的基础是“杜鲁门主义”的国家，进而形成了自由主义霸权——这种观点认为，没有其他合法的选择，整个世界都会陆续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一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资本流动限制的取消等被称为“全球化”，全球化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与全球和平提供了框架（尽管存在许多地区战争）。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民主、人权和自由是普遍的公共产品，应该

^① Mary Elise Sarotte, *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② See Andrei Kozyrev, “Partnership or Cold Peace?” *Foreign Policy*, 1995, No.99, pp.3-14.

^③ William H. Hill, *No Place for Russia: European Security Institutions since 19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普遍适用。这一时期的人权着实成了“最后的乌托邦”，^①滋生了民主国际主义的实践，该实践中宣称的道德规范胜过国家自治和主权。

当这些规范被完全融入《联合国宪章》国际体系时，“政治的西方”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就合法了。在规范性方面，民主国际主义的实践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然而，规范的发展却与权力的考虑挂钩。民主国际主义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体系中的基本国际政治规范——主权国际主义。这也挑战了曾经的威斯特伐利亚理念，即挑战了国家将主权（包括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与国际主义、对国际法的承诺、人类尊严和应对共同挑战的多边行动结合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自主的“台球”（billiard balls）的秩序。与这种秩序相反，“政治的西方”现在提出了民主国际主义的想法，即国家主权服从于民主和人权准则的投射——这个“准则”是“政治的西方”的领导人认为合适且适时的。

这为双重标准的普遍应用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政治盟友的人权和民主缺陷经常被选择性忽视，而对手的失败则成为批评的目标，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还采取政权更迭的行动。^②这必然破坏了联合国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宪章》体系的自主权，使其日益成为对抗对手的工具，而不是裁决对手的论坛。以外交和对话为基础的《联合国宪章》国际主义在主权国际主义框架内的至高无上地位受到侵蚀，使得一些国家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适用《联合国宪章》准则方面拥有某些排他性的特权。

二、“西方”的多种范畴

俄罗斯称这种政治形式上的西方为“共同的西方”（collective West），但这个“共同的”指的不是铁板一块的或目的单一的。“政治的西方”其实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这一复杂现象的一种表现，指的是最近的、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权力集合体，当产生它的条件消失时它就会解体。

^① 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2.

^② James Headley, “Challenging the EU’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 Russian Talk of ‘Double Standards’”, *Asia Europe Journal*, 2015, Vol.12, No.3, pp.297-307.

“文化的西方”（Cultural West）是更为长久意义上的西方，它根源于古代，以希腊、罗马精神为基本观念。这就是“长久的西方”，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发展了复杂的移民和贸易模式，从未完全脱离世界的其他地区，却在持续与自身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产出了独特的表达和反思形式。这个“文化的西方”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充满了偶然性和灵活性。18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尽头就是比利牛斯山脉；但今天，这个普遍的看法变成了乌拉尔山脉是欧洲最东端的边界。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正确的；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符拉迪沃斯托克才是欧洲的尽头。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都是非常欧洲化的。几代人以来，俄罗斯为“文化的西方”贡献良多，是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所当然享有成员的权利，而不是需要被邀请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这样看来，冷战时期的隔绝就更具有悲剧性，“第二次冷战”的再次分离也就更加令人感到遗憾——它破坏了可以超越“政治的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紧张关系的文化统一。

“文明的西方”（Civilisational West）是更有问题的。这个“西方”诞生于500年前欧洲开始步入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最后，这个“文明的西方”改造了拉丁美洲，把北美变成了欧洲的延伸，扩大了自己的大陆，开始行使各种形式的霸权。“文明的西方”所衍生出的国际社会是由一系列威斯特伐利亚的“主要机制”（主权、领土、权力平衡、战争、国际法和大国管理）来治理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次要机制”，如联合国。^①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文明的西方”，进而产生了不断变化着的复杂而先进的文明。欧洲人擅长利用道德说教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贪婪。在帝国扩张的全盛时期，这种贪婪被冠以所谓的“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为的是将自己的殖民扩张和对土著人民的剥削合理化。这就是西方确立的“文明的标准”，并试图将其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②而西方化成了现代化的同义词，这是“政治的西方”对《联合国宪章》国际体系

^① See Hedley Bull,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Tim Dunne, Christian Reus-Smit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的篡夺。

这种伪普遍主义所带来的错误观念内含一种无可挑战的优越性。正是在“文明的西方”，现代性发生了智识上的、工业上的转变，其理念和实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难道这样“政治的西方”就可以享有优先和特权吗？可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一种与之对抗的阻力，并且有可能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

俄罗斯长期以来与“文明的西方”有着复杂的关系。从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的现代化努力开始，俄罗斯一直试图模仿西方的成就，以加强自身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俄罗斯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即自己以某种方式代表了“文明的欧洲”的更好版本，以拜占庭精神为根源的东正教俄罗斯斯拉夫文化更有深度，与之相比，肤浅的罗马-日耳曼社会已经背离了真正的欧洲。^①苏联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在于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发挥西方的潜力，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弊端。^②

苏联末期，这种情绪有了新的形式。当时，戈尔巴乔夫呼吁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这一关于欧洲的形象更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即欧洲就像一栋房子，里面有许多房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各不相同。这一想象后来被称为“大欧洲”，其明确的含义是，随着俄罗斯的加入，欧洲将变得更强大。而现在很明显却是，俄罗斯又一次与“文明的欧洲”和解失败，并且与“政治的西方”决裂得十分彻底。

三、“政治的西方”的特征

1945 年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十分清楚，如果通过多边机构，可以更有效地行使美国压倒性的权力。因此，“政治的西方”由一系列机制组成，包括现在的欧盟、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普世主义的方式体现美国霸权。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发

① Iver B. Neumann, *Russia and the Idea of Europe: A Study i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6.

② Johann P. Arnason, *The Future that Failed: Origins and Destinies of the Soviet Model*, London: Routledge, 2005.

挥了主导作用，但与其他战时盟国（尤其是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作为核心创始成员国合作，共同塑造了这个机构。美国一直对出让主权服从国际机构持有矛盾的立场，但冷战期间的自由国际主义使其霸权合法化，并在“政治的西方”的核心观念上强化了自由秩序的规范。^①1989年以后，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明显，最终，自由主义霸权的野心超过了实现这些霸权的资源和承诺。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其中大多数都是破坏性的，并以这样或那样的失败而告终。^②

1945年以后确立的“政治的西方”，呈现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批评家谴责这种权力体系是帝国的一种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权力（统治权）与霸权相结合，而众多国家自愿默许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在新现实主义术语中被称之为“搭便车”（bandwagoning）。显然，今天的“政治的西方”由若干要素组成。

第一，这是真正具有全球野心的秩序。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包括北约和美国众多的轴辐式联盟网络，主要有与日本和韩国签订的安全条约，与以色列等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防务承诺。这种联盟网络由遍布世界各地的约800个军事基地和设施组成，并由在公海上巡航的战斗舰队所支撑。传统上，美国例外论被描述为美国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一个闪闪发光的“山巅之城”（示范模式），但当嵌入“政治的西方”时，却更多地表现为传教士大国，再现了早期“文明的西方”的教化使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是这一传统的鼻祖，他提出要为民权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因此，自由主义受冷战影响，失去了一些固有的宽容和多元主义的特征，并回到了更像19世纪与帝国使命联系在一起的视角。

第二，大西洋联盟仍是“政治的西方”的核心，欧盟和美国将始终保持

① Stephen Wertheim, *Tomorrow the World: 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 Harvard: Belknap Press, 2020.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London 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50; Stephen M. Walt,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9; Patrick Porter, *The False Promise of Liberal Order: Nostalgia, Delusion and the Rise of Trum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着一种并非和谐但持久的关系。跨大西洋主义会阻碍欧盟发展出戴高乐主义所渴求的“战略自主”。这实际上削弱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老牌强国。他们都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但最终在重大问题上，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援助，否则他们的努力都缺乏动力。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是这种情况，值得称赞的是，柏林和巴黎都在寻求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冲突，但他们的努力化为乌有，因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和 2021 年 8 月从喀布尔的混乱撤军，使其没有心情向俄罗斯妥协。

第三，大西洋主义永远警惕外部势力在它的两翼之间制造“楔子”的企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泛欧洲大陆统一的想法被称为戴高乐主义“异端”，而且会受到如此坚决的谴责。这也最终意味着冷战后的俄罗斯无法加入“政治的西方”，因为它的加入将不可避免地稀释跨大西洋关系，并迫使其权力等级发生变化。俄罗斯当然不会以次等身份加入，但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华盛顿准备考虑的议题。这种模式现在正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华关系中重演。

第四，七国集团已成为“政治的西方”关切的特殊表达方式，并成为其关切的指导委员会。正如在 2022 年 11 月巴厘岛峰会上看到的那样，这遭到了 G20 其他成员国的抵制。最终的联合公报谴责了乌克兰战争，但补充说，“对局势和制裁有其他观点和不同的评估”，并呼吁“外交和对话”。^①

最后，正是因为上述四点，导致“政治的西方”现在变得越来越封闭，对其他国家的关切视而不见，而且谴责外部对这个“黄金圈”的入侵。对话和外交只能在主权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而民主国际主义则产生一种监护性的、随之具有等级性、排他性和说教性的立场。

四、“政治的东方”与大欧亚

相反，俄罗斯转向欧亚大陆，成为东方政治的主要支持者之一。2015 年 12 月 3 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对议会的年度讲话中首次公开谈到了“大

^① “G20 Bali Leaders’ Declaration”, November 15-16, 2022, <https://web.kominfo.go.id/sites/default/files/G20%20Bali%20Leaders%27%20Declaration%2C%2015-16%20November%202022%2C%20incl%20Annex.pdf>

欧亚伙伴关系”，呼吁在当年早些时候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EEU）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上海合作组织（SCO）之间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他的演讲借鉴了2015年6月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关于如何在更大的欧亚框架内连接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的报告中概述的相关观点。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避免俄中之间的竞争。^①2016年6月17日，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SPIEF）上，普京又概述了“大欧亚”的宏伟计划。虽然细节含糊不清，但其基本主旨是明确的：俄罗斯将鼓励涵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一系列机制进行“众多一体化项目的一体化”。不过，地理范围不明确，但至少包括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和中国，而在其他地区则包括整个西欧和整个东盟地区。^②

“大欧亚”的目标在于使欧亚大陆成为国际政治的自主主体，并防止其成为外部大国之间争夺的竞技场。这与抵制“政治的西方”篡夺本应属于整个《联合国宪章》体系的特权和权威相适应。但是俄罗斯不得不极为痛苦地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制裁，包括对那些不遵守制裁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而只有联合国才是普遍制裁和其他干预的合法来源。

这种回应就是我们所称的“政治的东方”。^③这种新生的国家联盟不仅挑战了西方政治的霸权主张，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捍卫了《联合国宪章》体系的自主性。这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东盟以及其他组织最后声明和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2022年2月4日，在乌克兰战争前夕，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声明中也坚定地断言了这一点。该声明谴责“某些国家”试图强加给他们的“民主标准”，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大”，并呼吁西方联盟“放弃其意识形态化的冷战立场”。双方还重申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地位，即作为“所有国家都必

① Valdai Discussion Club, *Towards the Great Ocean – 3: Creating Central Eurasia*, Valdai Report No.3, June 2015.

② David G. Lewis, “Geopolitical Imaginarie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Greater Eur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8, Vol.70, No.10, pp.1612-1637.

③ Oliver Stuenkel, *The BRIC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6;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9.

须在行动中遵守的基本原则”。^①

这种非西方新兴的政治联盟远不只是对西方政治扩张野心的回应，而是反映了全球国家体系的成熟和经济力量平衡向东方的转移。《联合国宪章》国际体系曾经为非殖民化提供了框架，而今天世界上有大约 200 个国家，其中 193 个是联合国成员国。西方文明教化世界其他地区如何生活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而现在需要的是相互尊重的互动。帝国时代已经结束，但如今的西方面临着早期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伴随着内部矛盾的不断加深。

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仅被一小部分受益阶层占据，导致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及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不断增长。但是，缺乏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来表达这些愿望，助长了全球性的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式的入侵和英国脱欧指出了问题所在，却提供了不成熟且不连贯的回应。西方文明正被自我怀疑、领导不力和对未来缺乏积极的愿景等问题困扰。这与“政治的西方”的扩张野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不断加深的国内矛盾和两极分化的国内政治秩序并没有削弱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而且很可能加剧了这些议程——如果国际政治的“转移注意力”理论是正确的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日益正规化的“政治的东方”正在形成，这不仅是为了对抗“政治的西方”的扩张主张，也是为了提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替代模式。尽管“政治的东方”和“政治的西方”一样，可以划分为文化、文明和政治三个部分，但“政治的东方”的构成更为模糊，广泛吸收不同文化。在众多东方文明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和以印度河流域为基础的文明尤为著名。这两种文明之间曾有过相当深层次的相互借鉴，但他们却追求不同的政治轨迹。所以，结果可以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由“基于规则的”“政治的西方”主导的世界。^②

我们之所以关注“政治的东方”，在于它正在成为可能替代目前占主导地位“文明的”和“政治的”西方的另一个选项。作为“政治的西方”的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Era and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bruary 4, 2022, <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5770>

②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31, No.3, pp.271-285;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2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2018.

对应物，“政治的东方”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政治的东方”远没有“政治的西方”那么霸权。“政治的东方”正在形成，但它的成员极不可能按照西方模式组建各类联盟，也不会压制系统性的多样化，而是欢迎多元化。显而易见，“东盟+”模式接受了更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当然也不会试图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政。这种模式建立在真正的主权国际主义基础之上，没有丝毫的民主国际主义内涵的救世主义信念。第二，“政治的东方”坚定地捍卫《联合国宪章》国际体系的自主性，反对以“基于规则的秩序”篡改《联合国宪章》体系的普遍准则。第三，“政治的西方”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组成的奥库斯（AUKUS）联盟以及北约日益活跃的形式，在亚太地区悄然推进，被视为将破坏性的欧洲冷战思维引入该地区。但是，该地区极不愿意将本地区的分歧和紧张局势视为第二次冷战的一部分。这将再次把欧洲中心主义强加给一个试图摆脱殖民遗产的地区。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后西方”制度发展的范围不断延伸。尽管没有正式的等级制度，但大欧亚大陆处于新生政治形态的核心。俄罗斯和中国紧密合作，也与越来越多的机构伙伴合作。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最初的成员国，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现在伊朗也加入其中。金砖国家集团已经成立了一家开发银行并建立了应急储备安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加入。阿根廷和伊朗于 2021 年夏天提交了申请，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也表达了加入兴趣。“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涉及 100 多个国家，用于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和港口，反映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更加自信的立场。同时，北京还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目前，该银行在发展项目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

过去 30 年的全球化正让位于两个相互竞争但却主导世界的经济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不仅打算保持其主导地位，还致力于摧毁俄罗斯和伊朗的经济，并确保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是，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的微芯片技术。仅仅出于担心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全球南方国家对与中国结盟持谨慎态度。但另一种全球金融和经济架构也正在形成，布雷顿森林机构正逐渐被绕过。更多的组织和协会为新兴的“政治的东方”提供了基石。

至关重要的是，“政治的东方”所宣告的规范基础是主权国际主义和《联合国宪章》体系的诸多核心理念。许多决议和宣言都坚持联合国准则，并参考了 1955 年《万隆宣言》的 10 点内容，而《万隆宣言》本身就包含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政治的东方”的出现不会威胁到《联合国宪章》国际体系，而是强化了该体系。作为回应，“政治的西方”反对将“政治的东方”的代表们提升到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领导职位，并伴随着抵制和罢工。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被错误地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事实上，他们至少在宣言中、在国际体系的层面上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使他们成为对现状持谨慎维护态度的大国，但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政治的霸权，所以，在这个程度上，他们又是修正主义者。

五、结论

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国际政治将再次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政治的西方”的扩张野心正被“政治的东方”的出现所抵消，尽管后者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全球南方国家抵制卷入冷战式的代理人冲突，拒绝在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中做出选择，而是诉诸于《联合国宪章》原则中所体现的普遍性。然而，西方替代者的出现代表了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映了真正多极化的出现。在规范的层面上，“政治的东方”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后西方反霸权联盟，但它是由一种局限于国际政治层面上大国竞争的“修正主义”所驱动的。在《联合国宪章》体系的层面上，“政治的东方”是高度保守的，它以《联合国宪章》体系内的主权国际主义为基础，维护战后现状。相比之下，“政治的西方”的民主国际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颠覆性的，因为它试图塑造自己的形象。当它遇到阻力时，冷战的做法就会复活。然而，西方并非铁板一块，本文所界定的三个层面相互作用，产生了反思、更新和变革的新形式。形式上，“政治的西方”和“政治的东方”都致力于战后《联合国宪章》原则，但只有在实践中实施这些原则，才有机会挽救《联合国宪章》体系。如果没有准则和制度约束，国际政治将使第二次冷战比第一次冷战更危险。而且，在核时代里，还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诸多灾难，人类命运真可

谓安危难料。

(翻译 杨 辉, 潍坊医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

【Abstract】 A Political West was created during and shaped by the Cold War in the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I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orders within the broader United Nations-based Charter International System, established in 1945. When the Cold War end in 1991 it was assumed that the structure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associated with it (notably NATO) would also dissolve, and thus generate new practices of positive peace. Instead, the Political West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victor. Its practices and ideology radicalised and expanded, claiming a certain universality, thus regenerating the negative peace characteristic of a cold war. This led to the onset of Cold War II in 2014, followed in short order by hot war in Ukraine. The Political West, however, is only a particular and temporally bound version of the West in general. There is also the Cultural West, with its roots reaching back to antiquity and today continues to produce art and science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Russia is by entitlement part of this Cultural West, and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has contributed much to it. There is also the Civilisational West, which has taken shape over the last 500 years. This was the age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but it also saw the flourishing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Russia has always had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with this West, repeatedly finding itself lagging in terms of its model of modernity as well as remaining enduringly equivocal about its values. Post-communist Russia engaged fully with the Cultural West, but became increasingly alienated from the Civilisational West, while in the e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tical West became outright hostile. Russia took the lead in shaping a Greater Eurasia,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broader Political East that offers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modernity while seeking to defend the Charter system.

【Key Words】 The We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Russia-Europe

Relationship,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Political West, the Political East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Запад” был созда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ой 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 стал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подрядов в рамках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Устав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озданной в 1945 году. Когда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в 1991 году, предполагалось, что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актика и институт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е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АТО), также распадутся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родят новые практики позитивного мира. Впроч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Запад занял позицию победителя. Его практика и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дикализировались и расширились, претендуя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сть, тем самым возрождая негативный мир, характерный дл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началу “втор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2014 году, за которой вскоре последовала горячая война на Украин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Запад, однако, 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конкретной и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во времени версией Запада в целом.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же “Культурный Запад”, чьи корни уходят в древность, включая сегодняшние искусство и наука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Россия по праву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ью эт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Запада и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тысячелетие внесла в него весомый вклад.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ж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Запад”, который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500 лет. Это была эпох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но она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расцветом Ренессанса 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У России всегда были двой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этим Западо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что отстает в плане своей модел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также постоянно остается 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воих ценностей.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полностью вовлечена в Культурный Запад, но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все более отчужденной от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Запада,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е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Западом стали откровенно враждебными. Россия взяла на себя ведущую рол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а также внесла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который предлагает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ую модель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стремясь защитить систему Устава ООН.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Запа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осток

(责任编辑 李 恪)

现代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 ——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国内与国际秩序

黄 晨*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研究试图探索政治思潮、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为思潮并塑造国内外秩序的状况各不相同。17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为英国确立了小政府和间接统治的帝国模式。18世纪末，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孕育更多的政体选项，冲击了欧洲的均势体系。20世纪初，新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两套整体性的转型方案，同时将国际秩序塑造为“三个世界”。20世纪末至今，保守自由主义回归，世界政治从三分变成了所谓的自由秩序与非自由秩序的二元对立。综而观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大领域的核心概念均诞生于不同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其未来也将取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走向。

【关键词】现代世界政治 政治思潮 自由主义 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060(27)

一、引言

作为一个旨在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方向，“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研究正在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目前大部分以“世界政治”为题的论著，要么是对各国发展趋势的描述性研究，要么仍然将世界政治等同于国家间层面的国际政治。^①而在狭义的国际政治研究中，探索

*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① 对现有“世界政治”论著的检讨可参见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伟主编的《世界政治概论》一书。

现代世界变迁规律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实用性的调和主义（eclecticism）与对中、微观问题的实证检验。^①因此，虽然我们积累了很多区域国别和中、微观层面的知识，但仍然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学科视野和理论想象力，如此才能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因果规律。

如果将视野拓宽到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史等交叉学科，我们会发现，很多重要论著虽然并未以“世界政治”为名，但都在为现代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变迁提供整体性的因果解释。目前至少有六种竞争性的解释路径：一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来大国竞争研究中最流行的“经济-技术”解释，由于经济实力和背后的技术创新是大国崛起的直接基础，因此很多学者用这二者解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②二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开创的、被民主化与国家构建研究发扬光大的“阶级-社会结构”解释，认为不同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结构影响了国内乃至国际秩序。^③三是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如今已被应用到中西比较中的“战争-竞争”路径，强调不同性质的战争和策略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和体系。^④四是因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而闻名、但在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中得到深化的“文化-文明”路径，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特别分析了它为什么“不变”。^⑤五是由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推动、后在霸权和国际制

^① See 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Vol.19, No.3, pp.483-497; David A. Lake,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Vol.19, No.3, pp.567-587.

^②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Daniel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9, Vol.33, No.2, pp.286-303.

^③ 参见[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美]理查德·拉克曼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郇菁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④ 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Mark Dincecco, Yuhua Wang, “Violen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 Ru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 Vol.21, pp.341-358.

^⑤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Philip Gorski, *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度研究中得到发展的“国际-体系”路径，重视国际分工体系、国际制度和霸权等外部因素对各国历史的渗透。^①六是历史社会学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国际政治学的英国学派尝试的“综合-互动”路径，将其他学者发现的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并叙述出一部大历史，方法的严谨程度可能下降了，但解释的完整程度较高。^②

《世界政治概论》和本文采取的是第七种解释路径，以自由主义等重大政治思潮为自变量，以国内与国际秩序为因变量。如果说摩尔让人们明白了世界政治的“社会起源”，那么笔者试图勾勒的则是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除此之外，本文的方法论与前六种经典路径也有一些关键的不同：我们并不否认经济、文化、军事等自变量的重要影响，只是将思潮作为一个中间变量（intermediate variable），而思潮本身也会起源于经济、文化等其他自变量。换言之，本文要勾勒的“政治思潮-国内秩序-国际秩序”这一因果机制，仅仅是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政治的漫长因果链上的一段。在 20 世纪末以来“机制”（mechanism）取代“规律”（law）方法论的大背景下，^③第七种因果机制应当被看作是对前六种解释的必要补充。而真实的世界政治变迁史则是各种因果机制共同作用的复杂产物，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单独揭示世界的规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大理论的探索才能超越 20 世纪那种简单化的倾向，依靠越来越多的机制组合不断接近真实的历史。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现代世界中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一旦政治思想开始影响社会，就会形成政治思潮或者意识形态思潮（ideological trend）。虽然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不同，不同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同，不同国家对自由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同，但总的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大部分时期思想家和国家共同认可的基本要素。而自由主义不同历史阶段

① 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Seva Gunitsky, “From Shocks to Wav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4, Vol.68, No.3, pp.561-597.

② 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美]迈克尔·曼著：《社会权力的来源》，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③ 对这一方法论革命的全面阐述参见[美]乔恩·埃爾斯特著：《解释社会行为》，刘骥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47页；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2期。

之间的差异，只是在这些要素的具体边界和施行方式上有所变化。这些不变的基本要素是：以自由（liberty）为核心的个人权利（right）是最重要的价值，这构成了其他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政治上，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由人民授权、受法律限制的政府；经济上，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程序公正的市场；文化上，在个人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宗教、传统和文化偏好必须与政治分离，互不干涉。

虽然作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由来已久，到底以哪位思想家、哪本著作作为开端一直存在争论，^①但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则可以发现一个公认的起始点，即 1688 年的英国，也可以识别出相对清晰的历史发展阶段。接下来，笔者将分别扼要探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自由主义分化时期、新政自由主义时期、保守自由主义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中，我们将初步看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塑造关系。

二、古典自由主义与英国模式的诞生

前述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现代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国内外政治秩序都起源于 17 世纪的英国。但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并不等于思潮，在 17 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才真正成为影响整个英国政治的主流思潮。那么，从“思想”到“思潮”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就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容而言，17 世纪末经历了从矛盾到共识的转变。从博丹（Jean Bodin）、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到霍布斯，这些活跃于光荣革命前一个世纪的思想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过渡性，常常在古今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自由与专制之间游移不定。但从洛克开始则不同了，他对辉

^① 大部分思想史著作习惯将自由主义的开端定为 17 世纪的霍布斯或洛克，但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的要素需要上溯至罗马时期（如[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西方政治传统》，李丰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也有学者强调洛克理论尚不能称作自由主义（如 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Jeremy Waldron, *God, Lock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格党而言既是重要成员，又是思想导师。成书于光荣革命前^①的《政府论》，正式建立了“个人权利-有限政府”的逻辑等式，并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在洛克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涌现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人。他们虽然分别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者“怀疑主义者”，但在政治上的共识远远大于具体思辨上的差异：都将个人的自由和福利视为价值基础；都捍卫英国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奠定的立宪君主政府和更自由的市场；他们的关系也比较亲密，或者互相援引。^②总之，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叶这些革命思想家所呼吁的、保守思想家所捍卫的，都是同一个公约数：古典自由主义。

就传播自由主义的外部条件而言，17 世纪末开始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宽松的氛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告诉我们，印刷技术和出版市场推动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传播。^③实际上，印刷和出版的重要影响不仅限于民族主义，它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所有现代政治思潮形成的必要条件。从上古直至 15 世纪，经典的政治作品只能通过手抄本来传播。由于手抄本费时又昂贵，传播范围极其有限，导致读者群体仅局限于部分贵族或知识阶层。自从 15 世纪中叶古登堡（Gutenberg）发明了西方第一台活字印刷机后，传播范围发生了巨变。表 1 列出了经济史学家估算整理的出版数据，可以看到，16 世纪上半叶英国印刷了 280.7 万册书籍，比整个 15 世纪所有的手抄书籍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另一个增长点出现在光荣革命时期。首先是逐渐兴起的辉格党革命活动催生了无数的小册子，而在革命后的 1694 年，议会又废除了《许可证出版法案》。在技术、革命和法规的多重刺激下，英国国内的出版规模从 17 世纪上半叶的千万级直接攀升到了 17 世纪下半叶

① 剑桥学派的考证指出，《政府论》并非是事后辩护，而是革命中的理论呼吁。参见 Richard Ashcraft,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英]彼得·拉斯莱特著：《洛克〈政府论〉导论》，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

② 上述几位思想家的交往和互相影响参见 Dennis C. Rasmussen, *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Richard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2-45 页。

的上亿级。

表 1 14—18 世纪英国境内书籍数量对比
(14—15 世纪手抄书籍和 16—18 世纪印刷书籍)

年代	手抄书籍		印刷书籍					
	1301-1400	1401-1500	1501-1550	1551-1600	1601-1650	1651-1700	1701-1750	1751-1800
数量(万册)	15.6	20.9	280.7	800.3	3318	9064.7	9784.5	15595.3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 17 世纪末的洛克与 17 世纪上半叶的格劳秀斯、霍布斯在政治影响上的区别了。格劳秀斯的大部分著作和霍布斯《利维坦》之前的所有著作都以拉丁语写成，二人的著作也多为语言艰深的大部头，普通商人和公民就算识字也难以理解，因此二人的影响仅限于部分精英。到了洛克时代，不仅英文写作完全取代了拉丁文，“小册子”（pamphlet）更是成了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最流行的出版物。篇幅简短、文字通俗的《政府论》就是洛克刻意写作的小册子，并且它在英国国内就有 1689 年、1694 年、1698 年、1713 年等十几个版本，足见其传播范围之广。^②而据历史学家统计，17 世纪末与《政府论》类似的、传播革命和权利理论的小册子至少有百种以上。^③可以说，光荣革命以后，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成为影响英国政治秩序的主流思潮。

成型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如何塑造英国模式的内政？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光荣革命时代的“古典”与后来的现代自由主义有何差距。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像后来的美国、法国一样主张取缔

① Eltjo Buringh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9, Vol.69, No.2, pp.416-417. 在原数据中，手抄书籍的计算对象是整个“British Isles”，而印刷书籍却将“Great Britain”和“Ireland”分列，笔者将印刷书籍分列的两项数据相加后与手抄书籍的数据相比较。

② See Mark Goldie, “Printing History of Locke’s Writings 1686-1800”, *Locke Studies*, 2005, Vol.5, p.217. 还有在美国的英文版和法文、德文等数十个版本印行。

③ See Mark Goldie, “The Revolution of 1689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Argument”, *Bulletin of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1980, Vol.83, No.4, pp.473-564.

传统君主，而这正是传统与现代思想、革命与保守思想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作用在政治制度设计上，造就了以君主立宪制、议会制、两党制和小政府为代表的英国模式。

就国家性质而言，古典自由主义首次建立了一种议会至上、限制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国家。一方面，革命后的玛丽、威廉和 1714 年建立的汉诺威王朝都是詹姆士家族的后裔，保证了其传统合法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1689 年的《权利法案》将立法、司法、财政、军事等大权均赋予议会，甚至乔治一世只会说德语也几乎没有影响政府运转。虽然当时君主和议员是世袭的，但行政部门已形成了理性化的官僚制。^①就政体而言，古典自由主义也分化出一种两院制衡的议会制（parliamentary system）和两党竞争的两党制（two-party system）。虽然辉格党和托利党有过武装冲突，但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两党逐渐开始接受对方的长期存在并展开和平竞争。推动这一转变中的关键思潮正是柏克的自由主义政党学说，他不仅与洛克一样是辉格党的理论权威，更重要的是其保守思想也能争取到托利党人的认同。柏克在 1770 年的演讲中提出，“政党是人们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某种每个成员都统一的特定的原则，通过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②。这被政治学家们公认为现代政党的第一次严格定义，它将“结党”的形象从贬义逆转为褒义。

就政府规模而言，古典自由主义逐渐树立了向社会和市场放权的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模式。在光荣革命确立议会权力的同时，议会也在推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从 1679 年的《人身保护法》到 1829 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政府对公民人身、居住、言论、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预越来越少，甚至拘捕重罪犯也要有严格的程序。芬纳（Samuel Finer）评价道：“除了荷兰共和国以外，也许欧洲其他所有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③不过政府在经济上的放权要晚上一个世纪。虽然《国富论》很早就论证出自由贸易的效率

① 参见[美]托马斯·埃特曼著：《利维坦的诞生》，郭台辉、郭忠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2-246页。

② [英]埃德蒙·柏克著：“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载陈志瑞、石斌编：《埃德蒙·柏克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2-73页。

③ 参见[英]塞缪尔·E·芬纳著：《统治史》（卷三），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3页。

比保护主义更高,但直至19世纪初,工厂主和从业者才在斯密和边沁(Jeremy Bentham)的影响下发起了“反谷物法同盟”和众多请愿运动。1846年,议会最终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自由市场原则在英国的确立。^①当然,要想进一步理解这些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将分析的重点转向国际秩序。

我们知道,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奠定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国内政治的基本单元,也开创了现代西方世界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前后,出现过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多个殖民帝国,偏居一隅的英国模式为何能脱颖而出并影响到后世呢?这就必须关注古典自由主义给英国国际观带来的转变。

最初的海外殖民和战争是相互促进的,殖民地的财富为战争提供军费,而战争也可以夺取更多的殖民地。然而,一旦战争开销越来越大,殖民地财富不足以覆盖,政治精英就会寻求新的理念。给出解决方案的正是斯密、柏克和休谟等思想巨擘,他们将自由主义思想拓展到了国际秩序中。斯密依旧以理性的计算表明,英国直接统治殖民地是“一无所得,只有损失”^②。柏克在1774—1777年间的三次著名演讲,不仅提到了贸易的好处,更重要的是站在了政治正当性的高度,认为对美国动武就是破坏英国自由主义本身,允许美国独立反而能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观念的帝国:“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公民权利的观念与您的政府相联结。……他们越多繁衍,您就越多朋友。”^③

随着观念的转变,英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帝国开始浮现。对欧洲之外的殖民统治而言,以1783年美国十三州独立为界,英帝国从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一英帝国”(First British Empire)转变成“第二英帝国”(Second British Empire)。^④虽然第二英帝国的殖民范围延伸到非洲西海岸、澳洲和东南亚,

^① See Norman McCord,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Adam Smith to Keynes*,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70, pp.72-76.

^② [英]亚当·斯密著:《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③ [英]埃德蒙·柏克著:《美洲三书》,缪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1页。

^④ See Robin W.Wink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4-72.

但统治的逻辑已经不同。统治者更关注自由贸易所创造的财富，军队与暴力机关则被集中到了连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航路上，在节省成本的同时保障贸易帝国的海权。^①至于殖民地的内部政体，他们则像在美国时一样，只进行自由主义价值上的软性引导，很少直接派遣成体系的行政人员——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英联邦世界。这种新型的统治逻辑，我们还将在 20 世纪的美国那里看到。

对欧洲范围内的近邻国家而言，英国则主导建立一种均势（balance of power）秩序。虽然均势和反霸权思想由来已久，但英国既拥有隔岸观火的地理位置，又形成了自由主义帝国的统治逻辑，故而成为 17 世纪以后均势秩序的主导者。从玛丽和威廉刚刚继位时的《里斯维克和约》到 18 世纪初的《乌得勒支和约》，共同特色是遏制法国、西班牙等欧陆大国的合并，同时保护奥地利等被削弱的国家。英国一方面“锄强扶弱”，一方面争取直布罗陀等出海口的控制权，并将这种均势秩序贯彻到了 19 世纪初击败拿破仑后的维也纳体系。这种英国特色的国际秩序是一体两面的，正如国际关系史家的经典评价：“一个面庞转向大陆，以调整均势天平，另一个面庞对着海洋，以强化它的海洋统治。”^②

三、自由主义的分化与欧美的回应

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始于 18 世纪末的两场革命，终于 20 世纪初的世界大战。英国虽然给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国内外秩序的最初范型，但政治变迁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同样的思潮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变化，并塑造出更为不同的政治秩序。1787 年以后的美国和 1789 年以后的法国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接受者，自由主义也从此由“古典”走向“现代”，并催生了社会主义（socialism）、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激进主义（radicalism）等与自由主义相对的重要思潮。这些新的思潮、国内政

① 参见[英]安德鲁·汤普森著：《帝国与英国》，载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85-287 页。

② [德]路德维希·德约著：《脆弱的平衡》，时殷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6 页。

体和国际秩序此起彼伏，并影响到了 20 世纪以后的世界。

柏克以后的很多著作都对比过法美思想内容的不同，但笔者关心的是社会意义上思潮的区别。与霍布斯、洛克、休谟等既是政治思想家又是哲学家的英国伟人相比，美国国父们没有人成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现实政治事务上。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美国政治精英，因此托克维尔（Tocqueville）观察到，美国人的思考偏重实践而非理论，喜爱一般观念却不像法国人一样迷信真理。^①美国自由主义与政治实践的联系也比英国更进一步。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均参加了 1787 年的制宪会议，并在首届政府担任要职。那些暂时不占主流的反联邦党人和未参加会议的精英也没有远离政坛，如梅森（George Mason）等反联邦党人保护公民权利的思想在 1791 年被批准为第一修正案，而未出席会议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则当选了第三、四任总统。^②从联邦与反联邦双方的情况可见，他们的思想都通过代表席位和两党竞争的方式形成某种中和，影响到上层政治。

到了 19 世纪初，自由主义又迎来了一次影响社会中下层的历史机遇：工业革命。工业化带来的技术和资金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水平和传播速度，能接受自由主义并参与政治的民众越来越多。甚至在并不发达的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图书馆里，伏尔泰（Voltaire）、休谟和吉本（Edward Gibbon）的著作就在数年内各自被借阅了百次以上，仅次于一些时尚和新闻杂志。^③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到 1850 年，美国中小学的入学率已达 47.2%；到 1870 年，识字率甚至达到了 80%。其中，男性和女性在入学率和识字率方面的数据已经比较接近，但黑人以及其他人种较白人大幅落后。^④图 1 展示了 19 世纪下半叶美法两国识字率的高速增长，在新的条件下，政治思潮

^① 参见[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9-536页，第559-566页。

^② 制宪会议的过程和名单参见[美]詹姆斯·麦迪逊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③ See Isabelle Lehuu, “Reconstructing Reading Vogues in the Old South”, In Shafquat Towheed and W.R.Owens, e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Volume 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70.

^④ Se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370, 382.

的现代化、平民化乃至激进化都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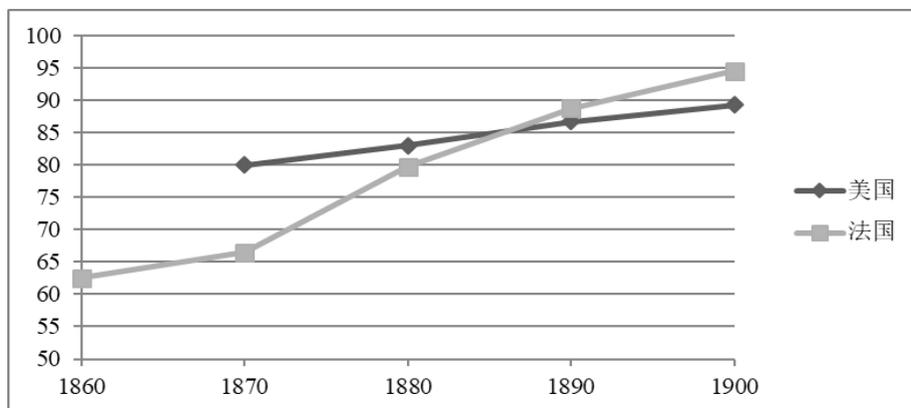


图 1 1860—1900 年美国 and 法国识字率的增长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①

法国自由主义的具体主张又比美国更为激进和“现代”。自由主义成为集体性思潮的标志就是 1751—1780 年《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的出版和“百科全书派”的活跃, 自伏尔泰以降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参与其中。《百科全书》高扬理性和新知, 极端反对宗教和传统, 在知识基础上便与古典自由主义分道扬镳。而在这些人中, 卢梭(Rousseau) 又比伏尔泰更系统化, 比孟德斯鸠(Montesquieu) 更激进乐观。同样是契约论, 卢梭与英国前辈相比有很多重要区别: 他笔下的“自然状态”是思想史上最美好的; 进而他对人民的“公意”(general will) 最有信心; 因此代表公意的主权和政府不需要分权制衡; 最终他成了直接民主和革命的代言人: “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 主权者才能行动。”^②1789 年大革命到来后, 不仅这些观点被写入《人权宣言》中, 卢梭也成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等革命领袖赞扬最甚、援引最多的思想家。^③

①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p.382; A.R.Gillis, “Literacy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Violence in 19th-Century France”, *Sociological Forum*, 1994, Vol.9, No.3, p.396.

②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第 114 页。

③ 参见[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现代性之路》, 齐安儒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110-111 页。

法国启蒙运动与实践的联系，在社会层面更广，在政治层面却一度是先发现代化国家中最受限的，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波旁王朝的专制远甚于英美，就像在俄国和清代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看到的那样，统治者拒绝将新的思想纳入改革议程；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前后城市里逐渐兴起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风潮，给了自由主义者乃至激进主义者活动的空间。^①在农村同样如此，社会学家发现，农民识字率越高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恐慌和反抗运动。^②积蓄已久的社会压力突然在 1789 年得到释放，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加入集会，这才导致随后的政治派系越来越多、越来越激进，甚至孕育了 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如果以光荣革命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为参照系，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思潮模式都处于向“现代”演化之中，但三国演化的激进程度不同，可以粗略地区分为保守、改良和革命。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塑造了英国以外政治秩序的经典形态。

法美两国政体最明显的相同点就是拒绝君主，两者共同开创了共和国（*republic*）或民主共和国制。这一创举对美国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过君主——而对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更为不易，因为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君主和专制者的多次复辟。也正因如此，主流政治思想史对法国激进革命的批判态度虽有道理，却也值得反思。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强调的，1815 年的欧洲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连最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也要拒绝，如果没有 1815—1848 年的几轮革命，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③

美国自由主义对国内政治秩序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两大发明：政体层面与议会制相对的总统制（*presidential system*）；国家结构层面与单一制（*unitary system*）相对的联邦制（*federal system*）。早在 1777 年，纽约州就首次让民众直接选举州长；1780 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则第一次有权否决立法。^④联邦党

① See Peter Clark, *Sociability and Urbanity*, Leiceste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86.

② See John Markoff, “Literacy and Revol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 Vol.92, No.2, pp.323-349.

③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353 页。

④ 参见[美]杰克·N·雷克夫著：《宪法的原始含义》，王晔、柏亚琴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50 页。

人正是用这种共同经验说服了警惕集权的反联邦党人，设立了由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为造就一个比英国更强的国家机器奠定了基础。而反联邦党人的影响在于，为联邦权力划定了明确的极限，其余权力归属各州。这一创举让现代政治学的思考拓展到了纵向的国家结构层面，它保证了总统权力虽然强大，也难以成为欧陆王朝那样的专制君主。

与美国相对，法国更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催生了政党制度层面与两党制相对的多党制（multi-party system），以及政府职能层面与小政府相对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模式。美国的两党制非常清晰，而法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掌权党派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失败后又会出现专制复辟。在如此复杂的思潮派系塑造下，1870 年建立第三共和国后便出现了四个主要政党。^①平民革命浪潮催生的巴黎公社则成为大政府模式的鼻祖。公社除了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议行合一外，还尝试了提高工薪、普及教育、赋予妇女权益等多项扩大政府职能的改革。这些改革有的留存在法国，有的影响了同期德国的福利国家，有的则被 20 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政权继承。可以说，截至 19 世纪末，自由主义思潮的英、美、法三个版本，已为现代国家的各种政体提供了范本。

在现代世界形成前后，欧洲经历过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等三次“称霸-失败-均势”的循环。^②如果聚焦于思潮与这些均势体系的关联，就会发现，这三次均势体系的主导国家除英国外，都还由保守王权统治着。即便英国也倾向于间接统治，对他国国内秩序比较放任，甚至在 1815 年扶持波旁王朝复辟。可以说，截至 19 世纪初，自由主义改革虽然改变了英美，却未动摇整个国际体系。

但各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随着战争、阅读和工业革命慢慢扩散。直至 1848 年欧洲革命，思潮的不断冲击终于引发了连锁反应，在两个方面瓦解着保守的维也纳体系。首先是现代自由主义对各国君主合法性的冲击，因为在法美两国的示范效应下，共和国也成为革命力量最新的追求。当然，

^① See Stephen E.Hanson, *Post-Imperial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91-98.

^② 参见[德]路德维希·德约著：《脆弱的平衡》，时殷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6 页。

由于各国自由主义传播的程度不同、专制君主的应对经验不同，^①对旧体系的冲击是不均衡的，西欧和北欧的民主改革明显多于东欧和南欧。而另一项冲击则要广泛、均衡得多，这就是民族主义和独立意识对原有版图的冲击。因为无论是法国、比利时、丹麦等自由主义获得成功的国家，还是像德国、意大利、俄国这样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都在革命的刺激下开始追求独立或统一，甚至谋求区域霸权。正如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言，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很多思潮，既比这一体系古老，又比它有生命力，且延续至今。^②

当然，思潮的冲击只是构成因果机制的要素之一。即便不同国家的思潮和政体相似，它们由于物质和地理条件不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虽然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相继增长^③，但这一增长很难超过其幅员和人口所决定的上限：法国、德国甚至英帝国的本土部分都属于“中等强国”。因此，从19世纪中叶的托克维尔到20世纪初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预测到：美国、俄国这两个幅员辽阔、又位居冲突侧翼的“超级大国”将取代欧洲的中等强国。超级大国的兴起，也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潮真正的世界化。

四、“新政自由主义”与冷战的世界

第三个发展阶段始于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并与冷战一同结束。此时自由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左转”，并与最大对手社会主义展开了各方面的竞争。需要专门指出的是，不少中英文论著将这一新时代的自由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new liberalism），但在思想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自由主义与上一个阶段相比都会被称为“新”。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阶段的不同思想内容出发，做出更严谨的概念区分：“左转”的自由主义更适合被称为“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而“右转”的自

^① 关于这些差异的比较研究参见 Kurt Weyland, “Crafting Counter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6, Vol.110, No.2, pp.215-231.

^② See Paul W.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01.

^③ 力量增长情况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79-243页。

由主义则适合被称为“保守自由主义”（conservative liberalism）。

自由主义的“左转”当然不是一夕之间完成的，而是早有思想准备。自由主义在欧美盛行一个世纪后，也开始面临经济上贫富分化、政治上大众参与增多等问题。19 世纪中叶的密尔（John Mill）已经开始承认一定程度的大政府和集体美德，而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1911 年的《自由主义》标志着英国左翼自由主义的正式诞生，它扩充了自由的要求，认为应当有从公民自由到经济自由、国际自由等十数种自由权。^①同样的转向在美国被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运动，“运动”二字也说明其政治举措比英国更多。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各级政府政治上赋予妇女选举权，在经济上提高穷人福利，甚至在生活方面开始重视环境、管理垃圾。政治学家们认为，美国从此时开始才有了真正的行政国家；^②大学里的“政治科学”和“公共管理”等实证学科也是此时从近代政治理论中脱胎而出的。^③代表自由主义右翼的英美尚且如此，受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欧陆各国“左转”的积累则更为充分。

而新政自由主义从思想变为世界性思潮，则以著名的 1929 年经济危机为标志。危机使社会各阶层对现行自由主义失去信任：商人阶层的企业因生产过剩而倒闭；普通工人市民大量失业；政治精英则试图在政策乃至政党格局上求变。当然，正如 18—19 世纪的思潮分化一样，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左转”的维度和程度依旧不同。美国的思想变化程度似乎是最小的，政治精英的行事风格也最实用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被称为“经纪人总统”，因为他总是在商人和工人之间、两党之间、左右极端言论之间居中协调。^④与并未打破两党格局的美国相比，英国则由左翼自由主义、渐进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ism）和劳工组织发展出了第三大党工党，坚守关注平等却反对计划的中左信条。^⑤而权利与法治思潮方兴未艾的德国

① 参见[英]霍布豪斯著：《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9—25 页。

② See John Marini and Ken Masugi, ed., *The Progressive Revolution i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13.

③ Ibid, pp.347-376.

④ 参见[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罗斯福传》，孙天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256—270 页。

⑤ See H.M.Drucker, *Doctrine and Ethos in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Routledge, 2018.

和意大利则更不一样。借危机上台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领袖在具体手段上更剧烈地“左转”，大行国家干预和群众运动；又在统治基础上大行种族主义，像是“极右”。^①从美国、英国、中欧再到共产主义的苏联，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潮转变越来越剧烈的世界地图。

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则进一步为思潮奠定了势力范围。美国一方面从孤立主义的旁观者变成了战争的主角，另一方面不再梦想将国内的自由主义秩序照搬到国际联盟中，而是做好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极对抗的准备。在杜鲁门（Harry Truman）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自由意味着“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支援”，“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②二战塑造的社会动员氛围也让杜鲁门的思想迅速传达至各个阶层，当时的军人、商业、宗教等团体都表态支持援助自由主义国家，认为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③显然，相比放任的英国模式和有限的欧陆革命，新政自由主义志在重塑世界其他区域。

自由主义分四个阶段塑造世界政治，这与民主化研究中常说的四个“波”（wave）非常相似。当然，目前学界对波次的界定尚不统一，^④而本文倾向于从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出发，将冷战格局下的现代化统称为“第三波”，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迁统称为“第四波”。转向强政府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一道，刺激第三波国家打下了政治现代化的基础。首先，两个阵营都如同竞赛一般地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被麦迪森（Angus Maddison）称为历史上经济表现最好的“黄金时期”。^⑤如表2

① 政治的不同维度有不同转向，这正是学界有人评价法西斯主义“极右”，有人认为其“极左”的原因。

② 参见[美]哈里·杜鲁门著：《杜鲁门主义》，载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选的阅读资料《美国历史文献选集》。

③ 李昉：“‘自由’话语与冷战初期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第34—36页。

④ 认为中亚革命开启“第四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 Lucan A.Way,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World Politics*, 2005, Vol.7, No.2, pp.231-261；认为阿拉伯革命开启“第四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 Philip N.Howard and Muzammil M.Hussain, *Democracy's Fourth Wa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所示，社会主义治下的苏联东欧、受欧美自由主义影响的拉美和阵营更复杂的亚洲，都与西欧一样保持了 4.8% 以上的 GDP 增长率，还有历史上最高的人口增长率。经济工业化又创造了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公民阶层，正如欧美现代化中看到的一样，经济和教育让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传遍各家各户，开启了一个全民卷入政治参与的时代。

表 2 1950—1973 年世界重要区域 GDP 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

	西欧	苏联东欧	亚洲（不含日本）	拉美	世界
GDP（百分比）	4.81	4.84	5.18	5.33	4.91
人口（百分比）	0.70	1.31	2.19	2.73	1.9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自制。^①

表 3 1960—1990 年全世界 25 岁以上公民最高学历的变化

	未上小学	小学	中学	高等教育
1960 年（百分比）	34.7	43.5	18.0	3.7
1970 年（百分比）	32.7	40.7	21.3	5.3
1980 年（百分比）	31.1	33.4	27.2	8.3
1990 年（百分比）	27.6	31.0	29.5	11.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中的数据自制。^②

在不同思潮的塑造下，第三波国家具体的政治秩序也产生了分化。但与英、美、法那样各项制度逐渐被发明的方式不同，美苏两套成体系的政治思潮给 20 世纪的国家总结出了两套成体系的政治现代化方案：自由主义政治和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以选举民主制和政党竞争制为核心，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为外部基础，组成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国家。南欧、拉美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曾是第一波西欧国家的原殖民地或美国的盟友，在独立后自然开始学习原宗主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政

①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16—117 页。

② Robert J. Barro, Lee Jong-Wha, “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ID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24.

治。至于各国具体采纳的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直接还是间接地管理市场和企业，均因时因地而异，这被称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多样性。^①与之相对，全能主义政治以民主集中制和一党制（single-party system）为核心，以计划经济和单位制社会为外部基础，组成一个更重视团结和平等的国家。东欧、非洲和中国等部分东亚国家大部分是苏联的盟友或者在共产革命帮助下独立，学习的则是全能主义政治。它们内部也有多样性，即便同为共产党执政，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强度也有所不同。^②

自由主义和全能主义的重大成就是将政治现代化推广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但现代政治本身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两种方案各有其问题面。由于自由主义更主张渐进、政府更小，在拉美和东南亚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潮尚未深入的国家，一旦突遇经济或社会危机，就容易倒退回传统专制或者战时状态。从1962年到1975年，军人独裁政权从13个暴增至38个，^③这就是波次研究中所谓的“回潮”。而全能主义的问题刚好相反，在社会主义施行过于激进或者大政府控制过严的国家，更容易出现专制和腐败。因此，在自由主义回潮的冷战中期，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出现对“nomenklatura”（指原苏联享有特权的官员）的不满和抗议运动；^④在新一波自由主义流行起来的冷战末期，中国和东欧也流行起了我们所熟知的改革开放。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分为美国阵营、苏联阵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三个世界”，也是按意识形态亦即政治思潮来划线的。美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帝国”，而苏联把自己描绘成“正义的帝国”。^⑤在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主导下，20世纪形成的国际组织和制度不仅远多于欧美大革命时期，也比之前更为稳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制度“北约”和“华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等经济组织/制度，基本都是

① 参见[美]彼得·A·霍尔等著：《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王新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② See Gary K.Bertsch and Thomas W.Ganschow, *Comparative Communism*, New York: W.H.Freeman, 1976.

③ See Samuel E.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8, p.223.

④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80-581页。

⑤ 参见[挪]文安立著：《全球冷战》，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70页。

根据意识形态划分成员的。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联盟，公约序言明确指出，它是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则而建立”^①。因此，尽管德国是二战的侵略方，但接受了自由主义政治的联邦德国被北约接纳，民主德国则加入了华约。长期处于军事独裁中的西班牙独立于北约，而在 1981 年自由民主化后不久便被纳入。

不过，正如国内秩序的多样性一样，国际秩序的两个阵营内部既非铁板一块，也有着管理思维上的差异。在一、二波国家经年累月的自由主义影响下，北约内部形成了国家间政治协商（political consultation）制度。^②尽管美国掌握领导权，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问题时也和欧洲出现过争端，但成员之间很少爆发军事冲突。相比之下，苏联的全能主义思维极大地影响了华约的内部关系，不仅垄断了核权力等重要议题，还屡次直接出兵镇压东欧国内的抗议和改革。^③从波匈事件到中苏分裂，不仅为苏联阵营的崩溃埋下种子，也推动中国的身份认同从第二世界转向第三世界。

各国自由主义接受度的差异加上美苏阵营的不稳定，又造成了冷战秩序的另一个特点：发展中国家的中间立场和实用主义外交。完全处于美苏掌控下的区域分别只有西欧、拉美和东欧，而超过世界半数面积和人口的亚非各国情况则更为微妙。这些国家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虽然并非北约和华约那种高约束力的组织，但成立之初就宣示民族自决、反对冷战，甚至致信敦促美苏领导人磋商和谈。^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亚非很多国家在左翼思潮高涨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推行激进革命，视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毛泽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又在右翼自由主义反攻的 20 世纪 80—90 年代转向美国，推行新一波选举民主化和市场化。20 世纪的国际秩序就像国内的自由主义、全能主义和传统主义政治的三分法一样，形成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三个世界”。

①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pril 4, 194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② See Roger Hill,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 NATO*,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③ See Vojtech Mastny, “The New History of Cold War Alliance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2, Vol.4, No.2, pp.74-75.

④ See “Papers of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Paper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Subjects. Non-Aligned Nations Summit Meeting, Belgrade, 1 September 1961”, JFKPOF-104-004.

五、保守自由主义与单极霸权的时代

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 20 世纪末冷战结束，并持续至今。与上一阶段的“左转”形成鲜明对比，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则是在“右转”，因此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neo conservatism）或者“新右翼”（new right）。虽然美英各国的不同政党分别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自称，但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如今这些思潮基本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支。思潮格局的改变，直接导致人们对国内外秩序的认知从“三个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

保守自由主义也是先由思想家进行反叛，再在变革时期逐渐成为主流思潮的。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对计划经济的反思、波普尔（Karl Popper）对全能主义社会的反思和伯林（Isaiah Berlin）对积极自由的反思，都出版于冷战初期。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罗尔斯（John Rawls）和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分析哲学基础更雄厚的思想家，又围绕自由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分配原则和干预力度，展开了更细致的“左右之辩”。而上述思考形成政治思潮，是在 20 世纪末的三个契机下实现的。

第一个契机是经济上的，即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危机。知识界在危机后迅速回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保守思想出名、极少使用数学模型的哈耶克于 1974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 年的获奖者又是同为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①政界转变的标志则是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连续执政。里根认为新政自由主义是把工作者的所得分配给不工作者，有损于人民的自由。^②因此其削减政府规模、降低企业税等做法，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在伸张过去的政治自由。

第二个契机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从全球英文图书的出版数据可以看出，以冷战结束为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关图书从

^① 哈耶克之前的获奖者要么是计量方法专家，要么是以批判市场缺陷成名。名单可参见诺贝尔奖官网，<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sts/all-prizes-in-economic-sciences/>

^② 参见[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王辛华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年，第 182 页。

流行变为低落，而自由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相关图书从低落变为流行。即便是出版的社会主义或者左翼思想论著，基本都是“有抵抗无建构”。为了避免重蹈苏联式集权的覆辙，思想家们转而宣扬零星的抵抗和战斗。^①在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等解构性视角，也像是针砭时弊的牛虻，更加远离建构新的政治秩序。而在大众层面，虽然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但它们并不是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站在同一层次上的现代政治方案，因为它们可以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古代传统等任何一种现有政治方案相结合。^②可以断言，冷战结束至今的 30 年内，我们看到的是自由主义对抗各国传统主义和边缘思潮的新二元格局。

第三个契机则是世纪之交的互联网革命。在 21 世纪的前 20 年里，互联网逐渐超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成为大多数人获取生活和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截至 2021 年底，北美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 93.4%，欧洲为 88.4%，占比最低的非洲也有 43.1%。^③互联网对公民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潮的影响已成显学，简单总结社会科学家们的观察，互联网对自由主义为主的现代思潮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继续将自由主义传播到社会中下层，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互联网选举和阿拉伯国家的互联网革命都是尽人皆知的证据；另一方面，网络传播与传统的公民教育和现实参与相比，更容易形成只看自己偏爱的观点、对立人群各自扎堆聚集的极化（polarization）现象，传播的知识也比较浅薄。^④

如上节所述，可以将东欧剧变以后的国内秩序变迁称为第四波政治现代化。在自由主义确立唯一霸权后，指导大多数国家政治改革的模式也从三分法变成了更明确的二分法：完成系统性自由主义改革的被称为民主或自由政体，仍受传统主义、全能主义影响或改革出现倒退的其他国家则被西方国家

① 典型代表是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2004; Alain Badiou, *Philosophy for Militants*, New York: Verso, 2012.

② 参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民族主义》，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③ 数据源自“Internet World Stats”，<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④ See Cass R. Sunstein, *Republic.com 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tthew Hindman,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统称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或专制（autocratic）政体。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民主政体最明显的一次增长正是在东欧剧变时期。到2017年，全球民主政体已接近100个，即所有国家的一半，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家是正在转型的中间政体（anocracies）。在上一波中尝试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东亚和南亚国家大多已从中间政体成长为民主政体，而时间上最晚、由互联网自由主义催生的中东国家很多连中间政体都还称不上。这些国家“得分”提高的程度，恰好与自由主义思潮流行的先后顺序保持一致。民主化专家还发现，在苏联东欧阵营内部，苏式全能主义思潮影响更小的国家——如波兰，自由民主化所需的公民社会、政党和法治基础更稳固；而苏式全能主义思潮影响更深的国家——如俄罗斯和罗马尼亚——这些基础更薄弱。^①因此，虽然塑造政治转型的因素无穷无尽，上述观察足以证明政治思潮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第四波现代化国家尚在接受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那么对大部分前三波国家而言，自由主义秩序已趋于稳定。几乎在每个前三波现代化的国家里，都能清晰地发现两个政党联盟和选民基本盘：一个信奉保守自由主义，以商人阶层和本土居民为基本盘，是为“右翼”；一个信奉新政自由主义，以工薪阶层和移民为基本盘，是为“左翼”。议会和行政首长的轮替，在钟摆式地回应两翼的不同需求，实际上是将上一阶段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内化了。当然，将思潮斗争内化的民主政治也有其内在弱点。一旦族群矛盾或者贫富分化过重，这个钟摆很可能向左或向右摆得过于极端，让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上台——就是近年欧美政治学界担心的从网络极化到政治极化的转变。^②

与这些成熟国家的隐患相比，自由主义政治在第四波国家面临的问题更为明显。一个是自由主义思潮深入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传统文化或宗教历史悠久的国家，自由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传统主义？再就是自由主义思潮本身的问题。由于目前的保守自由主义过于强调小政府和大市场，在

① 参见[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0-259页。

② See Theda Skocpol,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The Koch Network and Republican Party Extremis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6, Vol.14, No.3, pp.681-699; Milan Svoblik, “Polarization vers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9, Vol.30, No.3, pp.20-32.

国家构建相对成熟的地方，自然有驯化专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而放到国家构建之前实行，特别是在几乎没有国家机器的某些亚非地区，则可能加重社会动荡和贫富分化，最终导致自由民主的破灭。^①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已有很多名词来加以描绘：美国霸权、“一超多强”、单极(unipolarity)体系、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和“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ism)。这些名词虽然侧重不同、褒贬不一，但自由主义霸权是其共同内涵。从各个角度看，近三十年的国际秩序都从“三个世界”转变为所谓的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两个世界”，思想上的霸权也赋予了前一个世界对后一个世界的优势地位。2022 年俄乌战争双方背后的阵营，则是这种两分法的最新体现。

政治上最重要的组织/制度变化自然是北约的转型与东扩。华约解散后，北约提出了新的战略概念：就防御而言，目标从苏东变成了“多方面的”(multi-faceted)和“多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就建设而言，要“充分利用全欧洲自由民主发展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遇”。^②因此，北约不仅在 1999 年和 2004 年吸收了 10 个东欧成员国，还发展了俄罗斯、乌克兰等 20 个欧洲伙伴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 9 个全球伙伴国。^③由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见效更快，国际经济关系和组织/制度的发展更为迅猛。不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吸收俄罗斯、中国等原第二、第三世界国家，1995 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在短短二十余年里便发展了 164 个成员经济体，还有 25 个观察员国待加入。^④这个数字意味着，几乎全世界所有稳定存续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融入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中。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宏观上再次提升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和繁荣程度，虽然中微观层面的冲突并未断绝。学者统计发现，冷战后每年爆发的武装冲突虽然是冷战期间的 1.8 倍，但重大冲突占比大幅下降，平

① 指出这一顺序的经典论文是 Francis Fukuyama, “Democrac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at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3, Vol.24, No.4, pp.5-16.

②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November 7, 1991~November 8, 199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847.htm?selectedLocale=en

③ 数据截至 2022 年初，名单参见北约官网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51288.htm>

④ 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名单参见世贸组织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observer

均持续时间也下降到了 3.8 年。^①这清晰地展现了自由主义主导下冲突微观化、局部化的趋势。2008 年第二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及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都曾有很多学者和政治家预测自由主义霸权即将瓦解，但事后似乎并非如此。更严谨地说，霸权国本身和背后的思潮是两回事。美国的霸权正在随着中国等“多强”的崛起而削弱，也会有终结之日，但自由主义带来的开放、规则与合作观已内化到大部分国际成员内部。^②

当然，目前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紧密结合的格局，引发的反弹也比较明显。这不仅是因为保守自由主义在国内可能有政府失灵和贫富分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迄今为止仍不是一种国际和国内逻辑贯通的意识形态。21 世纪的每个正常国家内部都终结了无政府状态，但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无政府状态，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往往要依靠等级制的“利维坦”而非国内政治那种“平等”和“同意”来统治世界。^③正如现实主义理论家所讽刺的，“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中就与现实主义没有区别”^④。国际和国内秩序的鸿沟给自由主义霸权国制造了永恒的两难：如果强行在发展中世界培植自由主义势力，则可能不尊重该国的权利，甚至引发反弹；如果不主动推广自由主义，又可能放任传统主义或反现代势力扩张。因此，与国内秩序相对明确的发展方向不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否克服自身矛盾和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的多重夹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六、结语

本文扼要分析了自由主义思潮、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三者的因果关系，也总结了三个领域中主要学术概念的来龙去脉。思潮化是政治思想影响政治

① 参见唐永胜、刘东哲、陈晓东：“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的特点及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8 期，第 1-3 页。

② See John G. Ikenberry, “Why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Will Surviv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Vol.32, No.1, pp.17-29.

③ 参见[美]约翰·伊肯伯里著：《自由主义利维坦》，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④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幻想》，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88 页。

实践的必经之途：从 17 世纪末初次成型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到不同国家形成思潮的不同模式，再到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传播方式，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影响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拓宽传统思想史视野、描绘知识社会史的重要课题。国内政治秩序是自由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君主立宪国与民主共和国等不同的国体、议会制与总统制等不同的政体、两党制与多党制等不同的政党制度、单一制与联邦制等不同的国家结构、小政府与大政府等不同的政府规模，都是自由主义思潮与不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国际政治秩序则是前面两者扩张形成的整体格局：从英国强调均势和间接统治的古典自由主义秩序，到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对整个欧洲均势体系的冲击，再到美国和苏联将思潮和秩序推广到东西半球，到最后自由主义霸权成为整个世界学习和反抗的主题，现代国际秩序逐渐从英国走向全球，也反过来成为影响思潮和国内秩序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

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潮、作为国内秩序和作为国际秩序的前景略作展望。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已多年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但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却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网络时代的自由主义传播是否能克服极化与浅薄化的弊病，培养成熟理性的公民和政治家，又能否在异质性的多族群社会中成功应对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等其他思潮的挑战，这都与自由主义能否继续扮演主流角色息息相关。作为国内秩序的自由主义，已经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经济增长等理念写到了所有现代国家的发展议程中。但不同国家如何探索适合自己的不同制度，又如何解决国家构建和贫富分化的顽疾，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一直与不平等的霸权体系相伴相生，这使得国家间的和平、合作总是与冲突、不平等同时出现。而在世界实力格局趋向多元化的未来，能否超越霸权轮替的历史，想象一种国内与国际层面都更加自由平等的秩序，对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世界都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Abstract】 The world politics studies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houghts, domestic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modern world, liberalis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as evolved into a trend of thought and shap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At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through classical liberalism, an imperial model of small government and indirect rule was established in Britain.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liberalism began to breed more political options in different social form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hich impact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New Deal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provided two sets of transform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it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to “three worlds”. From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conservative liberalism has returned, and world politics has changed from three divisions to a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 so-called liberal order and a non-liberal order. To sum up,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two major fields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both related to liberalism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ir future will also depend on the direction of liberalism.

【Key Words】 Modern World Politics, Political Thoughts, Liberalism,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ытается объяснить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ую связь между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тенденциями мышл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им порядко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Будучи самой влият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ью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либерализм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мысли в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ериод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л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и внешнего порядка. В конце 17 века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либерализм установил дл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имперскую модель мал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непрям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В конце 18-го века либерализм начал порождать больш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ариантов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формах США и Франции, что повлияло 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подобных систем Европы. В начале 20-го века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новым либерализмом и социализмом обеспечила два комплексных план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ля пост-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превращ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три мира”. С конца 20-го века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вернулся,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зменилась с тре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н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бинарную оппозицию между либераль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и нелибераль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Подводя итог,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основ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вязаны с тенденциями либеральной мысли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и их будущее также будет зависеть от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либерализм,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责任编辑 李 恪)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欧盟与俄乌冲突：困境与出路

门 镜*

【内容提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俄乌冲突不断升级。虽然欧盟没有直接参与冲突，但在财政支持、武器配备、人员培训和难民接收等方面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先后推出了九轮制裁俄罗斯的措施。这些制裁措施虽然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能源出口等领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但也使欧盟自身承受着由对俄制裁引发的通货膨胀和能源粮食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后果，民众怨声载道。欧盟陷入俄乌冲突的泥潭，无力自拔，面临着重重困难。危机使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遭遇了不小的挑战。对于欧盟而言，应对危机和解决困境的重要出路在于尽早促进俄乌停战。

【关键词】俄乌冲突 俄欧关系 欧洲能源安全 欧洲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D85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087(20)

二战结束以后，欧盟创始国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逐渐走出战争阴影，致力于战后的重建和发展，以维护和平为首要目的，把德国和法国的工业捆绑在一起，通过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吸收了周边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意大利，并随后建立了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至冷战结束前，欧洲共同体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并经过四次扩大拥有了15个成员国，成为发达国家集团。冷战结束后不久，欧盟于1993年成立，除了把欧共体的发展目标纳入其任务范围，还增加了对外关系和对内司法合作等内容。作为一个集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特点于一身的地区性多边合作组织，欧盟不仅在国际上作为价值观、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重要力量存在，而且筹划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 门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对比之下，冷战期间，中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带领下经济发展落后，与苏联的关系出现严重矛盾，在苏联解体以后纷纷表示要加入欧盟。2004 年欧盟的第五轮扩大标志着欧盟对俄关系的一个重要胜利。中东欧的重要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三国顺利加入欧盟，使欧盟与俄罗斯的影响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入盟谈判外，欧盟还通过伙伴合作协定、东部伙伴关系等机制对原苏联国家输出影响，使俄罗斯在东欧、东南欧和中亚等地区面临越来越强大的来自欧盟的竞争。欧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曾与俄罗斯达成伙伴与合作协定，确立了一揽子的合作内容，但是该协定在 2006 年到期后没有续签。2008 年，双方虽然在谈判一个新的全面合作协议，但由于在合作前景方面存在巨大分歧，谈判无疾而终。

乌克兰夹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西乌克兰人更倾向于向西看，加入欧盟；东乌克兰人则更愿意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近年来，俄乌之间的矛盾加剧。2014 年乌克兰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以后，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的部分地区，包括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提供支持。欧盟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虽然俄乌之间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了明斯克协议，但多年来，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没有履行协议内容。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使得 2014 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大幅升级。2022 年 3 月 2 日，联合国大会以 141 票赞成、5 票反对、35 票弃权通过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的决议，要求俄罗斯军队全面撤出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带领的西方国家坚决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2022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代表签署有关条约，允许这四个地区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

自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欧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但是从财政支持到武器配备，再到人员培训和难民接收忙得不亦乐乎。2022 年 9 月末，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被炸，虽然到现在不知谁是操盘手，但此举直接断送了德国从俄罗斯得到天然气的可能性，彻底把俄罗斯从德国能源供应者的名单上清除了。随后，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大桥也遭到破坏。乌克兰首都基辅及

其他一些城市遭到了俄罗斯的报复性轰炸。乌克兰在欧美的支持下在收复失地，俄罗斯为了巩固上述四个地区加入的成果，很有可能会升级战争规模。俄乌之间越斗越狠，而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在逐步升级。这些制裁措施虽然有力地打击了俄罗斯的金融、经贸等领域，但由于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欧盟正在面临通胀和能源、粮食价格的上涨，民众的怨声越来越大。欧盟被陷在俄乌战争的泥潭里无力自拔，未来困难重重。

一、欧盟的立场：政治正确与现实压力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由于各种利益纠葛，虽然竞争关系不可避免，但欧盟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与乌克兰走到战争的地步。巴尔干半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前南斯拉夫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从规模和影响上比俄乌战争要小得多。而且，前南国家的冲突发生在欧盟东扩之前，从地理上讲，欧盟还没有直接面对军事冲突的威胁。现如今，欧盟版图的扩大使其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近邻。乌克兰为了抵御俄罗斯的影响，一直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再也无法置身事外。2021 年底至 2022 年 2 月，德法领导人及欧盟对外行动署忙于俄乌之间的斡旋，希望凭外交努力阻止军事冲突。除了俄乌之间的直接矛盾，美国和北约的行为对俄乌的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欧盟在经贸领域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没有军队的支持，又在外交和战略上受美国左右，很难凭一己之力阻止俄乌冲突的爆发。俄乌冲突极大地破坏了欧盟主要创始国自二战以来维护地区和平的努力。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后，在价值观的驱动下，欧盟选择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而且，这场军事行动也给欧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促使欧盟向美国靠拢。原来对北约颇有微词的一些欧盟成员国也改变了立场。马克龙曾毫不含糊地指出“北约已经脑死亡”^①，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他承认北约存在的价值及其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角色，并积极参加在北约框架下的合作；而且还表态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

^① “NATO is suffering ‘brain death’, argues French president Macron”, *France 24*,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1107-macron-claims-nato-is-suffering-brain-death>

援助，直到以基辅可接受的条件取得“胜利”。^①

在 2022 年 2 月之前，乌克兰与欧盟的关系是在东部伙伴关系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欧盟通过深化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家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合作来发挥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发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为尽快接纳乌克兰难民，欧盟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启动了临时保护指令，开放欧盟边界。乌克兰人不需要通过冗长的庇护程序申请就可以进入欧盟成员国境内。但指令提供的保护只是临时的，初始期限为一年，可延长至 2024 年。^②

乌克兰政府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正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并希望欧盟尽快批准。欧盟内部为此展开紧急磋商，基于政治考虑，支持乌克兰入盟的声音很大。但加入欧盟的谈判周期一般很长，乌克兰不可能于近期入盟。为了表示欧盟对乌克兰坚定支持的态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先后访问了基辅。而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借访问乌克兰议会的机会高调宣布欢迎乌克兰成为候选国，并承诺欧盟将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道路上与其“并肩同行”。^③2022 年 6 月 23 日，欧盟理事会授予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地位。

虽然在感情上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但乌克兰拿到候选国资格只是第一步，成为正式成员国的道路可能漫长而艰巨。据 2022 年 6 月于基辅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 70% 的乌克兰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加入欧盟。目前即便有八个成员国支持泽连斯基关于加快进程的呼吁，如果欧盟

① See “France to boost its forces on NATO’s eastern flank after Russian missile strikes on Ukraine”, *Euronews*,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euronews.com/2022/10/11/france-to-boost-its-forces-on-natos-eastern-flank-after-russian-missile-strikes-on-ukraine>; Chiara Albanese, Andra Timu, Michael Nienaber, “Scholz, Macron, Draghi Show Kyiv Support as War Roils Energy”, *Bloomberg*, June 15,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6-15/scholz-macron-draghi-plan-joint-visit-to-kyiv-on-thursday?leadSource=verify%20wall>

② See Sergio Carrera, “Temporary protection for some, not for the many”, in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The EU’s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EPS Report, May 30, 2022, pp.4-6.

③ See Ilya Gridneff, “European Parliament chief to Ukraine MPs: We will aid ‘every step’ of EU bid”, *Politico*, July 28,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parliament-roberta-metsola-ukraine-membership/>

不彻底重新考虑其成员准入资格的标准，乌克兰人一定会感到失望。^①此外，在乌克兰成为候选国之前，已经有五个国家在排队，而且这些国家与欧盟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入盟谈判。尤其是土耳其，1987年就已经成为候选国，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在欧盟门外徘徊。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也都望眼欲穿，入盟谈判已持续了十年。这意味着，候选国身份只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承诺，^②乌克兰很难以俄乌战争为理由快速加入欧盟。

俄乌冲突的爆发表明欧盟严重低估了俄乌之间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态度会使俄罗斯孤注一掷。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冲突都会对欧盟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2022年3月10日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中坦诚地表示，“有些时候我们本可以做出更好的反应。例如，我们提出了我们无法保证的事情，特别是乌克兰加入北约。我认为做出我们无法兑现的承诺是错误的。我们失去了让俄罗斯更接近西方的机会……”^③欧盟内部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对自身魅力和模式的过度自信削弱了其对自身和世界的正确判断。自由民主和多元化虽然有吸引力，但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通过自由主义改变周边邻国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期望已被证明是虚幻的。给乌克兰候选国地位不是当前危机的解决方案。^④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坚决站在乌克兰一边，在其宣读盟情咨文时，不仅多次提到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把乌克兰总统夫人请到现场，并表示在会后要再次奔赴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冯德莱恩在对俄罗斯制裁上的立场与美国高度一致，二者之间紧密协调。迄今为止，欧盟对俄罗斯宣布了九轮制裁措施，目的在于全方位减少俄罗斯的财政

① See Matthias Matthijs, “Ukraine Could Become an EU Member. What Would That M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8, 2022, <https://www.cfr.org/in-brief/ukraine-could-become-eu-member-what-would-mean>

② See Jamie Shea, “Can Ukraine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iends of Europe, June 17, 2022, <https://www.friendsofeurope.org/insights/can-ukraine-become-a-member-of-the-european-union/>

③ “War in Ukraine: Interview with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Josep Borrell”, France 24, March 10,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cRJA0GoCI>

④ See Corina Stratulat, “War has returned to Europe: Three reasons why the EU did not see it coming”, European Policy Centre, April 28, 2022, pp.4-5, https://www.epc.eu/content/PDF/2022/War_has_returned_to_Europe_DP.pdf

资源，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经济贸易金融压力，迫使其尽快从乌克兰全面撤军。俄乌冲突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除交战双方外的其他方面对参战一方的敌意是通过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制裁表现出来的。欧美避免直接卷入冲突，试图用经济武器帮助乌克兰打一场准常规的战争来赢得胜利。^①然而，2022 年 10 月，《欧洲政治周报》网站发布文章认为，冯德莱恩在制定制裁方案时很少与其他欧委会专员及小成员国沟通，确实危及了一些成员国的利益，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②

德国基尔研究所 2022 年 8 月提供的数据表明，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自 2022 年 4 月以来一直在减少，并且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这六个欧洲大国整个 7 月没有向乌克兰提出新的双边军事承诺。^③尽管欧盟委员会已于 5 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近 90 亿欧元的优惠贷款，但进展非常缓慢。多项指标表明，乌克兰自 2022 年 2 月以来所遭受的苦难远比俄罗斯严重。卢布在 6 月达到了七年来的最高点（兑美元汇率为 54.47），而乌克兰的货币格里夫纳的汇率则处于十年以来的最低点（兑美元汇率为 36.84）。有预测说，俄罗斯 2022 年的 GDP 将下降 11.2%，而乌克兰的 GDP 可能收缩 45%。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在 4 月达到了 17% 的峰值。乌克兰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并于 7 月达到了 22.2%。2022 年 2—8 月，欧盟向俄罗斯支付的能源费用已达 820 亿欧元，相比之下，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仅有 61 亿欧元。^④

2022 年 6 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虽然俄乌开战的最初 100 天内欧洲舆论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但后来的民意调查（参与调查的欧洲总人数接近 8000 人）显示，只有波兰、德国、瑞典和芬兰有大

① See Belinda Romero Pedrazm, "Economic war against Russia", Spanish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2, No.58, p.6, https://www.ieee.es/Galerias/fichero/docs_opinion/2022/DIEEO58_2022_BELROM_Rusia_ENG.pdf

② See Suzanne Lynch, Gridneff, "Europe's American president: The paradox of Ursula von der Leyen", *Politico*, October 6,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american-president-paradox-ursula-von-der-leyen/>

③ See Ilya Gridneff, "Europe's powers gave Ukraine no new military pledges in July, data shows", *Politico*, August 17,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ata-show-europe-waning-military-support-ukraine/>

④ See Luis Garicano,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Ukraine can't wait", *Politico*, August 18,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inancial-assistance-west-eu-ukraine-russia-war/>

量公众支持增加军费开支，不同意见可能会越来越削弱欧盟内部的团结性。欧洲人对俄乌冲突的关心正在从俄乌军事斗争的战场转向如何结束冲突，以及俄乌冲突对民生、对他们各自的国家及欧盟的影响等问题。欧洲人越来越意识到战争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影响，包括高通胀、能源和粮食危机。虽然欧洲人站在乌克兰一边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他们对长期目标存在分歧。在接受民意调查的人群中，35%的人属于“和平”阵营，希望尽快结束战争。22%的人属于“正义”阵营，认为更紧迫的目标是惩罚俄罗斯。20%的人属于“摇摆派”，他们既想要“正义”，又害怕冲突升级。在所有参与民意调查的欧洲国家中，除波兰外，其他国家的“和平”阵营的人数都大于“正义”阵营人数。欧洲人担心经济制裁的成本和核威胁，反对旷日持久的战争。由于战争形势并没有向欧洲民众所期望的方向快速转变，成员国政府需要努力维持对莫斯科的制裁与消除成员国意见分歧的平衡，而随着欧盟的既定立场与公众情绪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①

二、俄乌冲突与欧盟的能源及粮食安全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世界重要的能源、粮食出口国。俄乌战争爆发前，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能源、粮食和化肥的价格已经在上升。如今，世界正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包括能源供应短缺、粮食安全、通货膨胀等问题。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欧俄之间能源关系一直都很紧密。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是向欧盟出口化石燃料（天然气、石油和煤炭）最重要的国家。长期以来，欧盟内部一直认为，经济利益将阻止俄罗斯以能源为武器。而现如今，欧盟不得不为自己主动改变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尤其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高度依赖）而付出高昂代价。^②在三种

^① See Ivan Krastev, Mark Leonard, “Peace versus Justice: The coming European split over the war in Ukrain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22, <https://ecfr.eu/publication/peace-versus-justice-the-coming-european-split-over-the-war-in-ukraine/>

^② See Christian Egenhofer, Vasileios Rizos, “Energy, Resources and Ukraine: Only more of the Same but Faster?” in Sergio Carrera et al.,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The EU’s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EPS Report, May 30, 2022, pp.23-25.

化石燃料中，欧盟对俄罗斯煤炭进口的禁令是最容易达成和实施的。煤炭仅占欧盟能源进口总量的 6%，2020 年欧盟仅从俄罗斯进口了 40 亿欧元的煤炭。虽然 2021 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煤炭的支出增加至 80 亿欧元，但这对欧盟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①不少中东欧国家有煤矿，2020 年欧洲投资银行的报告显示，欧盟仍有 12 个成员国的 41 个地区还在开采煤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委会在上台以后强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任务，承诺支持煤炭和碳密集型地区向新模式的转变，要求各成员国逐步向更加绿色未来的过渡。由于俄乌冲突和煤炭进口禁令，成员国对煤炭的开采虽然会影响欧委会既定的绿色目标，但并不会对欧盟的煤炭供应产生太大影响。^②

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2021 年俄罗斯的石油销售收入约为 1800 亿美元，其中，欧盟为俄罗斯石油支付了 1000 多亿欧元。因此，2022 年对俄罗斯石油进口的制裁会给欧盟经济带来很大影响。^③对欧盟产生更大经济影响的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禁运。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消费量的近 40%，欧盟很难快速找到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来源和供应商。受俄乌冲突的影响，2022 年 3 月底，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飙升到 2005 年至 2021 年年中平均价格的四倍多。消除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需要一个过程，这意味着欧洲的能源价格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④

就一些具体成员国而言，许多东部成员国的发电仍然依赖煤炭，因此天然气在其整体能源结构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低。而德国和奥地利约有 65% 的电力供应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就绝对值而言，德国和意大利合计消耗的天然

① See André Algermißen et al., “A turning point for sustainability?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paper series, No.1, 2022, <https://www.kas.de/document/s/252038/16166715/A+turning+point+for+sustainability.pdf/883a761f-078c-f149-4c58-69c625b5d006?version=1.0&t=165123722449>

② Se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Group, “Coal Regions in Transition: Overview 2020”, 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thematic/coal_regions_in_transition_overview_2020_en.pdf

③ See Christian Egenhofer, Vasileios Rizos, “Energy, Resources and Ukraine: Only More of the Same but Faster?” in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The EU’s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EPS Report, pp.23-25.

④ See Cinzia Alcidi, “A united EU front must be maintained to weather the macroeconomic costs of the war”, in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The EU’s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EPS Report, p.17.

气总量约占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总量的一半左右。^①俄罗斯是德国天然气、原油和煤炭的主要供应国。根据德国联邦环境署的数据，德国大约70%的能源供应来自进口。2019年，德国有51%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德国工业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因此有报告指出，这可能导致德国工业崩溃、大量企业破产以及GDP的大幅下降。此外，德国的经济与邻国密切相关，进口制裁也会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产生负面影响。^②

欧盟的欧洲稳定机制在2022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俄罗斯从2022年8月起对欧盟全面断气，欧盟将在2022年底耗尽天然气储备。因此，欧盟要么缩减生产规模，但这样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要么持续节省天然气，帮助减轻停止进口天然气对制造业的影响。然而，实行天然气配给，将引发欧元区经济衰退。据相关预测数据显示，欧元区的几大经济体将受到重创，其中包括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GDP将在2023年下降约2.5%；虽然法国和西班牙的能源结构不同，对俄罗斯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但也会由于贸易关系和供应链的问题受到间接的不利影响。^③

事实上，俄罗斯在2022年8月31日以技术原因为由停止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并试图通过断气给欧洲施加压力，迫使欧洲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④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9月下旬，“北溪-1”、“北溪-2”天然气管道遭到人为破坏，1号管道泄漏严重（2号管道还没有启用），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就此无限期关闭。虽然我们无从得知破坏天然气管道的幕后黑手是谁，但密切关注俄乌冲突的人们都很清楚，俄罗斯希望用天然气换取收入，并且用天然气当作筹码使欧盟为了自身的能源利益改变对俄罗斯的敌视。输气管道遭到破坏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被切断，俄

① See Christian Egenhofer and Vasileios Rizos, “Energy, Resources and Ukraine: Only more of the Same but Faster?” in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The EU’s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CEPS Report, p.24.

② See André Algermißen et al., “A turning point for sustainability?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③ See Angela Capolongo, Michael Kühl, Vlad Skovorodov, “Cold winter ahead? Implications from a Russian gas cut-off for the euro area”, August 9, 2022, <https://www.sm.europa.eu/blog/cold-winter-ahead-implications-russian-gas-cut-euro-area>

④ See Sam Meredith, “Russia has cut off gas supplies to Europe indefinitely.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CNBC, September 6, 2022, <http://www.cnbc.com/2022/09/06/energy-crisis-why-has-russia-cut-off-gas-supplies-to-europe.html>

罗斯很难再用能源供给威胁欧盟成员国，来自欧盟的收入也会锐减，炸毁输气管道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了避免俄罗斯能源与欧盟成员国脱钩，普京建议通过“北溪-2”管道泵送天然气，但遭到了德国拒绝。^①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表示，以前对俄罗斯的态度过于软弱，过重依赖其能源，需要重新评估对俄罗斯的政策。德国“应在欧洲建立新的和平秩序和在动荡的世界中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②。

为了应对能源困境，欧盟成员国一方面同意并减少 15% 的天然气使用量，^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同意制定天然气价格上限。^④另一方面，努力寻找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国。德国可以通过管道从英国、丹麦、挪威和荷兰进口天然气。南欧可以通过通往意大利的跨亚得里亚海管道和通过土耳其的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接收阿塞拜疆天然气。从美国、卡塔尔和其他国家进口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从挪威经由丹麦到波兰的波罗的海管道已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开始运营。^⑤

尽管短期内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化石燃料供应渠道需要扩大和进一步稳固，但从中期来看，欧盟是可以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的。2022 年 3 月初，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名为“REPowerEU”的能源计划，探索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加速转型，摆脱碳密集能源。该计划旨在 2030 年之前使欧盟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为迅

① See “Factbox: Europe’s alternatives if Russia shuts off gas supply”, Reuters, October 20,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europes-alternatives-if-russia-shuts-off-gas-supply-2022-10-20/>

② Hans Von Der Burchard, “‘We failed’ on Russia: Top German Social Democrat offers mea culpa”, *Politico*, October 19,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we-failed-germany-dependence-on-russia-social-democrat-said/>

③ Se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adopts regulation on reducing gas demand by 15% this winter”, August 5,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8/05/council-adopts-regulation-on-reducing-gas-demand-by-15-this-winter/#:~:text=Member%20states%20agreed%20to%20reduce,measures%20of%20their%20own%20choice>

④ See Suzanne Lynch, Clea Caulcutt, Jacopo Barigazzi, Hans Von Der Burchard, “Germany gives ground and allows EU to edge toward energy price cap”, *Politico*, October 21, 2022, http://www.politico.eu/article/eu-leaders-progress-energy-price-cap-euco-summit-conclusions-olaf-scholz/?utm_source=POLITICO.EU&utm_campaign=d33b626551-EMAIL_CAMPAIGN_2022_10_21_04_52&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10959edeb5-d33b626551-190000089

⑤ See “Factbox: Europe’s alternatives if Russia shuts off gas supply”, October 20, 2022.

速减少对进口能源依赖所做的努力，也有可能導致气候和环境政策方面的牺牲——这些国家正在延长燃煤发电站的使用寿命以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虽然德国剩下的最后三个核电站可能在年底关闭，但欧洲其他地区的核电正在经历某种复兴。例如，比利时为了能源安全和能源价格的稳定，将 2025 年淘汰核能的计划推迟了十年。捷克一项计划于 2036 年投入运行的新的反应堆建设项目最近进行了招标，建设成本预计略低于 65 亿欧元；而波兰也计划成为第 15 个启动和平利用核能的欧盟国家。^①

俄乌冲突还对世界粮食供应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葵花籽油、大麦、小麦和玉米的主要生产国。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和第二大葵花籽油出口国。乌克兰是最大的葵花籽油出口国、第四大玉米出口国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②两国的小麦出口总量约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玉米——19%，葵花籽油——80%。^③2019 年，爱沙尼亚、立陶宛、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超 50% 的葵花籽油供应依靠进口。爱沙尼亚、荷兰和立陶宛的进口量大大超过了其国内生产的供应量（比重分别为 182%、180%、124%），这些葵花籽油多用于储备或加工其他产品出口。这些国家加上法国，一共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了超过本国葵花籽油总进口量的 50%；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和丹麦从俄乌进口了超过国内玉米总进口量的 50%。而且，出于储备的目的，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国内供应。希腊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的份额最高，约占其国内供应量的 10%；西班牙是第二大进口国，占比略高于 5%。^④尽管如此，欧盟自给自足的程度相对较高，不太可能出现供应危机，但粮食供应短缺所引发的政策调整不容忽视。本届欧委会在 2019 年底上台时对气候变化指标雄心勃勃，计划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到 2023 年向自然退还 4% 的耕地，如果农产

① See André Algermißen et al., “A turning point for sustainability?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② See Tim G. Benton et al., “The Ukraine war and threats to food and energy security Cascading risks from rising prices and supply disruptions”, Chatham House, April 13,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4/ukraine-war-and-threats-food-and-energy-security>

③ See André Algermißen et al., “A turning point for sustainability?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④ See Andreas Kopp, “The EU’s Response to the Collapse of Ukraine’s Food Exports: More Transport than Agricultural Policy”, in *A transformational moment? The EU’s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pp.29-31.

品市场的危机继续恶化，欧委会将不得不调整其政策目标。此外，欧委会到 2030 年将有机农业增加到至少 25% 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中设定的时间表几乎无法实现。同时，减少使用化肥和植保产品的日期也可能被推迟。^①

另外，粮食供应链正在受到破坏。乌克兰的粮食外运受阻，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农产品市场也造成冲击，同时，俄罗斯出口大幅减少，粮食价格飞快上涨。受此影响，肉类和畜牧业的饲料价格也有所上涨。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2022 年初，全球已有 2.76 亿人面临严重饥饿，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 4700 万人，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幅最大。如果粮食无法通过黑海港口从乌克兰的粮仓中顺利运出，会造成世界粮食短缺。而且，乌克兰农民将无处储存 2022 年的夏季收成。由于秋季播种困难，预计下一次收成将减少 20%—30%。^②

三、欧盟的内部挑战

俄乌冲突持续，局势混乱，欧盟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欧盟反应快速，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俄制裁政策，高调给予乌克兰支持。然而，对俄制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但未能迅速有效地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也没能尽快达到逼迫俄罗斯退兵的目的，反而对欧盟成员国自身的经济利益造成伤害。尽管欧盟仍然维持着共同对付俄罗斯的统一阵线，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能源价格和各种生活成本的飙升，饱受其苦的欧盟成员国民众发起了抗议行动。欧盟正在俄乌冲突的炮火中经受着严峻的政治考验和经济考验。

俄乌冲突暴露了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中东欧国家与德法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法德对俄乌冲突的未来充满疑虑，他们无法确定乌克兰的获胜会带来什么，也无法确定这样的胜利是否可以在北约不直接卷入和俄罗斯

① See André Algermißen et al., “A turning point for sustainability?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② See “WFP calls for urgent opening of Ukrainian ports to help rein in global hunger crisis”, May 6, 2022, <https://www.wfp.org/news/wfp-calls-urgent-opening-ukrainian-ports-help-rein-global-hunger-crisis>

不使用非常规武器的情况下实现。^①俄乌冲突持续半年后，法德仍不确定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朝哪个方向引领欧洲。^②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方面谴责俄罗斯，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乌克兰“终归要同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上”。他在 2022 年 5 月至 6 月间几次警告欧洲其他国家不要羞辱俄罗斯，并表示法国可以帮助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③马克龙站在乌克兰一边，但又避免将俄罗斯称为“恐怖主义国家”，明确表示俄罗斯总统仍然是对话者。他在 10 月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承诺，会在必要时与俄罗斯方面会谈。^④

进口相对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是德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核心步骤，德国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构成了其工业发展的主要弱点。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保持着慷慨激昂的言辞，宣布了多项针对性举措，包括提高德国国防预算，以及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然而，直到 2022 年 8 月，德国总理朔尔茨也没有就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未来、德国打算在欧洲集体安全中扮演的角色、德国改进的军队对抵御俄罗斯威胁的贡献等提出任何严肃的战略或计划。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这项举措的具体实施也处于拖延之中。^⑤

法德的合作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各种危机面前，法德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种利益冲突遇到困难。^⑥法德政府推迟了两年一次的联合内阁会议，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自 1963 年两

^① Mujtaba Rahman, “EU support for Ukraine, the next six months”, *Politico*, October 22,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support-for-ukraine-the-next-six-months/>

^② Ivan Kratsev, “The Ukraine War: A Resilience Tes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 Montaigne,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analysis/ukraine-war-resilience-test-european-union>

^③ Manuel Ausloos, “France’s Macron: Ukrain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negotiate with Russia at some point”, *Reuters*, June 1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frances-macron-ukraine-president-will-have-negotiate-with-russia-some-point-2022-06-15/>

^④ See Cédric Pietralunga, Philippe Ricard, “Macron hopes for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Le Monde*, October 26, https://www.lemonde.fr/en/international/article/2022/10/13/emmanuel-macron-hopes-for-negotiations-between-russia-and-ukraine_6000156_4.html

^⑤ See Lukas Paul, Schmelter Bastian, Matteo Scianna, “It’s Time for Olaf Scholz to Walk His Talk”, October 9, 2022, <http://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its-time-olaf-scholz-walk-his-talk>

^⑥ See Hans Von Der Burchard, “Franco-German tiff threatens to knock EU off balance”, *Politico*, October 19,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rance-and-germany-postpone-bilateral-summit-until-january/?utm_source=POLITICO.EU&utm_campaign=35aa7a7546-EMAIL_CAMPAIGN_2022_10_26_04_27&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10959edeb5-35aa7a7546-190000089

国建立这个双边沟通机制以来，会议从来没有被延迟过。法国虽然表面上说会议的延迟不能说明法德关系出了问题，但马克龙反对德国和西班牙为了取代日益减少的俄罗斯能源供应而推动的在比利牛斯山脉建造天然气管道（MidCat）将阿尔及利亚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欧洲的计划。马克龙对德国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决定也表示不满。另外，德国为了保护其工业和消费者免受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在没有事先跟法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出台了一项 2000 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德国《镜报》认为，“法德关系再次陷入危机”，而且“双方的口角似乎比以往更加严重，有可能削弱欧盟的行动能力”。^①法国媒体也煞有介事地说，“德法之间又有了战争的可能性。”^②

在欧盟成员国中，法德历来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但俄乌冲突使欧洲的政治地理发生了改变，重心开始移至东方。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捷克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时就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中东欧获得了新的重要性。^③俄乌冲突给欧盟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也给了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发声的机会。他尖锐地批评道，欧洲拒绝倾听真理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多年来一直来自波兰。他指责西方既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提及日益严重的问题，但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的注视下缓慢重建着自身的地位。^④莫拉维茨基代表这些中东欧国家一再警告“老欧洲”，要警惕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不要对俄罗斯的意图抱有任何幻想。他批评法德的立场，直截了当地表示，在俄罗斯问题上“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⑤。

波兰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因为种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多次受到欧盟及其他成员国的批评。借俄乌战争，波兰代表中东欧这些新欧盟成员国站在反俄最前线，批评老欧盟成员国，痛斥德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做得不够，而且

① See Lisa Louis, “France-Germany tensions hamstring EU’s capacity to act”, Oct. 26, 2022, <https://www.dw.com/en/france-germany-tensions-hamstring-eus-capacity-to-act/a-63544901>

② Michele Barbero, “Germany’s Awakening Piques France’s Amour-Propr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4, 2022, <http://foreignpolicy.com/2022/11/04/germany-france-military-europe-eu-divisions/>

③ See Ivan Kratsev, “The Ukraine War: A Resilience Tes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④ Mateusz Morawiecki, “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false directions – Europe at the crossroads”, October 10, 2022, <https://www.gov.pl/web/cyprus/article-by-the-prime-minister-of-the-republic-of-poland-mateusz-morawiecki-historical-challenges-and-false-directions---europe-at-the-crossroads>

⑤ Ivan Kratsev, “The Ukraine War: A Resilience Tes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要求柏林为二战中纳粹对波兰的占领支付巨额赔偿金。^①波兰市场与社会研究所（IBRiS）在 2022 年 8 月做的民意测试中发现，十个波兰人中只有一个对德国有好感。35.9% 的人认为波德关系相当糟糕，15.9% 的人认为波德关系确实糟糕。^②波兰对德国充满了不信任，而俄乌战争把两国之间的芥蒂暴露得更加明显。

欧洲的能源危机早已演变为生活成本的危机，并已经开始在一些成员国演变为政治危机。尽管各国政府纷纷出台补贴政策，但能源价格仍然高居不下。^③欧盟成员国已经开始感受到这场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却还要继续拿钱提供更多的军事资源以维持乌克兰的经济和对俄战争。2022 年 9 月至 10 月，全欧洲发生了多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从法国到德国，从意大利到捷克……民众要求政府控制能源价格，保障能源安全，应对通货膨胀，指责政府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④谴责北约的“好战行为”，^⑤表达对基本生活水平保障的诉求。^⑥

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和欧盟创始国，总理德拉吉代表的执政联盟与五星运动党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国内经济状况堪忧，就业市场低迷。意大利的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打击，对俄制裁又使意大利的经济雪上加霜，高油价将意大利推入经济困境。在 2022 年 6 月意大利的一次民调测试中，有一半的民众表示反对为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

① Judy Dempsey, “Ukraine Exposes Europe’s Competing Narratives About Russia”, October 4, 2022,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88084>

② Archiwum Turczyk, “One in 10 Poles positive about relations with Germany”, *The First News*, August 26, 2022, <https://www.thefirstnews.com/article/one-in-10-poles-positive-about-relations-with-germany-32641>

③ See Olivia Fletcher, “European Energy Bills Hit Record Despite Government Support”, November 7,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11-07/european-energy-bills-hit-record-despite-government-support?leadSource=uverify%20wall>

④ See “Germany: Far-right demo protests Russia sanctions, energy policy”, Deutsche Welle, October 8, 2022, <https://www.dw.com/en/germany-far-right-demo-protests-russia-sanctions-energy-policy/a-63380291>

⑤ See “Europe engulfed in deeper crisis as new waves of protests unfold over rising energy cost, inflation”, *Global Times*, October 11,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10/1276862.shtml>

⑥ See Clea Caulcutt, “Macron faces risk of protests spreading in wake of oil strike”, *Politico*, October 16,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mmanuel-macron-france-faces-risk-of-protest-spreading-in-oil-strike/>

器。^①2022 年 7 月德拉吉辞职，代表民粹主义的意大利极右翼领袖梅洛尼领导意大利兄弟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总理，组建了意大利自二战以来最右翼的政府。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内，瑞典极右翼党派民主党自 2010 年进入国会，在 2022 年 9 月的选举中大胜，在议会中获得了 73 席，上升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成为右派内部最大单一政党。此外，极右翼政党在很多国家的影响力也在日益上升。据预测，2023 年的西班牙和芬兰大选，极右翼政党很有可能与其他政党共同组阁。这波民粹主义浪潮反映了选民对目前欧洲面临的政治、经济、移民等各种危机及处理的极度不满，如欧盟及其成员国不能反思问题根源，民粹主义将会更加汹涌澎湃。^②

保加利亚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伊万·克拉特谢夫 (Ivan Kratsev) 认为，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所面临的危机一波未平，又在俄乌冲突的促动下一波又起。在经济上，俄乌冲突与国际金融海啸、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危机具有共同特征。欧洲各国政府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花费更多，而不是为民众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在移民方面，与叙利亚战争后的移民相比，乌克兰危机给欧盟带来了两倍的移民。而且，俄乌战争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地理，将重心移至东方。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新的世界混乱”，而不是一种“世界秩序”。^③

四、出路在何方？

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多方面的威胁，破坏了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从根本上改变着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遭遇了强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欧盟仍然很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2022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 180 亿欧元援助的决定，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资金，帮助其恢复关键基础设施，并为战后重建提供初步支持。成员国之间经过谈判和妥协最终达成这一援助乌克兰的决定，说明欧盟在经历种种困难

^① See Colm Quinn, “Will a New Italian Government Go Soft on Russia?” *Foreign Policy*, July 22,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22/italy-meloni-draghi-russia/>

^② See Anthony J. Constantini, “Understanding Europe’s shift to the right”, *Politico*, September 10, 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nderstanding-europes-shift-to-the-right/>

^③ See Ivan Kratsev, “The Ukraine War: A Resilience Tes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后仍然能够统一对俄乌冲突的认识。对欧盟来说，只要普京继续掌权，欧盟就会一直对俄罗斯采取遏制和威慑的政策和手段。只有当俄罗斯政府内部发生权力变化，欧盟才有可能与俄罗斯缓和关系。^①

为了确保乌克兰的最终胜利，欧盟需要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需要做好长期的战争准备。^②但欧盟不可能无限期地资助乌克兰，因为这样做不仅会影响欧盟自身的经济发展，也会引发更多的民众抗议，进而导致成员国之间出现利益分歧。虽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政治正确的引导可以在危机当中将成员国聚拢在一起，但从长远角度看，欧盟成员国不能不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因为这些因素决定着政府信用的得失以及选举的成败。

欧盟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与俄乌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欧盟也期盼这场冲突早日结束。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欧洲人就已经在谈论这场冲突的结束问题。^③现在，随着乌克兰在欧美的支持下向俄罗斯发起反攻，关于俄乌冲突结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可能获胜，它与西方关系的破裂将是长期的。而欧盟与俄罗斯的外交接触也仅限于防止新的冲突升级或战斗的恢复。^④

欧盟近年来以战略自主为导向，大幅调整内外政策，希望在具有重要战略性的政策领域排除对他国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的能力。然而，俄乌冲突虽然迫使欧盟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却加重了欧盟对美国的依赖。欧盟不仅在对俄制裁的步伐上与美国密切协调，而且，美国正在成为欧盟的不

^① See Tony van der Togt,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Russia-West Relations”, Clingendael, December 9, 2022,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three-scenarios-future-russia-west-relations>

^② Piotr Buras, Marie Dumoulin, Gustav Gressel, Jeremy Shapiro, “Survive and thrive: A European plan to support Ukraine in the long war against Russia”,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ptember 9, 2022, <https://ecfr.eu/publication/survive-and-thrive-a-european-plan-to-support-ukraine-in-the-long-war-against-russia/>

^③ James Landale, “Ukraine: How might the war end? Five scenarios”, *BBC*, March 3,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0602936>; Michel Duclos, “The War in Ukraine – Scenarios for a ‘Way Out’ of the Crisis”, Institut Montaigne, March 22, 2022,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analysis/war-ukraine-scenarios-way-out-crisis>

^④ Ivan Kratsev, “The Ukraine War: A Resilience Tes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Stefan Meister, “A Paradigm Shift: EU-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in Ukraine”, November 29, 2022,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2/11/29/paradigm-shift-eu-russia-relations-after-war-in-ukraine-pub-88476>

可替代的能源供应者。随着俄罗斯逐步退出欧洲市场，2022 年上半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部分填补了俄罗斯留下的真空。10 月底，美国已向欧洲供应了接近原来俄罗斯预计的全年供应量一半的天然气，即 400 亿立方米。^①欧盟出于能源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更加紧跟在美国身后，更加遵从美国的领导，这将会进一步限制欧盟走向战略自主的步伐。

俄乌战争也促使欧盟把与众多候选国的关系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除了在 2022 年 6 月给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国地位之外，欧盟还在 12 月召开与西巴尔干半岛国家峰会之后批准了波黑的候选国申请。但是，正如前面讨论中所指出的，候选国很难马上加入欧盟，谈判的过程一般都很漫长。欧盟希望通过给予这些国家一个名义，把它们拉入自己的阵营，进而抗衡俄罗斯的影响力。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满足于一个候选国的名义。尤其是乌克兰，强烈要求尽快加入欧盟。在这个背景下，马克龙提出的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想法得以付诸实践。2022 年 10 月 7 日，欧盟 27 个成员国和 17 个毗邻国家在布拉格举行第一次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然而，由于这只是一个欧洲国家有关政治和战略问题的讨论平台，它真正能发挥的作用会比较有限。

从欧洲第一个共同体的建立到现在，欧盟走过了 70 多年的历史。历史的经验表明，理想主义的思想只有与务实的政策相结合，才能取得欧盟内政外交的实质性进步。俄乌冲突是对欧盟决策和行事能力的重大考验。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盟需要努力使战争尽快停止。马克龙在 2022 年 12 月 3 日接受法国电视台 TF1 采访时表示，欧洲需要准备好未来的安全架构，还要考虑“如何在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之日向其提供保障”。^②虽然他的言论招来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批评，但其想法不无道理。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就是因为缺乏安全保障，如果欧盟无法帮助俄罗斯得到这样的保障，欧洲人的和平愿望就难以很快实现。解铃还须系铃人。俄乌停战是欧盟解决自身危机的前提，欧盟的出路也在于此。

^① See Frédéric Simon, “Top US gas exporter eyes Europe growth, ‘with the right contracts’”, *Euractiv*,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environment/news/top-us-gas-exporter-eyes-europe-growth-with-the-right-contracts/>

^② “A group of EU states formally express concerns over Macron’s Russia comments”, *Euractiv*, December 3,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a-group-of-eu-states-formally-express-concerns-over-macrons-russia-comments/>

【Abstract】 Since Russia launched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against Ukraine in February 2022, the conflict has continued to escalate. Although the EU did not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the conflict, it has provided Ukraine with a large amount of assistance in terms of financial support, weaponry, personnel training, and refugee acceptance, and has successively launched nine rounds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Despite powerful blows to Russia's economy, finance, energy exports and other fields, these sanctions have also exposed the EU itself to such consequences as inflation, rising energy and food prices, and complaints are heard everywhere. Unable to extricate itself, the EU is stuck in the quagmir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Meanwhile, the crisis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relations among EU members. For the EU, an important way out is to promote an early truce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Russia-Europe Relationship,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European Food Security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против Украины в феврале 2022 года,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продолжает обостряться. Хотя ЕС напрямую не вовлечен в конфликт, он оказал Украине большую помощь в плане финансов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вооружени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персонала и приема беженцев, а также принял девять пакетов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Хотя эти санкции нанесли мощный удар п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финансам, экспорту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и другим сферам, они также заставили сам ЕС нест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нфляции и роста цен н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е, вызванные санкциям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Народ жалуется.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увяз в трясин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ыпутаться 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Кризис также вызвал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членам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ля ЕС важный способ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кризисом и решить дилемму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одействии

скорейшему перемирию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责任编辑 宋羽竹)

“海间联邦”构想与波兰外交思想溯源*

宋黎磊**

【内容提要】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再一次唤起人们对欧陆战事的记忆。随着俄乌冲突加剧,作为冲突前沿的中东欧地区,其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复杂化。作为中东欧地区的大国,波兰利用俄波中间地带国家制衡俄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即海间联邦构想,重新成为波兰当前外交战略的底色。“海间联邦”是波兰外交史上重要的自主战略构想,作为波兰雅盖隆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波兰重要的外交战略规划。尽管几乎没有在政策上成为现实,但“海间联邦”构想对波兰的外交思想和战略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海间联邦”被广泛认为是对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历史记忆的延续,是对波兰雅盖隆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当下波兰外交政策中“三海倡议”的先声。从具体政策上看,东部伙伴关系、“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和卢布林三角,继承了波兰“海间联邦”构建的传统外交思想。但“海间联邦”构想能够继续为波兰外交政策提供指引的程度,仍然取决于波兰的国家综合实力、欧洲的整体安全形势和欧俄美在中东欧地区的博弈态势。

【关键词】“海间联邦” 波兰外交思想 雅盖隆愿景 三海倡议 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 卢布林三角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107(22)

冷战结束后,波兰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波兰外交政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亚互联互通‘瓶颈地带’的机制博弈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4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本科生万志高同学为本文所做的材料收集工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本文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策上日益增强的进取心提供了基础。作为中东欧地区首屈一指的区域性强国，在转轨三十余年后，波兰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21 年度波兰 GDP 指标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六，并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波兰在地区博弈中越发呈现出领导中东欧地区发展的强烈政治意愿。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波兰的表现极为活跃，“挺乌反俄”的政策立场进一步强化。在外交上，波兰积极支持乌克兰国内的“颜色革命”和亲西方政府，先后通过主导、提出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三海倡议”、卢布林三角等，进一步加强了次区域合作。波兰总统杜达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多次访问基辅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军事上，波兰成为乌克兰的重要武器援助国，在 2022 年俄乌冲突升级后更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尽管波兰一再使用“对抗俄罗斯”和“捍卫民主”等为自身辩护，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波兰扩充军备在客观上提升了波兰的国际地位并改变了区域内的军事力量格局。

波兰日益增强的外交进取心激发了波兰官方和民间关于波兰战略文化的讨论。波兰国家潜力的不足及其隐约的地区扩张野心却导致了地区国家合作的困难。如果缺乏区域内国家认可的共同历史身份，以波兰为核心的中东欧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将很难开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波兰在该地区领导力合法性的历史佐证，“海间联邦”（Intermarium）^①构想这一波兰外交思想遗产再次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海间联邦”在空间范围上意指“中东欧的国家，（并）在广义上延展至南欧和亚得里亚海”^②；而从时间跨度和历史传统上讲，“海间联邦”是对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历史记忆的延续，是对波兰雅盖隆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现当下波兰外交政策中“三海倡议”的先声。在政治属性上，“海间联

① Intermarium 这一概念在国内现有研究中普遍译为“海间联邦”，然而在外文文献中这一概念存在两种侧重点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侧重于 Intermarium 的地理属性，即将这一概念解释为中东欧的特定地理区域；而另一种解释侧重于 Intermarium 的政治属性，即侧重这一概念所指涉的（波兰领导下的）地区一体化和联邦国家政治特征。本文亦将 Intermarium 通译为“海间联邦”。但 Intermarium 的表意分歧值得关注，因为不同作者关于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提示了他们对不同范畴的关注；并且，这一概念在中东欧地区的解释变化频繁，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

② Adam Starzyk, Natalia Tomaszewska, “Conception of Intermarium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in XXI Century”, *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Vol.10, No.1, pp.15-28.

邦”的概念包含了处在德国和俄国之间众多的中东欧国家，包括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因边界的连接、文化传统、宗教习俗、语言和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与德国和俄国相处的相同或类似经历，而形成了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①。追溯 15 世纪以来的波兰外交思想传统可以看出，对俄外交和周边外交一直是波兰外交战略的重点，而在波德关系相对缓和、波俄之间出现“中间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波兰的外交政策则出现了类似利用“中间地带”国家制衡俄国并争取地区主导权的特征。2022 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对欧陆战事的记忆。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重回各国议程，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政治议程。因此，本文力图对“海间联邦”构想的理论和历史进行梳理，回溯波兰依托这一外交思想、追求中东欧地区领导角色的发展脉络，并从外交思想史角度进一步理解波兰当前的外交政策选择与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

一、关于“海间联邦”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海间联邦”的研究较少，散见于讨论波兰外交政策尤其是“三海倡议”的学术研究中，多在讨论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领导人毕苏斯基提出“联邦方案”的背景或介绍“三海倡议”的历史渊源时作一些相关阐述。^②相较而言，国外学者尤其是中东欧学者对“海间联邦”的关注和讨论更多，^③对“海间联邦”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侧重，一是历史取向的侧重，二是政策取向的侧重。

① Marek Jan Chodakiewicz, *Intermarium: The Land Between the Black and Baltic Sea*,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2, pp.43-47.

② 参见朱晓中：“三海倡议及其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俄罗斯学刊》，2021 年第 5 期，第 10 页；王弘毅：“从能源到地缘：波兰积极推动‘三海倡议’的背景、动因及影响”，《国别和区域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18-141 页等。

③ 代表作参见 Jan Kieniewicz, “The Jagiellonian Idea: Past and Present”,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25; *The Polish Review*, 2011, Vol.56, No1/2, *Commemorating JÓZEF PIŁSUDSKI*, pp.1-154; Dziwianowski M. K., *Józef Piłsudski – A European Federalist: 1918-192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9; Marek Jan Chodakiewicz, *Intermarium: The Land Between the Black and Baltic Seas*, New Brunswick,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2.

历史取向的研究侧重讨论“海间联邦”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进和相互之间的比较。其中政治社会史取向的研究侧重讨论“海间联邦”理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时间尺度内（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动态。^①部分研究讨论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如何将“海间联邦”从设想转化为政治认知，作者集中讨论了在波兰的政治叙事中，陆地和海洋的相互关系以及黑海和波罗的海在波兰政治叙事中的地位，并认为这些政治叙事中存在国家主义（nationalistic）、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和帝国建构（empire-building）三种取向；从目的上讲，这三种取向都是为了塑造一个足以抵抗德国和苏联的强大的波兰。^②一些研究基于宏观历史背景讨论了毕苏斯基在试图推行其“海间联邦”理念时期遭遇的困难，即“海间联邦”的构想与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的民族自决意愿发生了冲突，而“海间联邦”构想中若隐若现的波兰地区帝国主义色彩则使得这一构想更不可能成功。^③另一些研究则回顾了作为“海间联邦”概念的基础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一致性，包括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松散自由的村社民主传统和萨尔马提亚（Sarmatian）的神话起源，^④并指出这三个传统在波兰被占领时期都遭到了剥夺。^⑤思想史取向的研究则将“海间联邦”的理念放在更广阔的波兰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进行梳理，认为雅盖隆文化（Jagiellonian）是波兰重要的政治思想传统，这一文化出现在波兰王国的历史早期，并且在后来的历史条件中复兴，其中“海间联邦”的概念正是雅盖隆文化第二次复兴发展

① 两种愿景之争在冷战结束后也被视为“极简主义”（minimalist）和“浪漫主义”（romantic）之争，前者认为波兰应当减少在东部的外交举措而一心向西方发展，后者则认为波兰对其东部故土（当然这些领土现在分属不同国家）负有某种“道德责任”。在波兰现实的外交政策中，对东部故土的“道德责任”和现实的政治考量实际上结合了起来。相关讨论见 Christopher Reeve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Historical Echoes in Today’s Approach”,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46-151.

② See Marta Grzechnik, “Intermarium: The Baltic and the Black Seas on the Polish mental maps in the interwar period”, *The Romanian Journal for Baltic and Nordic Studies*, 2014, Vol.6, No.1, pp.81-96.

③ See Wojciech Łysek, “The Federal Idea in Poland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dealism or Pragmatism?” *Politeja*, 2017, Vol. 51, No.6, pp.95-116.

④ See Gergely, Karácsony, Smuk Péter eds., *Central-European Case Studies 2: Publications of the Central-European Intensive Course*, Universitas-Győr Nonprofit Kft, 2008, pp.236-240.

⑤ [英]亚当·扎莫伊斯基：《波兰史》，郭大成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第287-288页。

的产物。^①雅盖隆文化特征包括两个核心组成部分，一是更愿意对人性作善而非恶的前提假设，二是意识到个体对国家的义务，这些特征也体现在“海间联邦”的基本假设中。^②

政策取向的研究着重于阐述“海间联邦”构想对波兰当下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波兰外交政策中的体现。部分学者梳理了冷战结束以来“海间联邦”构想在波兰历届政府中的体现，认为在新的国际和时代条件下，该构想不应当成为针对特定假想敌的地缘安全项目，而应当成为中东欧国家通过地区合作促进发展的经济项目。聚焦外交政策的讨论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大国竞争下的“海间联邦”的取向。“海间联邦”所涉地区是充满外部竞争的地区，不仅作为邻国的俄罗斯和德国会在此区域发挥其影响力，欧盟、中国和美国也将在这一地区展开竞争。^③尽管作为“海间联邦”构想延续的“三海倡议”有其历史和学术基础，但在制度建设上仍显不足。^④在全球化的当下对经济上与此区域密切联系的国家（如中国）考虑不足。^⑤美欧之间的竞争限制了相关项目发挥更好的效果。^⑥第二，地区合作中的“海间联邦”与波兰的领导力。“海间联邦”构想可以为欧盟的发展提供补充和修正，“海间联邦”概念能被重塑，前提是必须符合地缘大国的利益诉求，且中东欧国家的精英必须团结起来。就波兰的东方政策与雅盖隆愿景的联系而言，波兰对东方政策的积极推动受益于雅盖隆愿景；然而，对雅盖隆愿景和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历史记忆的不同解读容易在中东欧国家之间成为冲突的根源。^⑦

① See Dorota Pietrzyk-Reeves, “The Revival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79-94.

② See Monika Bana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s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Core Constitutive Values And Their Possible Contemporary Implementation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27-40.

③ See 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 “Intermarium: A Bid for Polycentric Europe”, *Geopolitics*, 2021, pp.1-25.

④ See Adam Starzyk, Natalia Tomaszewska, “Conception of Intermarium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in XXI Century”, *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Vol.10, No.1, pp.15-28.

⑤ See Kamila Rezmer-Plotka,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marium in the Context of Militant Democracy in Poland During and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Yearbook*, 2020, Vol.49, No.3, pp.96-110.

⑥ See Hubert Krolkowski, “Echoes of Jagiellonian Idea in the Present Polish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191-212.

⑦ See Christopher Reeve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Historical Echoes in Today’s Approach”, pp.141-164.

另有一些研究更加细致地比较了区域内不同国家对“海间联邦”乃至地区共同体身份的认知差异，如“海间联邦”近年来重新得到重视，并成为区域性跨国合作项目，原因是对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的感知重新激活了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经验。^①也有学者比较了乌克兰和波兰对于“海间联邦”概念的认知差异，指出尽管两国都接受“海间联邦”的概念，然而波兰的地缘想象更关注“海间”概念中偏北的部分，即波罗的海；乌克兰的地缘想象更关注偏南的部分，即黑海。^②

总体来看，对于“海间联邦”的讨论趋于成熟，学者们也存在相当的共识，即“海间联邦”理念是波兰雅盖隆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毕苏斯基在推动“海间联邦”构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尽管该构想因为国际和地区条件的不成熟最终没能从政治理想落实为政治现实，但其影响延续至今，并对如今波兰的外交政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相较而言，在现实政策取向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普遍指出“三海倡议”是对“海间联邦”理念的继承，并广泛认为中东欧次区域共同身份的缺失和次地区国际机制的重叠是妨碍中东欧国家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但在如何推动“海间联邦”理念更新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次区域合作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二、“海间联邦”构想的历史脉络

“海间联邦”是对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历史记忆的延续、对波兰雅盖隆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现当下波兰外交政策中“三海倡议”的先声。近代以来，波兰位于俄德之间的地理位置对波兰的国家建构和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西方两大邻居均参与过对波兰的瓜分，数次亡国的悲剧促使其将俄德视为安全的最大威胁，同时，其他欧洲列强对其悲惨遭遇的旁观甚至趁火打劫加剧了波兰对欧洲普遍的不信任”^③。波兰在 18 世纪中后期先后遭

① See Oleksii Polegkyi, “The Intermarium in Ukrainian and Polish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2021, Vol.8, No.2, pp.29-48.

② See Ostap Kushnir, “The Intermarium As a Pivotal Geopolitical Buzzword”,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2021, Vol.8, No.2, pp.7-27.

③ 熊昊：“变与不变间的波兰——图斯克新政府外交政策走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55 页。

到三次瓜分而亡国，然而波兰人始终并未放弃复国理想，尤其是在 19 世纪后期“民族自决”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波兰境内的地下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至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时，两个主要的政党成为波兰复国运动的主流：一是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领导者是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其二则是国家民主党（the National Democracy），领导者是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两大阵营之间的原则冲突是深刻而真实的”^①，在国家建构和对外政策上，两个政党取向迥异。学界广泛同意约瑟夫·毕苏斯基是塑造“海间联邦”理念最为重要的人物，“海间联邦”理念留下了其鲜明的个人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波兰的国家建构和外交关系是要回答这样一组问题：两大强邻谁更可能入侵波兰，以及当遭到入侵时何种形式的政体更有助于波兰的存续。显然，两个政党的争执实际上更多在于途径而非目标。德莫夫斯基支持建立波兰单一民族国家，他认为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而复国后的波兰境内的少数民族则需要“波兰化”。在对外关系上，德莫夫斯基将德国视为主要外部威胁，因为他认为，相较于传统而落后的俄国，德国更加现代化而且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毕苏斯基等的观点却几乎完全相反。毕苏斯基将俄国的扩张主义传统视为波兰的主要安全威胁，因此波兰需要与邻近并享有共同历史文化基础的国家密切合作以抵挡俄国的扩张；进一步讲，毕苏斯基希望以联邦国家的形式整合这些邻近的中小斯拉夫民族，推动地缘意义上的民族联合，从而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延展到黑海的“海间联邦”，并且在此基础上支持俄国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以减小俄国对波兰的安全威胁。^②

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的不同取向体现了两人对波兰早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取舍（见表 1）。德莫夫斯基的政治理想和国家安全观通常被概括为皮亚斯特愿景（Piast Version），这一愿景源于波兰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皮亚斯特王朝，其特点在于作为早期国家的单一国族特性以及在与条顿人的

^①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0.

^② See Wojciech ŁYSEK, “The Federal Idea in Poland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dealism or Pragmatism?”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95-116.

战争中逐渐建立起的民族认同。从地图上看，皮亚斯特王朝所控制的领土范围相较于如今的波兰也更偏西部。毕苏斯基的政治理想和国家安全观则通常被概括为雅盖隆愿景（Jagiellonian Version）^①。这一愿景来源于继承皮亚斯特王朝的雅盖隆王朝。这一王朝在 16 世纪中叶通过卢布林联合（Union of Lublin）而演化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Kingdom of Poland and 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雅盖隆王朝不仅与条顿人作战，还两次通过伪德米特里（False Dmitry）干涉俄国内政，失败后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俄国的军事威胁。从地图上看，雅盖隆王朝（以及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所控制的领土范围相较于如今的波兰也更靠近欧洲东部。

表 1 毕苏斯基与德莫夫斯基的主要政治观点的概要比较

	约瑟夫·毕苏斯基	罗曼·德莫夫斯基	两人共识
早期构想	借助德奥建立军事力量，通过暴力活动从沙俄帝国独立	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进行活动，在沙俄帝国中争取高度自治	改善波兰的政治地位
国家建构	建立多民族联邦国家，支持相对松散的政治架构和地方自治	建立波兰民族国家，支持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	波兰独立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帝俄（和白卫军）的威胁大于布尔什维克、大于德国，支持帝俄国内民族分离主义、民族独立运动	现代化且军备强劲的德国的威胁大于俄国，强调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将被削弱后的俄国视为对抗德国的盟友	波兰需要处理好波德和波俄关系，在国家安全危机中不可能指望得到西方援助
外交政策	“海间联邦”构想（Intermarium） 普罗米修斯计划（Prometheanism）	支持对俄和解，反对建立独立的乌克兰；主张“联海” ^② 的领土设想	将俄国推向俄罗斯族而非斯拉夫人聚居区，削弱俄国（两者在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别）
文化传统	雅盖隆愿景（Jagiellonian Version）	皮亚斯特愿景（Piast Version）	从波兰历史中取材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关于雅盖隆愿景的政治哲学视角的讨论可参见 Jan Kieniewicz,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the Project for the Future”,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5-26; Monika BANA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s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Core Constitutive Values and Three Possible Contemporary Implementations”,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p.27-40.

② “联海”（Ślub Wesele, Wedding to the Sea）指的是德莫夫斯基对波兰国家领土的设想，即从喀尔巴阡山脉延伸到波罗的海。“联海”设想与“海间联邦”理念对波兰国土的想象存在重合的部分，但“联海”设想中的波兰国土更偏西，“海间联邦”理念对波兰国土的想象则更偏东和偏南。Stefan Troebst, “‘Intermarium’ and ‘Wedding to the Sea’: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Mental Mapp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2003, Vol.10, No.2, pp.294-295.

两种政治愿景，都取材于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被赋予了更为实在的政策主张，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者对“国家”概念的差异性认知上。^①相较而言，皮亚斯特愿景更多代表了一种大众的和现代化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国家视为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共同体，侧重民族的团结；而雅盖隆愿景则更多代表了一种古典的和共和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国家视为一种自治和联邦的传统在政治上的共同体，侧重某种形式的制度宽容。^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北方三宫廷”集体消亡。一战后，波兰建立第二共和国。在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国家权力最终集中在掌握军权的毕苏斯基手中，以雅盖隆愿景为基础的“海间联邦”构想在这一时期正式提出。“海间联邦”构想和“普罗米修斯计划”（Prometheanism）共同构成了毕苏斯基东方外交战略的主体。与通过协约国调停而确定的波兰西部边界不同，复国的波兰的东部边界主要是通过战争确定的。相较而言，“海间联邦”旨在整合沙皇俄国消亡后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以此对抗俄罗斯，并在一定程度上防备德国；而普罗米修斯计划则更加侧重通过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而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及其对波兰的安全威胁。

然而，“海间联邦”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遭到了挫折。首先，复国后的波兰国内对在“海间联邦”的构想下恢复某种形式的“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存在异议，一些政治派别（如国家民主党）更加偏好以单一波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而非多民族混居的联邦国家。其次，原来联邦国家领土上的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混杂交织的情况过于复杂。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复国的波兰与同样追求民族自决的立陶宛等国发生了冲突。^③毕苏斯基的大波兰主义倾向则进一步加剧了波兰邻国对成为“海间联邦”中的二等民族的担心。波兰复国前分属三个不同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导致波兰与其邻国的众多争

^① See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p120.

^② 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雅盖隆理念在一方面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采取对进攻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对立场；另一方面，在内政中拒绝接受国家主义，并在省级行政单位和文化领域中采取最广泛的自治形式。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可参见 Hubert Krolikowski, “Echoes of Jagiellonian Idea in the Present Polish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Politeja*, 2017, No.51, pp.191-192.

^③ See Dorota Pietrzyk-Reeves, “The Revival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p.83.

端，^①“波兰……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领土定居点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②。而边境争端则加剧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对抗，进而削弱了联邦所需要的身份认同基础。再次，布尔什维克的反攻导致“海间联邦”构想失去了成为现实的地理条件。如前所述，对白卫军复辟帝俄的担心和对西欧国家的不信任，使毕苏斯基没有依照协约国的要求向邓尼金等提供帮助。南方白卫军和西北白卫军先后被击垮后，布尔什维克在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后向波兰本土发动进攻。尽管毕苏斯基在华沙城下挡住了苏俄红军的进攻，但最终还是于 1921 年 3 月 18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即《里加条约》，标志着黑海方向上建立“海间联邦”尝试的最终失败。^③最后，协约国的反对成为“海间联邦”构想失败的最后一步。英法对“海间联邦”构想的支持源于这一构想对德俄的牵制作用，然而英法也并不乐见一个强大的、追求地区主导权的波兰，“协约国给毕苏斯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过于弱小，这些现实使得毕苏斯基最终放弃了他的联邦国家梦想”^④。

毕苏斯基之后，毕苏斯基的门徒、合作者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执掌波兰外交，试图继续推动“海间联邦”，以求在第三帝国和苏联之间取得某种权力平衡，但成果并不显著。^⑤“1939 年，联邦主义的理念几乎完全覆灭了”^⑥。欧洲在动荡中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大萧条则加剧了国际政治中自然状态的回归。扩军备战的德国最终发动了新的世界大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导致波兰第四次被两大强邻瓜分。战后，冷战的铁幕横亘在亚欧大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波兰作为冷战前沿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大集团对峙的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波兰政府更加支持皮亚斯特理

① See Andrea Schmidt, “From Intermarium to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Regional Integr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174.

②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ume II)*, 200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367.

③ See Wojciech ŁYSEK, “The Federal Idea in Poland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dealism or Pragmatism?” *Politeja*, 2017, Vol.51, No.6, p.110.

④ [英] 亚当·扎莫伊斯基著：《波兰史》，郭大成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 年，第 329 页。

⑤ See Andrea Schmidt, “From Intermarium to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Regional Integr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pp.176-177.

⑥ [美] 蒂莫西·斯奈德：《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潘梦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25 页。

念，并以此为二战后波兰边境线的西移辩护，证明自己对于波兰国家利益的捍卫。^①而从二战到冷战结束，虽然雅盖隆愿景和“海间联邦”构想仍然为波兰流亡政府和部分寓居欧美的波兰侨民所接受和继承，但就当时两极格局下的主流国际政治话语体系来看，这一愿景和构想已经消失。^②

三、“海间联邦”构想的现实演进

冷战结束后，波兰重建民族国家。两德统一后实力剧增的德国与作为苏联最大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重新构成了波兰的左右两翼。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则构成了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地带”，因此波兰整体的地缘政治环境相较于一战结束时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不过，冷战的结束也在三个方面改变了波兰的国家定位和地缘安全。一是俄波关系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使波兰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进而加入了欧洲一体化组织；俄德两国重新开始了对“中间地带”的争夺；波兰从一个原苏联的“卫星国”变成为俄罗斯的地区对手。^③二是波德关系的变化。虽然统一后的德国实力猛增，但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波德边境纠纷的解决、德国作为“欧盟”国家的身份以及领导地位，削弱了波兰对德国威胁的认知。三是波兰对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回归欧洲”已经逐渐成为波兰社会的共识。考虑到作为地区概念的中东欧的不稳定，受到政治斗争、领土变迁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强烈影响，^④波兰在“回归欧洲”的思潮下抛弃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并内化了自身作为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回归欧洲”也是向“西方世界”（或称为大西洋文明，Atlantic Civilization）的回归，北约则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组织制度上的

^① See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p.286.

^② See Stefan Troebst, "'Intermarium' and 'Wedding to the Sea':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Mental Mapp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Vol.10, No.2, p.302.

^③ 参见郭洁：“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190页。

^④ See Nataliya Antonyuk, "Central, Eastern and Eastern-Central Europe", *Politeja*, 2018, No.57, pp.16-22.

黏合剂”^①。与“欧洲”和“西方”相对，或者说在这一语境中充当了“他者”（the Other）的，正是当时的苏联和后来作为原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联邦。因此，上述三点共同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两德统一后，波兰对德国的恐惧有所减少，对原苏联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的恐惧增加。波兰东部邻国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

波兰于 1997 年加入北约，2004 年加入欧盟。在欧盟的框架下，波兰获得了二十余年的发展机遇，政治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基础上，波兰重新成为地区性大国和中等强国，其分享欧盟领导权的政治野心也不断膨胀。^②在北约的框架下，波兰获得了“集体安全保障”，作为北约的东部前沿国家，将俄罗斯锁定为自己主要的战略假想敌。^③波兰盛行的战略文化实际上排除了波兰政府推行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可能性。^④波兰的区位优势在于，虽然自身的综合国力与法德等尚存一定差距，但在中东欧地区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国。所以波兰得以利用自己在区域内的相对优势塑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将自己定位为该地区的领导者和与美国关系的代表”^⑤。

从当前的政策实践上看，东部伙伴关系、“三海倡议”、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和卢布林三国机制都继承了波兰“海间联邦”的战略思想。四项政策又以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⑥第一阶段，波兰的国家能力相对不足，于是与瑞典共同在欧盟中提出东部伙伴关系倡议，借助欧盟平台扩张对东部国家的影响力。第二阶段，回应乌克兰危机。2014 年的乌克兰

① [丹麦]戴维·格雷格：《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黄素华、梅子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80 页。

② 参见姜琍：“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国外理论动态》，2018 年第 8 期，第 93-104 页。

③ See Republic of Po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olish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2017-2021)”, <https://www.gov.pl/web/diplomacy/what-we-do>

④ See Christopher Reeves, “Discerning Poland’s Contemporary Strategic Culture: An Analysis of the 202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Politeja*, 2021, No.75, p.288.

⑤ Tomasz Pawłuszko,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Poland and Eastern Europe: the Three Seas and the Bucharest Nine Initiatives”, *The Copernicu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2021, No.1, p.18.

⑥ See Agnieszka Orzelska-Stączek, Piotr Bajda, “Security Aspects of Cooperation in Central Europe: Visegrad Group, Bucharest Nine, and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Modelling the New Europe*, 2021, No.37, p.11.

危机“宣告了波兰 300 年历史上最为安全的黄金时期的结束”^①，而此时的波兰经过冷战结束后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家实力和政治心态也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区域合作中，波兰更多选择以主权国家为基础、以共同提案方的身份进行运作，其代表作就是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三海倡议”和卢布林三国机制。

第一阶段的东部伙伴关系是波兰和瑞典 2009 年在欧盟框架内提出的一项重要议程，^②后来面向除俄罗斯以外的后苏联空间国家，旨在进一步加强欧盟和上述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③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和波兰的东方政策高度重合，区别仅在于“在波兰的政治术语中，传统上的‘东方’是指波兰的东部近邻，即俄罗斯以及曾经属于波兰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版图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等”^④，而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不包括俄罗斯。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及的波兰和俄罗斯争夺的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尚未加入欧盟的“中间地带”国家，其目的是“分化和瓦解目前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形成中的俄白联盟”^⑤。通过参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波兰实际上成为欧盟面向东欧的“桥头堡”。波兰最初在 2004 年加入欧盟时就曾提出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有关的战略，但反响不佳。2008 年后，由于波兰政坛的政党轮替和瑞典加入并成为该倡议的共同提案方，东部伙伴关系才于 2009 年在欧盟引起广泛讨论并形成决议。自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行以来，波兰一直积极作为。2011 年，波兰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提出了与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全面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承诺，并提议为加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六个国家提供免签证旅行。同时，波兰也积极推动次区域国际组织与东部伙伴关系

①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4 期，第 43 页。

② See Christopher Reeves, “The Jagiellonian Idea and Poland’s Eastern Policy: Historical Echoes in Today’s Approach”, p.150.

③ 参见宋黎磊：“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基于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分析”，《欧洲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43-59 页。

④ 赵艳霞、唐更田：“21 世纪初波兰的东方政策及其制约因素”，《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3 期，第 46 页。

⑤ 朱晓中：“从欧洲邻国政策到东方伙伴关系——欧盟东方政策的新视线”，《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65 页。

国家沟通联系，如维谢格拉德机制下的东部伙伴关系（V4EaP）项目等。

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Bucharest Nine/B9）创立于 2015 年，由时任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Klaus Iohannis）和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在 2015 年 11 月中欧和东欧国家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共同提出。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九国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区域合作小组，以支持北约的一些具体目标并加强在北约框架内的协商与合作。在波兰的推动下，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成为北约东翼各国之间进行协调和协商的平台，成立后，通过了多份对俄强硬声明，并在实质上进一步推动了北约东扩。2022 年的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峰会受到美国与欧盟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 9 国外长通话，提出在北约东翼建立四个新的战斗群，^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了此次 B9 峰会，会议上另一地区国家罗马尼亚强调了对黑海地区的关注，它认为北约东翼目前最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因此需要在黑海地区增强北约的防御力量。^②

“三海倡议”（Three Seas Initiative/TSI）创立于 2016 年 8 月，克罗地亚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与杜达总统在杜布罗夫尼克论坛上共同提议，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南北欧轴心，加强欧盟内的东欧和中欧经济合作。“三海倡议”涵盖 12 个国家，包括所有布加勒斯特九国并加上奥地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③“三海倡议”峰会每年定期举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拓展到商务、数字化等领域。波兰一直是“三海倡议”的主要推动者。2022 年 6 月在拉脱维亚举行了第七届“三海倡议”峰会。但“三海倡议”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缺乏，相关国家必须要下定决心推行相关建设项目，努力筹集国内资金，才

^① See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 Bucharest 9 meeting”, 10 czerwca 2022, <https://www.president.pl/news/declaration-of-the-heads-of-state-bucharest-9-meeting-,55290>

^② See “Declarații de presă comune ale Președintelui României, Klaus Iohannis, cu Președintele Republicii Letonia, Egils Levits, și Președintele Republicii Polone, Andrzej Duda”, 20 iunie 2022, <https://www.presidency.ro/ro/media/declaratii-de-presa/declaratii-de-presa-comune-ale-presedintelui-romaniei-klaus-iohannis-cu-presedintele-republicii-letonia-egils-levits-si-presedintele-republicii-polone-andrzej-duda>

^③ See Vasile Rotaru, Andreas Umland, “How Romania and Poland Can Strengthen NATO and the EU”,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entral-europe/2017-11-10/how-romania-and-poland-can-strengthen-nato-and-eu>

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得到欧盟的重视。

显然，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和“三海倡议”相当于分别在北约（安全）和欧盟（经济）的框架内、在整体结构的基础上做了中东欧特色的补充。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地区大国，波兰一方面成了地区合作机制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则充当了欧盟和美国在这一区域的支柱国家。值得关注的是，波兰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进一步提升了波兰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波兰一方面有了在部分议题上和欧盟“叫板”的底气，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北约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进一步借力北约遏制俄罗斯。

卢布林三国机制（包括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成立于2020年，是波兰意图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较新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和“三海倡议”类似，卢布林三国机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无共同预算，无常设机构，只是一个会晤机制和交流平台，定期举行外长会谈或专家小组会议。这一机制“几乎完全关注俄罗斯挑衅所引起的安全议题”^①，并以“卢布林三角”与“俄罗斯世界”针锋相对，进行意识形态争夺；这一机制也意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并且试图拉拢白俄罗斯。三国选址卢布林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显然是在呼应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合并过程中重要的卢布林联合。对波兰而言，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意味着波兰国家安全的削弱和来自俄罗斯威胁的增加。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助于分担自身压力，一方面迫使俄罗斯将相当一部分资源投入俄乌双边关系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得波兰和俄罗斯对抗的重点转移至乌克兰境内，使俄乌两国的对抗更加远离波兰的国土。近年来，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日益紧密，双方呈现出某种准联盟的特殊关系。2022年3月，波兰国土防卫法案生效，从2023年起，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将增加到3%，并将波兰军队规模扩大一倍，推进军事现代化并增加资金。而在经济社会领域，波兰一向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曾在2021年卢布林三角峰会上重申了这一承诺。

除了上述四项主要机制外，波兰倡导的其他三边或多边地区合作机制也同样显示出明显的雅盖隆理念的色彩。2022年2月中旬，波兰、乌克兰、

^① Agnieszka Orzelska-Stączek, Piotr Bajda, “Security Aspects of Cooperation in Central Europe: Visegrad Group, Bucharest Nine, and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Modelling the New Europe*, 2021, No.37, pp.12-13.

英国达成“三方协议”，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三国在支持乌克兰关键问题上的战略合作和承诺。^①几乎同时，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三边会议于 2022 年 3 月初举行。三国表示需要在国防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这对于区域和全球安全尤其重要。多边地区合作机制包括军事领域的波兰地区安全协助项目（Polish Reg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Program/ ReSAP）、地区领土防御中心倡议（Regional Territorial Defence Centre Initiative）等。^②

四、“海间联邦”构想的实践分析

“海间联邦”在本质上是地缘政治概念，所考虑的是波兰地理位置带来的政治影响。一战后和冷战结束后相似的国际条件为波兰外交政策制定者继承“海间联邦”构想提供了基础。这种继承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对高度整合化的中东欧的追求；而在主体性上隐约透露出波兰作为中东欧地区次区域合作倡议的提出者和事实上的主要推动者欲成为地区霸权的雄心。在地缘经济方面，无论是波兰承诺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愿景，还是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波兰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三海倡议”），甚至和乌克兰一道建立新的地区合作机制（如卢布林三角），都是对波兰希望通过中东欧本位或欧盟主导的地区合作取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产业联系的表达。然而，考虑到中东欧地区各国综合国力的客观现实，中东欧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波兰主导的历史叙事，而中东欧地区的合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虽然波兰和乌克兰的双边关系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取得了显著提升，但两国关系中的部分历史记忆（尤其是 20 世纪互相实施种族清洗的历史记忆）仍不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阻碍因素。然而，在现实的地缘政治议题面前，两国

^① See “Wspólne oświadczenie Ministra Spraw Zagranicznych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Ministra Spraw Zagranicznych Ukrainy oraz Minister Spraw Zagranicznych, Wspólnoty Narodów i Rozwoju Zjednoczonego Królestwa Wielkiej Brytanii i Irlandii Północnej”, 17 lutego 2022, <https://www.gov.pl/web/dyplomacja/wspolne-oswiadczenie-ministra-spraw-zagranicznych-rzeczypospolitej-polskiej-ministra-spraw-zagranicznych-ukrainy-oraz-minister-spraw-zagranicznych-wspolnoty-narodow-i-rozwoju-zjednoczonego-krolestwa-wielkiej-brytanii-i-irlandii-polnocnej>

^② 关于具有雅盖隆愿景特征的波兰地区军事合作项目的详细讨论可参见 Hubert Króliowski, “Echoes of Jagiellonian Idea in the Present Polish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s”, *Politeja*, 2017, No.51, pp.191-212.

政府都心照不宣地压低了调门，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搁置争议，转而强调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共识性内容。

基于此，有学者将波兰第三共和国的外交政策视为雅盖隆愿景的第三次复兴。^①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三次复兴过程中，被用于诠释的雅盖隆愿景的文化基础在不断削弱，政策内涵日益明显。雅盖隆愿景的第一次复兴发生在19世纪后期波兰复国之前，此时的雅盖隆愿景更多被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以唤起人们对旧日强盛的波兰联邦国家的回忆，进而激起复国的热情。雅盖隆愿景的第二次复兴是毕苏斯基执政期间，虽然这时的雅盖隆愿景强调与苏俄/苏联争夺“中间地带”国家，但“海间联邦”同样有制衡德国的色彩。同时，（至少在波兰人看来）区域内国家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基础在雅盖隆愿景的第二次复兴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冷战后的这次雅盖隆愿景和“海间联邦”构想的复兴，则被赋予了更为务实的政策意涵。毕苏斯基思想中的“海间联邦”已经难以实现。新的政治概念再也不是建立在象征性因素和合作的政治意愿上。当下的“海间联邦”建立在能源、交通、物流、经济的基础上，其意图是创造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集团。^②

雅盖隆愿景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兴在波兰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明显的共性。第一，从背景上看，在这两次复兴期间，波兰选择外交政策时的地缘条件都是德波接壤，新兴独立国家出现在俄国/苏联与波兰之间。这为俄波之间的争夺提供了条件，当然也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第二，从空间上看，雅盖隆愿景下波兰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与俄罗斯争夺对两国之间“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权，进而试图尽可能地降低俄罗斯对波兰的安全威胁。而事实上，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范围不仅与历史上的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合，其本身还在独立前是俄国/苏联的组成部分；中东欧地区经常变动的边界线进一步增加了整合地区集体叙事的难度。第三，从主体上看，雅盖隆愿景下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波兰对这一地区的支配乃至霸权色彩。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波兰和俄罗斯在两国间“中间地带”

① See Dorota Pietrzyk-Reeves, “The Revivals of The Jagiellonian Idea: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Contexts”, p.89.

② See Adam Starzyk, Natalia Tomaszewska, “Conception of Intermarium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in XXI Century”, *Torun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 Vol.10, No.1, p.22.

国家进行竞争的目的并无实质差别，只是采取的途径略有差异。基于对中东欧地区实际权力分布结构的考虑，波兰和俄罗斯主导建立或维持的地区秩序都带有以自身为主体的支配性。在硬实力层面，波兰借助欧盟的帮助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力，而俄罗斯则更多依靠能源等与中东欧地区保持联系；在软实力层面，波兰诉诸所谓“民主化”的愿景和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记忆，俄罗斯则强调东正教斯拉夫人的团结和斯拉夫文化的凝聚力。第四，从效果上看，虽然波兰的地区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中间地带”国家在反感俄罗斯的同时，对波兰也有较强的戒备心理。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的態度有差别，这对波兰自身作为中等强国的能力也有所限制。因此，波兰在推动次区域合作时面临着自身领导力与地区其他国家离心力之间的平衡问题。

从区域国家的综合实力来看，两翼的德国和俄国构成第一梯队，波兰独自构成第二梯队，其余国家居于第三梯队。这种国家综合实力分布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波兰在中东欧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雅盖隆愿景和“海间联邦”构想下波兰的历史领土与波兰的现有边界差异较大，这种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演化为地区强权支撑下的对生活在其他民族国家领土上的本国族裔人群的关切。二是波兰在地区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建立，一方面，虽然波兰在加入欧盟后经济飞速发展，但其国家综合实力与其政治雄心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①另一方面，波兰的主导地位受到两类挑战。第一类挑战是来源于位居两翼的德国和俄国的挑战。就公共产品供应方面而言，德国、俄国和波兰构成替代关系，并且，中东欧作为俄德两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和俄国传统意义上的“近邻国家”^②（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两国都会大量投入以维持本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第二类挑战是区域内国家对波兰及其领导力的怀疑：首先，“海间联邦”的历史遗产隐约显示出的“大波兰主义”令周围国家感到威胁；其次，对欧盟的资金依赖导致了波兰话语权的不足。在东部伙伴关系中，同为维谢格拉德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

^① 参见杨友孙：“波兰参与中东欧区域合作机制的策略与挑战”，《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1期，第37-39页。

^② 张昊琦：“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48-49页。

和匈牙利也在积极参与、引导这一地区机制的安排。在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中，罗马尼亚扮演着黑海次区域领导者的角色。在“三海倡议”中，波兰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开出的却是空头支票。在卢布林三角中，立陶宛和乌克兰也没有做波兰小伙伴的打算。再次，同为地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德国和俄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美国、中国）为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替代选项。^①在中东欧地区权力分布结构中，波兰的外交实力与其雄心是不匹配的一一既缺乏作为区域大国的综合实力，又缺少大国应该有的风范，在两大强邻间徘徊的同时又不放弃“大国”的迷梦。

五、小结

毋庸置疑，作为雅盖隆愿景的体现，“海间联邦”理念和制度设计在波兰对外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相似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后的波兰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相似性。波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皮亚斯特愿景和雅盖隆愿景必然将长期处在波兰外交政策辩论的中心位置，两种愿景的含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前所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种愿景之争，在核心观点上是主要对手之争——皮亚斯特愿景将德国视为波兰的战略敌人而雅盖隆愿景则将俄国视为波兰的战略敌人。冷战后的波兰外交政策中，“海间联邦”的历史文化色彩比较淡化，其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现实的政策取向之中。如果说毕苏斯基的“海间联邦”构想（部分是由于其个人生活体验）仍然相当重视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回忆，那么冷战后波兰外交中的“海间联邦”构想则被赋予了更为现实的政策性含义。两种愿景之争实质上转向了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争——皮亚斯特愿景强调对欧外交（西方面向）的重要意义，而雅盖隆愿景则更加强调东向外交的重要意义。因而波兰的西向外交通常呈现出亲欧色彩，东向外交则通常呈现出制衡色彩。同时，波兰将自身外交政策的基调定位为“重返欧洲”，并借助雅盖隆愿景的文化基础，与俄罗斯争夺对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影响力。然而，随着欧盟自身出现多重治理危

^① 参见朱晓中：“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因素：利益格局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第16页。

机与俄乌冲突的爆发,加上中东欧次区域共同身份的缺失和次地区国际机制的重叠,妨碍了中东欧国家的合作。雅盖隆愿景和“海间联邦”的历史遗产还能在何种程度上支撑波兰的东向外交政策值得进一步思考。

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加速演进,国际秩序转型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成为共识。在新的变局中,“海间联邦”的思想传统将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值得进一步观察。首先,关于“海间联邦”的发展方向值得讨论。传统意义上,“海间联邦”构想下的外交政策的着眼点主要在于防范俄国,在法律与正义党执政期间,波兰外交政策日益呈现出“亲美疑欧”的特征。美国和波兰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使得后者有了在欧盟与德国“叫板”、在中东欧与俄罗斯“叫板”的底气。虽然波兰可以借助制衡理论为自己辩护,但正如诺曼·戴维斯所言,“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地理位置决定着波兰所有关于自身国际关系的辩论”^①。波兰与美国的过度亲近可能引起俄欧在安全领域的担忧,进而导致波兰与俄欧关系的紧张,而德俄也并不希望他们之间出现一个地区强国。在欧洲整体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以及美国整体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当下,波兰外交平衡的保持以及波美关系、波美军事合作对于波兰的支持程度值得学界持续关注、分析和思考。其次,波兰面临的地区领导力与离心力问题值得讨论。在“海间联邦”构想和雅盖隆愿景下,波兰强调构建三海间中小斯拉夫民族的联盟和地缘意义上的民族联合,波兰希望成为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领头羊”。但是,区域内的各国对于强大波兰的出现有所疑问和担忧。这些国家对美欧俄的态度和立场不同,相互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不同程度受到俄罗斯采取的分化政策的影响……因此,一些区域内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较强的对波兰主导的次区域合作的离心力。另外,虽然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地缘作用升级,但雅盖隆愿景和“海间联邦”构想将在何种程度上继续为波兰外交政策提供指引仍取决于波兰的国家综合实力、欧洲的整体安全形势和欧美俄在中东欧地区的博弈态势。

① Norman Davies,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p.125.

【Abstract】 In 2022, Russia’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against Ukraine once again reminded people of war memories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s the frontier,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in its geopolitical pattern. Poland, as a major countr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once again adopted the concept of Intermarium for its current diplomatic strategy, by which th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zone of Russia and Poland are maneuvered to balance Russia. Intermarium is an important independent strategic concept in the history of Polish diplomacy. As a part of Polish Jagiellonian cultural tradition, it became Poland’s important diplomatic strategic plan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Although it hardly became a reality in terms of policy, the concept of Intermarium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Poland’s diplomatic thinking and strategic culture. The Intermarium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n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Polish Jagiellonian, and a precursor to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in the current Polish foreign policy. As to specific policies,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the Bucharest Nine, and the Lublin Triangle hav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diplomatic thinking of Poland’s Intermarium concept. Howev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cept of Intermarium continue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till depends on Poland’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overall security situation in Europe and the gambling among Europe,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Key Words 】 the Intermarium, Poland’s Diplomatic Thoughts, Jagiellonian Vision, Three Seas Initiative, the Bucharest Nine, the Lublin Triangle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22 году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против Украины, что вновь напомнило людям о войне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континенте. С обострением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как границы конфликт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сложняется. Будучи крупной стра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льша использует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стран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Польшей, чтобы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ть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ориентацию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Междуморь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стала основой нынешне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Польши. «Междуморь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ей в истории поль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Будучи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Ягелло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Польши, в течение двух мировых войн она стала важны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ланом для Польши. Хотя это почти не стал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концепция «Междуморье» оказал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идею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Польши. «Междуморье» широк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Польши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Литов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е польских Ягелло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традиций и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 «Инициативы трех морей» в нынешней поль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кре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нициатива трех морей», «Бухарестская девятка» и Люблин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унаследовали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идею польского «Междуморья». Однако степень, в которой концепция «Междуморья» мож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лужить ориентиром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ольш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зависит от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щи Польши, общей ситуации 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Европы и игр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Европы,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еждуморье», польская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я, Ягеллонская идея, «Инициатива трех морей», «Бухарестская девятка», «Люблин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责任编辑 苟利武)

美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逻辑、影响及启示*

熊启跃 赵雪情**

【内容提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通过强化资产冻结、融资限制、金融服务阻断和贸易管制措施，不断加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受西方阵营制裁措施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通货膨胀率高企；进出口受到非对称影响，汽车、航空及商业地产等行业遭受严重冲击；俄罗斯跨境资本大幅外流，储备资产遭大面积冻结；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俄乌冲突下的美欧制裁使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更趋分化，全球供应链循环遭受侵蚀并局部“脱钩”，国际货币体系步入调整变革期，全球绿色转型进程面临重大波折。面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下不断上升的制裁风险，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编织制裁免疫安全网；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支付体系的独立自主性；重新审视经济安全，提高产业链韧性。

【关键词】俄乌冲突 西方制裁 全球产业链 国际货币体系 俄美欧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129(28)

经济制裁是对竞争对手进行惩罚遏制，迫使其改变行为而采取的贸易禁运、交易限制和资产冻结等的强制性措施。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在全球贸易、金融领域的霸权，扩大行使“长臂管辖权”，对敌对竞争国家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是美欧经济制裁的主要对象之一。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就以使用生化武器为由对俄罗斯开展制裁。近年来，美国对俄制裁强度不断增加，其中既包括直接针对俄罗斯实体所谓的“情报网络攻击”、“贪污和践踏人权”、“能源出口胁迫”、“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金融部门控制权网络与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研究”（项目批准号：7217309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熊启跃，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雪情，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器”及克里米亚事件等实行的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①也包括针对俄罗斯主体与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受制裁实体和个人开展“重大交易”所实行的二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②欧盟对俄制裁较晚，首次制裁发生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为达到削弱俄罗斯实力、迫使其停止军事行动的目的，美国联合欧盟、英国、日本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俄罗斯开展制裁，实行制裁的国家和地区 GDP 总量超过全球的 50%。这也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第一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施的全方位制裁“绞杀”。与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相比，俄罗斯经济体量较小，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金融业发展不充分，脆弱性较高，成为美欧实施制裁打击的重点领域。俄乌冲突及美欧制裁加速了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演变，成为国际关系与治理体系变化的重要分水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③当前，系统梳理俄乌冲突以来美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逻辑链条，分析俄罗斯经济和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冲击及外溢影响，对我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有效防范和应对制裁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经济制裁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学术界围绕该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郑联盛、陶士贵和黄亚光等对美国金融制裁演化历史、主要工具模式以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应对制裁的相关建议。^④许文

① 对俄罗斯情报网络攻击的制裁依据包括公共法 115-44、13694、13848、13849 和 14024 号总统行政令；对俄罗斯贪污和践踏人权制裁依据包括公共法 112-208、113-95、114-32、13818 号总统行政令；对俄罗斯能源出口胁迫制裁依据包括公共法 115-44；对俄罗斯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裁依据包括公共法 106-178、116-92、13382 和 14039 号总统行政令；对俄罗斯引发克里米亚事件的制裁依据包括公共法 113-95、113-272、115-44、13660、13661、13662、13685 号总统行政令。

② “U.S. Sanctions on Russia”, January 18, 2022, <https://crsreports.coggress.govR45415>

③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52-53 页。

④ 参见郑联盛：“美国金融制裁：框架、清单、模式与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123 页；陶士贵：“美国对外金融制裁：历史、本质及反制裁措施”，《人民论坛》，2022 年第 14 期，第 97 页；黄亚光等：“美国金融制裁：演化逻辑与应对策略”，《经济学家》，2021 年第 7 期，第 110 页。

鸿对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去美元化”策略进行了研究，并对“去美元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①俄乌冲突爆发后，易小准、李晓、盛斌、杨宏伟、曹宝明、徐坡岭等学者就俄乌冲突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能源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刘军梅系统分析了美欧对俄罗斯制裁的主要内容和俄罗斯的反制措施；王战、李永全、姜锋、于运全、徐明棋、冯绍雷等学者对俄乌冲突及欧美制裁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并对大变局下中国如何发展提出建议；田丰从资金账户和货币清算角度分析了俄乌冲突中“卢布结算令”的作用机制；郭栋对俄乌冲突后金融市场的制裁和反制裁措施进行了研究。^②总体而言，俄乌冲突发生后，理论界对美欧经济制裁措施的系统性研究较少见，特别是结合制裁原始文件的统计研究较为薄弱；同时，在分析制裁对俄罗斯影响冲击的过程中，多以逻辑推演为主，缺少基于真实经济金融数据的分析。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一是通过对美欧复杂制裁文件梳理，厘清制裁清单的底层逻辑和最新变化；二是结合最新数据，从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国际收支、金融机构经营等角度出发，对美欧经济制裁的冲击影响进行剖析；三是从全球视角分析俄乌冲突及欧美制裁可能造成的外溢影响。

一、美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主要逻辑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主要通过更新或新推出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一方面，更新前期已发布的 13660、13661、13662 和

^① 参见许文鸿：“去美元化：俄罗斯在俄美金融战中的反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5期，第31页。

^② 参见易小准等：“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第9页；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5期，第62页；王战等：“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20页；田丰：“从‘卢布结算令’看金融制裁的应对及启示——基于资金账户和货币清算视角”，《财会通讯》，2022年第15期，第145页；郭栋：“俄乌冲突的金融制裁困局、机遇窗口与国债策略”，《金融市场研究》，2022年第4期，第85页。

13849 号总统行政令, 不断扩大被制裁主体范围; 另一方面, 新推出 14065^①、14066^②、14068^③和 14071 号^④总统行政令, 增加制裁内容, 强化制裁效果。欧盟主要通过欧盟理事会出台法规 (Regulation) 和决定 (Decision) 推进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⑤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 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八轮制裁。^⑥总体来看, 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主要逻辑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 对俄罗斯主体实施全面阻断, 大面积冻结海外资产

长期以来, 美欧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引了大量俄罗斯主体的资金, 这些资金以债券、股票、基金、存款等形式存放在美欧等海外地区, 是俄罗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冻结俄罗斯主体的海外资产, 能够达到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收紧俄罗斯外币流动性的效果。美欧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对俄罗斯海外资产实施冻结。

①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Blocking Property of Certain Persons and Prohibiting Certain Transactions With Respect to Continued Russian Efforts to Undermine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Februar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2/21/executive-order-on-blocking-property-of-certain-persons-and-prohibiting-certain-transactions-with-respect-to-continued-russian-efforts-to-undermine-the-sovereignty-and-territorial-integrity-of-ukraine/>

②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Prohibiting Certain Imports and New Investments with Respect to Continued Russian Federation Efforts to Undermine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March 8,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3/08/executive-order-on-prohibiting-certain-imports-and-new-investments-with-respect-to-continued-russian-federation-efforts-to-undermine-the-sovereignty-and-territorial-integrity-of-ukraine/>

③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Prohibiting Certain Imports, Exports, and New Investment with Respect to Continued Russian Federation Aggression”, March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3/11/executive-order-on-prohibiting-certain-imports-exports-and-new-investment-with-respect-to-continued-russian-federation-aggression/>

④ The White House, “Prohibiting New Investment in and Certain Services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Response to Continued Russian Federation Aggression”, April 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4/06/prohibiting-new-investment-in-and-certain-services-to-the-russian-federation-in-response-to-continued-russian-federation-aggression/>

⑤ 主要包括 Regulation (EU) 2022/994、Regulation (EU) 2022/1269、Decision (EU) 2022/995、Decision (EU) 2022/1271 和 Decision (EU) 2022/1313。欧盟法规具有强制执行力, 将无差别在欧盟成员国实施。欧盟决定需成员国各自转换为国内法律条例后才能产生制裁效果。

⑥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Ukraine: EU agrees on eighth packag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ctober 6,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5989

1. 美国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pecial Designation Nationals/SDN）

在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局（Office of Foreign Asset Control/OFAC）的清单制裁体系中，SDN 清单的制裁强度最高。进入 SDN 清单的实体和个人将面临美国“连接点”的全面阻断，包括禁止进入美国境内、无法与美国主体开展业务、无法进行美元交易、冻结美国管辖区域内的资产等。其中，海外资产冻结是 SDN 制裁的主要措施手段。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大幅增加 SDN 清单中俄罗斯主体的数量。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俄罗斯共有 2017 个主体被美国纳入 SDN 清单。俄罗斯超过伊朗，成为被美国纳入 SDN 清单主体数量最多的国家（见图 1）。被美国列入 SDN 清单的俄罗斯主体既包括普京、拉夫罗夫、绍伊古和俄罗斯杜马、金融机构高管等政界、经济界精英，也包括俄罗斯金融、能源、军工、运输、电力等重要行业企业，部分石油管道、飞机及轮船也被纳入 SDN 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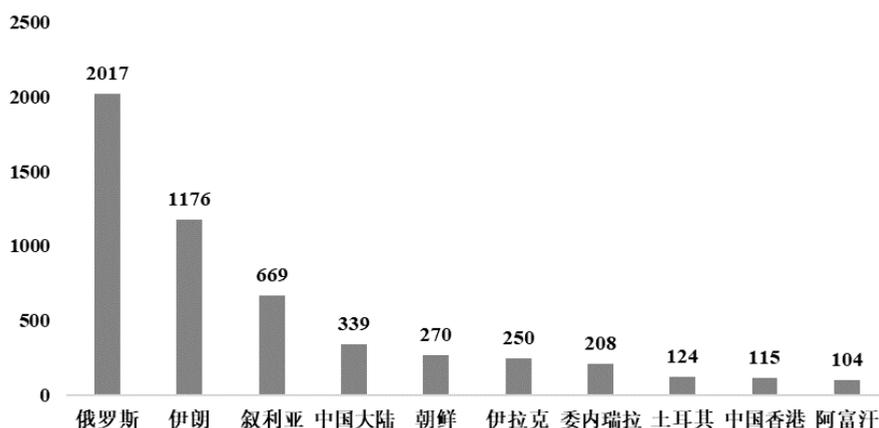


图 1 2022 年 10 月末美国 SDN 清单国家和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数据绘制（<https://www.trade.gov/data-visualization/csl-search>）。

2. 欧盟限制性措施（Restrictive Measures/RM）

欧盟限制性措施清单与美国 SDN 清单类似，主要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被制裁个人或主体拥有、控制的资金和经济资源，禁止现金、支票、银行存款、股票、股份等资金存取、转移、出售，严禁房地产等所有其他有形或无形资

产出售、出租，禁止欧盟居民、企业向被制裁对象提供任何资源等。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欧盟将俄罗斯 1241 名个人和 118 个实体纳入限制性制裁清单，涵盖俄罗斯政府高官、商业领袖以及军事、航空、金融、制造等重要行业企业。俄罗斯超过叙利亚，成为被欧盟实施限制性制裁主体数量最多的国家。

（二）基于货币霸权，限制俄罗斯重要实体融资能力

俄罗斯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高，本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其政府、大型实体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使得限制俄罗斯重要实体的外币融资渠道成为美欧制裁的重要“抓手”。

1. 美国行业制裁识别清单（Sectoral Sanctions Identifications/SSI）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发布 13662 号总统行政令，针对俄罗斯主体推出 SSI 制裁清单，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国防军工等行业实体提供融资。SSI 清单制裁包括四项指令。指令一针对金融机构，不允许美国人购买清单所列主体新发行的期限高于 14 天的债券及股票；指令二针对能源行业企业，不允许美国人购买清单所列主体新发行期限高于 60 天的债券及股票；指令三针对金融和能源以外企业，不允许美国人购买清单所列主体新发行的期限高于 30 天的债券及股票；指令四则禁止在深水、近海及原油项目中对俄罗斯提供商品、服务和技术出口和转出口服务。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俄罗斯共有 253 个实体被纳入 SSI 清单，金融、能源、军工类企业数量占比分别达到 31.6%、24.5%和 18.6%。

2. 美国非 SDN 菜单式制裁（Non-SDN Menu-Based Sanctions/NS-MBS）

NS-MBS 清单采取“一事一议”的制裁方式，该清单也包括四项指令。指令一是针对俄罗斯三家主权机构的债券融资限制；指令二切断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美国代理行和通汇账户服务；指令三切断了俄罗斯部分大型企业融资渠道，其严苛程度要高于 SSI 清单；指令四是对俄罗斯主权机构转账和外汇交易进行阻断，是美国冻结俄罗斯储备资产中的美元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的重要依据。美国没有将俄罗斯主权机构纳入 SDN 清单，主要是考虑到国有经济在俄罗斯的重要地位，而 SDN 清单制裁具有持股 50%向下穿透的原则，这样安排能够实现更精准打击。欧盟也对俄罗斯央行和国有企业展开融资制裁。在欧盟对俄罗斯的第三轮制裁中，欧盟禁止俄罗斯央行使用储备

资产，禁止欧盟主体与俄罗斯央行进行交易；^①在第四轮制裁中禁止与俄罗斯国有企业进行交易。^②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俄罗斯共有 114 个实体面临欧盟融资限制。

除上述两项针对特定实体的融资限制措施外，美国发布 14071 号总统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对俄罗斯新增投资。这里的投资既包括贷款等融资方式，也包括提供担保、开展货币掉期及相关金融资产交易等行为。欧盟也推出了针对俄罗斯的投资限制，但与美国的全面限制不同，欧盟投资限制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

（三）基于金融设施领域优势，切断俄罗斯金融服务渠道

除拥有美元、欧元等全球货币的主导权，美欧在全球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领域也拥有话语权，例如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占据绝对优势，全球三大知名评级机构均来自欧美等。凭借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美欧出台制裁措施，切断俄罗斯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渠道。

1. 将俄罗斯金融机构踢出 SWIFT

2022 年 3 月 12 日，欧盟根据法规（Regulation(EU) 2022/345）禁止向 7 家俄罗斯银行提供用于交换金融数据的专用金融信息服务，即将这 7 家银行踢出 SWIFT。2022 年 5 月 31 日，欧盟在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中，又追加了对 3 家俄罗斯银行的制裁。^③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俄罗斯共有 10 家银行被排除在 SWIFT 外，分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俄罗斯外贸银行（VTB）、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Promsvyazbank）、开放银行集团（Otkritie Bank）、社会银行（Sovcombank）、诺维克姆银行（Novikombank）、俄罗斯银行（Rossiya Bank）、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VEB）、莫斯科信贷银行（Credit Bank of Moscow）和俄罗斯农业银行（Russian Agricultural Bank）。对于提供支付服务（特别是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而言，SWIFT 是重要的信息通讯平台，发挥传送“信息流”的重要作用。俄罗斯大型银行被踢出 SWIFT 系统，将严重影响其金融信息传递的便利程度。

^① See the European Council,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since 2014)”, November 19,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sanctions/restrictive-measures-against-russia-over-ukraine>

^② Ibid.

^③ Ibid.

2. 将俄罗斯大型银行纳入代理行和通汇账户制裁清单 (List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Subject to Correspondent Account or Payable Through Account Sanctions/CAPTA)

美国 CAPTA 清单制裁的对象为金融机构，主要措施是禁止美国主体为清单上的实体提供代理行和通汇账户服务。如果将俄罗斯金融机构踢出 SWIFT 是切断俄罗斯银行跨境支付的“信息流”，那么 CAPTA 制裁则主要是切断跨境支付、转账的“资金流”。代理行是跨境支付结算最为常用的业务模式，停止美国主体为俄罗斯金融机构提供代理行服务，将极大地限制被制裁主体进行美元支付、转账的能力。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俄罗斯共有 10 家机构被纳入 CAPTA 清单，主要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及其子公司。

除将被制裁的俄罗斯主体踢出 SWIFT 系统和纳入 CAPTA 清单外，美国还禁止向俄罗斯提供美元现钞或现钞等价物；欧盟限制俄罗斯使用欧元现钞，禁止接受俄罗斯主体大额欧元存款，禁止向俄罗斯主体出售证券并提供托管服务，禁止向俄罗斯主体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等。

(四) 取消俄罗斯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最惠国待遇，对技术、能源等关键产业链实施精准打击

1. 取消俄罗斯的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

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是指作为该组织成员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给予第三国或地区的一切利益、优惠、特权及豁免应无条件地、自动适用于另一国家或地区。2012 年，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其他 WTO 成员有义务在贸易及知识产权领域给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2022 年 3 月 15 日，美欧联合 14 个 WTO 成员发表声明，决定终止向俄罗斯提供 WTO 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对俄罗斯征收惩罚性关税。^①

2. 强化实体清单 (EL) 和商品管制清单 (CCL) 制裁

1997 年，为强化对从事出口或转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体的制裁，美国商务部旗下的工业与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ial Security/BIS) 推出了 EL 清单。被纳入 EL 清单后，美国主体在出口和转出口特定商品前必须向商务

^① See the European Council,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since 2014)”.

部申请许可证。CCL 清单是 EL 清单制裁的配套清单，里面主要涉及实施出口限制的商品门类和组别。^①根据 CCL 分类，BIS 向 EL 清单主体实施不同的商品出口管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BIS 大幅增加 EL 清单中俄罗斯主体数量。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俄罗斯共有 705 个实体被美国纳入 EL 清单，限制出口商品集中在 CCL 清单中编号 3—9 类，合计 58 项产品，包括电子、电脑、电信和信息安全、激光和传感器、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海洋设备及飞机部件等，俄罗斯成为被美国纳入 EL 清单数量最多的国家（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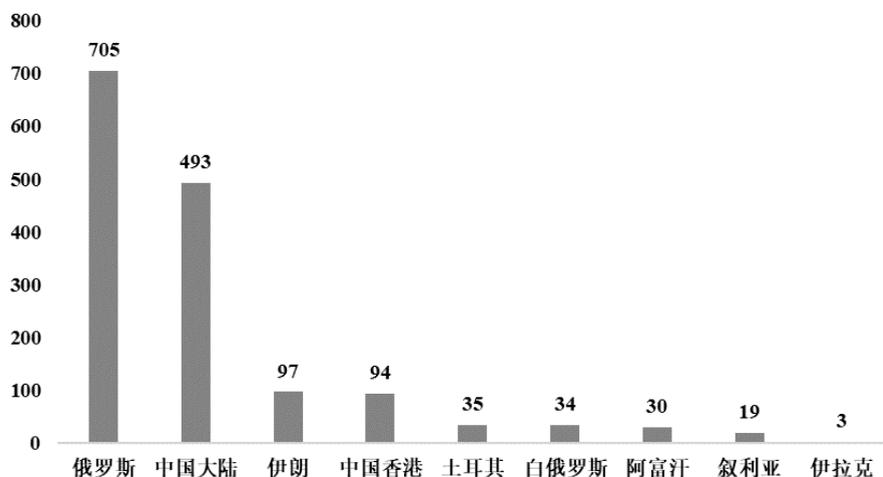


图 2 2022 年 10 月末美国 EL 清单国家和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数据绘制（<https://www.trade.gov/data-visualization/csl-search>）。

在强化 EL 和 CCL 制裁的基础上，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原产最低成分含量的规则标准，更多非美国制造物项中包含的美国原产成分会被视为美国原产受控成分。当对俄罗斯出口或再出口产品中美国原产受控成分达到最低比例要求时，该商品将面临美国出口管制。此外，美国还强化了对

^① CCL 包括编号为 0—9 的 10 类商品（0 为核材料、设施和设备；1 为材料、化工、毒药；2 是材料制造；3 是电子；4 是电脑；5 为电信和信息安全；6 是传感器和激光；7 是导航和航空设备；8 是航海；9 是太空及推进器）和 5 种商品组别（A. 最终商品、设备、配件、系统；B. 测试、检验、产品设备；C. 材料；D. 软件；E. 科技）。

俄罗斯的外国直接产品（Foreign Direct Product/FDP）原则，极大地拓宽了出口管制产品范围。针对俄罗斯“军事最终用途”和“军事最终用户”的出口设定了更严格的许可审查制度，限制产品范围扩大到所有 CCL 产品。同时，美国还针对石油天然气领域商品、奢侈品增设了出口管制。

3. 欧盟对主要商品门类进行全面进出口限制

从欧盟对俄罗斯出口制裁看，欧盟禁止向俄罗斯销售、供应、转让或出口特定炼油产品和技术，并对提供相关服务实施限制；对航空业商品和技术实施出口禁令，并禁止提供与这些商品、技术相关的保险、再保险和维修服务；对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的出口实施限制，限制特定有助于俄罗斯加强国防和安全部门技术的商品和技术出口，包括半导体、尖端技术。

从欧盟对俄罗斯进口制裁看，欧盟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天然气、钢铁、煤炭、木材、水泥、化肥、海鲜和酒。尽管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较高，^①但在欧盟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中，仍将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纳入了制裁的实施范围，这将对欧盟经济带来重大冲击。

（五）强化特定地区封锁，升级二级制裁

1. 对顿巴斯地区实施全面制裁封锁

2022 年 2 月，美国签发 14065 号总统行政令，对俄罗斯承认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制裁，禁止美国主体与上述两地区开展除通用许可规定以外的任何商业活动。针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欧盟理事委员会采取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禁止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进口货物；二是限制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贸易投资；三是禁止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提供旅游服务；四是禁止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出口特定货物或技术。

2. 升级二级制裁风险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主要采用一级制裁方式。从美国对外制裁经验看，多数二级制裁都与一级制裁的强化有关。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曾多次警告，要对与俄罗斯开展黄金储备交易、向俄罗斯受制

^① 2021 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接近 50%，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包括波黑（100%）、拉脱维亚（92%）、奥地利（86%）、芬兰（75%）、斯洛伐克（68%）、希腊（64%）、匈牙利（61%）、斯洛文尼亚（60%）、捷克（55%）、波兰（50%）、德国（49%）、意大利（38%）。

裁主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进行二级制裁，并通过二级制裁警告强化对俄罗斯出口原油的限价。^①整体来看，随着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一级制裁的增多，部分没有美国“连接点”的重大交易面临极高的二级制裁风险。

总体而言，美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归纳为金融和贸易两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美欧冻结甚至罚没了大量俄罗斯海外资产，对俄罗斯国家财富进行掠夺，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其中包括冻结俄罗斯近 3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根据俄罗斯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高的特点，切断俄罗斯主权机构、重要行业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外币融资渠道，加剧俄罗斯金融体系流动性危机；凭借在 SWIFT、代理行账户体系以及评级机构等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全面切断对俄罗斯金融机构的服务，进一步隔离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金融往来。在贸易领域，取消俄罗斯 WTO 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高筑关税壁垒，强化在核心技术、能源等关键产业链方面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

二、美欧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影响

美欧制裁对俄罗斯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显著冲击，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

1. 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俄罗斯经济主要以消费拉动，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2021 年，俄罗斯 GDP 构成中，私人消费占比为 51%，服务业对 GDP 贡献率为 67.8%。2021 年，俄罗斯 GDP 增速为 4.8%，创 2010 年以来最高水平。美欧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2022 年第一、第二季度，俄罗斯实际 GDP 同比增速降至 1.5%、-2.7%，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降至 5.1%、-2.5%，商业景气指数分别降至-2.3、-11.2。俄罗斯央行预计 2022 年全年 GDP 增速将下滑 3%—3.5%。私人消费下滑是俄罗斯经济下行的主要驱动因素。2022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俄罗斯零售消费增速同比降至 3.5%、-9.8%，而固定资

^① See “U.S. senators want secondary sanctions on Russian oil”, September 2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enators-want-secondary-sanctions-russian-oil-2022-09-20>

产投资同比增速为 12.8%、7.8%，^①虽呈下滑趋势，但与俄乌冲突爆发前增速水平相当。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俄罗斯出口对象调整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净出口逆势增长，成为对抗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2. 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

2021 年，俄罗斯 CPI 同比增速为 6.5%。2022 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目标为 4%。受美欧经济制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物价水平大幅攀升。供应链受阻和经济主体预防性动机增强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022 年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16.7%、15.9%和 13.7%，核心通胀率分别为 18.7%、19.2%和 17.1%。糖、牛奶、日用品、汽车和家居化工商品价格涨幅较大。^②通货膨胀急剧攀升，使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下降。2022 年上半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工资、实际可支配收入分别下降 5.5%和 1.9%。同时，俄罗斯居民还受到金融资产价格缩水造成的负面冲击。2021 年末，俄罗斯居民共持有金融资产 113 万亿卢布，其中，股票与投资基金规模为 41 万亿卢布；同时，俄罗斯居民持有 9 万亿卢布外币存款，这些存款主要分布在欧洲，面临被冻结和限制使用的风险。

（二）进出口受到非对称影响，部分行业遭遇严重冲击

1. 进出口受到非对称影响

2022 年前三季度，俄罗斯实现经常项目顺差 19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3.7%。其中，出口 48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6%；进口 2453 亿美元，同比下降 9.7%。

美欧制裁给俄罗斯出口带来了结构性冲击。2022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俄罗斯对非独联体国家天然气出口分别同比下降 35%和 61%；2022 年第二季度，俄罗斯对欧盟木材出口下降 67%。2022 年第三季度，欧盟对俄罗斯的钢铁和煤炭制裁生效，俄罗斯对欧盟钢铁出口同比下降 67%，煤炭出口同比降幅超 50%。同时，为确保制裁下必要的资源储备，俄罗斯对 200 多种商品进行出口管制，包括轮船、电信、医疗设备和家用设施等。

俄罗斯出口逆势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① See Bank of Russia, “Bank of Russia Statistical Bulletin No.9 2022”, October 13, 2022, <https://www.cbr.ru/eng/statistics/bbs>

^② Ibid.

2022年前三季度，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100美元/桶。尽管受到制裁限价影响，俄罗斯出口原油售价仍能达到80美元/桶。欧洲天然气价格增长3.7倍，煤炭价格增长3倍，铝价增长20%，这些对俄罗斯出口增长形成重要支撑。二是俄罗斯的出口替代策略发挥了作用。受制裁影响，俄罗斯对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立陶宛和西班牙的能源出口大幅缩减。俄罗斯及时调整出口目的地，加大了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力度。2022年5月，俄罗斯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同比增长55%，对印度的原油出口同比增长4.7倍。^①

俄罗斯进口端受制裁冲击更为明显，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锐减是主要推动因素。202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欧盟对俄罗斯出口缩减幅度超50%。此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产品。俄罗斯面临的进口冲击还体现在大量外资企业撤离方面。大量科技公司、软件开发商、电脑硬件制造商停止在俄罗斯经营，许多化工、电子、汽车行业外资企业停止在俄罗斯生产。尽管进口端短期受到显著冲击，但长期以来，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已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低，国内生产对中间品进口依赖度不高，制裁对进口乃至产业链的冲击以短期为主，长期冲击效果有限。

2. 部分行业企业遭遇严重冲击

受美欧制裁影响，俄罗斯部分行业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航空业是受制裁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的禁止通航制裁措施导致俄罗斯多条国际航线中断，航运量大幅下滑。2021年，领空限制地区贡献了俄罗斯国际航线30%的客运量。美欧还禁止向俄罗斯航空企业提供飞机租赁、保险和维修等服务。2021年末，俄罗斯涉及制裁的航空租赁业务规模达0.8万亿欧元，占租赁总额的14%。由于经营困难，部分航空企业已接受来自俄罗斯政府的救助。汽车行业也面临外资撤出、零部件短缺、生产和信贷成本大幅飙升等多重打击。2022年4月，俄罗斯新车销售额同比下降78.5%，乘用车价格同比上涨50.7%。欧盟商业协会（AEB）预测，2022年俄罗斯汽车产量将下降50%。俄罗斯商业地产业也遭受到严重冲击，160余家国际零售连锁

^① See Bank of Russia, *Russia's Balance of Payments No.1-2(11)·2022 Q2*, July 26, 2022, http://www.cbr.ru/Collection/Collection/File/42212/Balance_of_Payments_2022-1-2_11_e.pdf

店停止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大量外资企业撤出导致商业地产空置率大幅提升。2022 年第二季度末，俄罗斯购物中心出租空置率攀升至 35%。^①

（三）跨境资本大幅外流，储备资产遭大面积冻结

1. 跨境资本大幅外流

俄罗斯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出的 40 项资本项目开放标准中，俄罗斯全部实现了“基本可兑换”，其中 19 项达到“完全可兑换”。俄罗斯长期的贸易顺差形成了大量对外净资产。2021 年末，俄罗斯对外资产为 16515 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其他投资、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占比分别为 38.2%、37.3%、29.5%和 7.1%。同期，俄罗斯对外负债 11666 亿美元，直接投资、其他投资和组合投资占比分别为 52.3%、24.3%和 23.5%。美欧制裁使俄罗斯资本外流压力加大，对外负债快速收缩。2022 年第一季度末，俄罗斯对外负债减少 1786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下降 888 亿美元，组合投资下降 850 亿美元。^②这和外国大型企业撤出俄罗斯市场、^③外国投资者减持俄罗斯证券的行为息息相关，也与卢布汇率大幅下跌有关。2022 年第二季度末，随着局势的好转，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负债分别较第一季度末提高了 1709 亿美元和 614 亿美元（见表 1）。

表 1 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国际投资头寸变化（亿美元）

	2021Q4	2022Q1	2022Q2		2021Q4	2022Q1	2022Q2
资产	16515	15993	17206	负债	11666	9880	12098
直接投资	4870	3979	5016	直接投资	6101	5213	6922
组合投资	1174	937	886	组合投资	2736	1886	2500
其他投资	6164	5012	5463	其他投资	2829	2781	2676
储备资产	6306	6064	5841	净资产	4848	6112	510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绘制。

① See Bank of Russia,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Q4 2021 – Q1 2022)*, May 31, 2022, https://www.cbr.ru/Collection/Collection/File/41036/OFS_22-1_e.pdf

② See Bank of Russia, *Russia's Balance of Payments No.1-2(II)-2022 Q2*, July 26, 2022.

③ 耶鲁大学在对俄乌冲突以来在俄罗斯的跨国企业应对策略调研时发现，跨国企业主要采取大幅撤出、暂停业务、压缩现有业务、减少新投资和继续发展五种策略。超 70% 的外资企业采取大幅撤出和暂停业务策略，只有不足 10% 的企业采取继续发展策略。跨国企业撤出，对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2. 储备资产遭大面积冻结

2014年以来，俄罗斯持续推进“去美元化”战略，大幅降低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比例，更多转向欧元、黄金等资产。2021年末，俄罗斯储备资产金额为6306亿美元。其中，欧元（32.3%）、美元（16.4%）、英镑（6.5%）合计占比达55.2%。美欧制裁措施出台，使俄罗斯大部分储备资产陷入冻结，显著降低了俄罗斯应对外部流动性冲击、维持本国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美欧实施制裁措施以来，受汇率波动及必要的流动性干预操作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储备资产规模持续缩水，已由2022年初的6306亿美元降至2022年9月末的5407亿美元。^①

（四）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1.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利率水平大幅飙升。为抑制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压力，俄罗斯央行将政策利率提高至20%。政策利率抬升使俄罗斯货币市场利率飙升。2022年3月1日，俄罗斯卢布隔夜平均指数（RUONIA）升至20.51%，较2月1日提高了12.4个百分点。在货币市场利率飙升的同时，俄罗斯银行间市场外币流动性快速萎缩。2022年1月，俄罗斯银行间市场外币（美元和欧元）存款和回购日均交易额分别为7040亿卢布和2087亿卢布；2022年第二、第三季度，两个交易品种的日均交易额分别降至3237亿卢布和672亿卢布。俄罗斯本外币国债遭大面积抛售，国债价格、交易量显著下降，买卖价差大幅走阔。美元计价的离岸俄罗斯国债价格跌幅超过60%，交易溢价增长10倍，交易量缩小60%（见表2）。

表2 2022年1—10月俄罗斯10年期国债重要指标日均变化

债券类型	时间	均价	买卖价差	交易量
卢布计价10年期国债	冲突爆发前（1.1—2.24）	98.2	0.03 卢布	6681 亿卢布
	冲突爆发后（2.24—10.31）	93.0	0.2 卢布	2512 亿卢布
美元计价10年期国债	冲突爆发前（1.1—2.24）	102.4	0.42 美元	0.67 亿美元
	冲突爆发后（2.24—6.30）	42.9	4.25 美元	0.22 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彭博数据库数据绘制。

汇率大幅下挫后强势反弹。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国内资本外流压力加

^① See Bank of Russia, *Russia's Balance of Payments No.1-2(11)-2022 Q2*, July 26, 2022.

大，储备资产遭大面积冻结，部分俄罗斯大型银行外汇资产被冻结，这些都对外币流动性供给造成负面冲击，从而导致卢布汇率快速贬值。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0 日，卢布对美元汇率由 85.0 降至 118.4；卢布对欧元汇率由 95.3 降至 128.0。面对汇率贬值压力，俄罗斯采取了积极的反制措施，包括出口企业 80% 的收入须强制结汇，禁止与非友好国家、非居民进行外汇交易，将购买美元、英镑、欧元的手续费提高 30% 等。在出口大幅增长和结汇政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外汇供给明显增加，卢布汇率强势反弹。2022 年 10 月末，卢布对美元、欧元汇率反弹至 61.5、61.1。值得关注的是，在大幅减少美元和欧元交易的同时，俄罗斯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大幅增加。

境外股票融资功能全面丧失，境内股价大幅下跌。欧美制裁措施出台后，西方资本全面与俄罗斯股票划清界限。俄罗斯在境外上市的股票遭大面积抛售，被迫退市。被迫退市的公司大多为俄罗斯知名企业，包括在美国上市的 Yandex、在伦敦上市的 VTB 银行、在德意志交易所上市的俄罗斯航空（Aeroflot）、俄罗斯石油（Rosneft）以及俄罗斯储蓄银行（Sberbank）等。从俄罗斯国内市场看，制裁政策推出后，莫斯科交易所 MOEX 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2022 年 2 月 24 日单天下挫 1026 点，跌幅达 33.3%，抛压盘使交易量“井喷”。经半个多月休市，市场的恐慌情绪才有所缓解，MOEX 缓慢震荡下行，交易量较制裁前明显收缩（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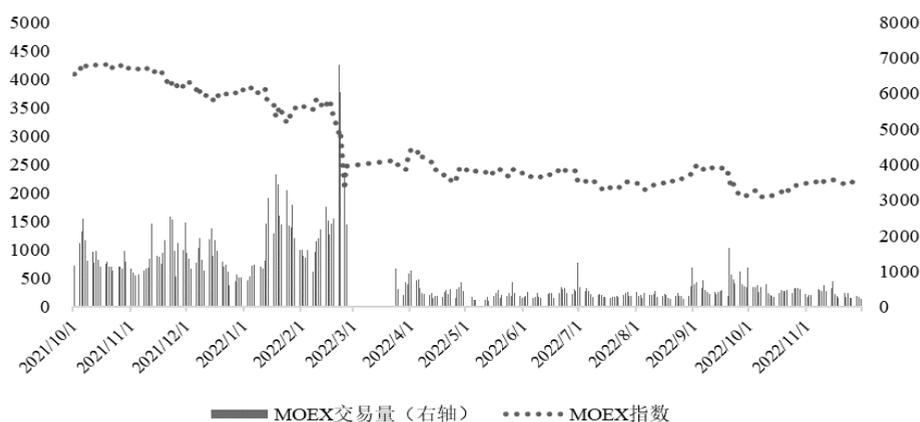


图 3 莫斯科交易所 MOEX 指数及交易量变化（亿卢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彭博数据库数据绘制。

2. 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主权债务可持续性受损。近年来，依靠良好的能源出口表现，俄罗斯财政运行状况较为稳健。2021年，俄罗斯财政差额占GDP比重为0.4%，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美欧制裁将俄罗斯财政部等主权机构纳入NS-MBS清单，切断了其债券发行、投资和交易环节的美欧“连接点”。外国投资者是俄罗斯主权债券投资者的重要构成。2021年末，在卢布计价的俄罗斯国债（OFZ）市场，外国投资者持有份额超20%。在外币计价的俄罗斯国债市场，外国投资者平均持有份额超50%。^①为强化制裁效果，标普、惠誉、穆迪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俄罗斯主权债券评级降至“垃圾级”。不仅如此，欧美金融机构拒绝为俄罗斯主权债务的利息及本金偿付提供金融服务，俄罗斯政府再融资能力受到明显抑制。2022年9月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俄罗斯离岸债券比例由2021年最高的54%降至47.5%。

非金融企业债务偿付压力上升。除对主权机构进行融资限制外，美欧对俄罗斯大型企业实施了广泛的融资阻断制裁，主要涉及采矿、电力、电信网络、航空、造船、农业、机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2022年6月末，俄罗斯外债规模为4707.2亿美元，较2021年末下降了4.1%。美欧切断俄罗斯部分非金融企业融资渠道，并冻结外币资产，严重影响被制裁主体再融资和外币债务偿付能力。与此同时，国内政策抬升利率，提高了可变利率贷款偿付压力，企业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五）银行业功能发挥受限，保险机构经营面临冲击

1. 银行业功能发挥受限

俄罗斯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业资产占金融资产比例超过50%。银行业是美欧对俄罗斯制裁的重点。美国将俄罗斯多家大型银行纳入SDN清单、NS-MBS以及SSI清单。欧盟也将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纳入限制性清单，并把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等10家机构从SWIFT系统剔除（见表3）。据统计，遭美欧制裁的俄罗斯银行总资产规模超过俄罗斯银行业总资产的70%，俄罗斯50%以上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受到波及。部分受制裁银行在俄罗斯发挥特殊功能。例如，Bank Rossiya是俄罗斯政府

^① 数据来源为彭博数据库。

官员的私人银行，为俄罗斯政府精英管理大量离岸财富。VEB 是俄罗斯开发性金融机构，其资产大量配置于俄罗斯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也是俄罗斯主权债务发行和外部资产管理的代理机构。

美欧制裁对俄罗斯银行体系外币业务形成冲击。俄罗斯银行业外币资产显著高于外币负债，美元资金来源匮乏。2021 年末，俄罗斯银行业跨境外币净资产与外币资产比例接近 50%。^①俄罗斯银行被纳入 SDN 清单，导致大量美元资产遭遇冻结，加剧了俄罗斯银行体系外币流动性匮乏程度。CAPTA 和 SWIFT 制裁对俄罗斯汇兑及跨境支付体系造成冲击。俄罗斯金融机构日均外汇交易规模为 460 亿美元，其中 80% 是美元交易，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 Sberbank 和 VTB 的美元支付结算份额超过 50%。两家机构均无法处理美元支付结算业务，造成外币支付结算效率大大降低。

表 3 美欧对主要俄罗斯银行制裁情况

	SDN	SSI	NS-MBS	CAPTA	阻断	SWIFT	概 况
Sberbank	√	√	√	√		√	俄罗斯最大银行，资产占银行业 30% 左右，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VTB	√	√				√	俄罗斯第二大银行，国际化程度最高银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Gazprombank		√	√				俄罗斯第三大银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广泛服务能源业务
VEB	√	√			√	√	俄罗斯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代理政府外债发行，投资基建项目
Otkritie Bank	√					√	俄罗斯资产规模第五大银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Promsvyazbank	√				√	√	俄罗斯国防银行，业务特色包括为直升机提供融资
Credit Bank of Moscow			√			√	俄罗斯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Bank Rossiya	√				√	√	俄罗斯政府官员私人银行，为俄罗斯精英保留离岸财富
Sovcombank	√					√	俄罗斯资产规模第九大银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Novikombank	√	√				√	俄罗斯资产前 50 大机构，主要服务国防部门
Russian Agriculture Bank		√	√			√	提供贷款支持俄罗斯农工综合体的主要金融机构
Alfa-Bank	√		√				俄罗斯最大私营银行，服务面向企业和零售客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银行年报信息整理绘制。

① BIS 已于 2022 年度停止披露俄罗斯银行业跨境资产和负债相关数据。

除涉外业务，美欧制裁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境内业务也造成了冲击，特别是产生了信贷紧缩效应。2022年8月末，俄罗斯银行业总贷款余额为79.18644万亿卢布，规模较2022年2月末下降1.8%，其中，卢布贷款增速下降1.4%，外币贷款下降2.9%。从资产质量看，俄罗斯银行业长期受不良资产困扰。2022年1月末，俄罗斯银行业大企业不良贷款率为7.1%，中小企业为10.3%。美欧制裁对实体企业经营造成重大冲击，银行无法全面评估资产质量，但明显加快了债务重组速度。2022年3—4月，俄罗斯银行业重组了占总资产6.3%的大型企业贷款，其中一半是浮动利率贷款。在零售贷款方面，2022年3月—4月，俄罗斯未按期还款的消费贷款占比由5.3%上升至7.5%。俄罗斯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不高，2021年末不足12%。美欧制裁后，俄罗斯银行外部筹资能力下降，脆弱性风险显著提升。^①

2. 保险业经营面临冲击

美欧制裁对俄罗斯保险业造成了冲击，再保险业务首当其冲。俄罗斯再保险业务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俄罗斯72%的再保险保费转移到国际市场，其中62%被移至“不友好国家”。受制裁影响，俄罗斯保险公司不能通过不友好国家保险机构开展再保险业务转移风险；同时，“不友好国家”再保险机构对存量再保险权益拒绝索赔概率上升，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潜在风险。另外，受零部件成本上升及物流中断等因素影响，俄罗斯汽车保险的偿付率大幅上升。2022年第一季度，综合损失率为93.7%，较2021年同期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期，俄罗斯汽车第三方责任险平均支付金额升至7.28万欧元，同比增长6.7%，支付率也由74.4%升到了77.7%。^②

面对美欧推出的高强度经济制裁，俄罗斯在多个领域推出一揽子措施予以应对。俄罗斯主动划分“不友好”与“友好”阵营，对美西方多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对等制裁和禁令。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加快进口替代进程，优先保障国内市场运行与社会民生，支持俄概股回归俄罗斯境内，有序接管外资撤离的企业。实行临时外汇管制与交易暂停措施，禁止卖空交易，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缓冲资金等手段，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安全，加快支付通

^① See Bank of Russia,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Q4 2021 – Q1 2022)*, May 31, 2022.

^② Ibid.

信向国内系统转移。特别是俄罗斯推行天然气交易卢布结算，将卢布价格与黄金挂钩，以大宗商品支撑卢布币值信用。反制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卢布汇率快速稳定，资本外逃趋势得到扭转，经常账户顺差创历史新高。

三、美欧制裁对全球政经格局的影响与冲击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俄乌冲突及美欧制裁将进一步加速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演进，成为国际关系与治理体系的重要分水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冲突与制裁下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分化

俄乌冲突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后冷战秩序的终结。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范围从军事、经济等领域，上升至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全面化、长期化、复杂化特征，成为全球前行发展的最大阻碍。

1. 俄乌冲突及相关制裁将 21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划分为三大阵营

俄乌冲突及相关制裁实施后，将世界格局划分为三大阵营：美欧等西方国家，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等盟国，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中东、拉美国家在内的中间地带。前两大阵营的制裁博弈更加激烈；中间地带国家则尝试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最大程度地远离军事冲突与制裁威胁。一些中间地带国家在复杂的大国对抗中利益分化，难以“左右逢源”，其立场始终存在变数，未来可能在各种场景下出现摇摆。

2. 从中长期看，美俄两个阵营的力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相较于冷战结束时期（1990 年代）的苏联阵营，2020 年俄罗斯阵营在全球人口中占比从 9.2% 下降至 2.5%，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从 10.5% 萎缩至 3.5%，与美国阵营的差距分别扩大了 3.9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①无论俄乌冲突如何演进，俄罗斯地位将相对衰退。同时，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也在下降。相较于冷战结束时期，2020 年美国阵营在全球人口中占比从 48.1% 降

^① See Nicolas Véron, “Putin’s Russia May Echo the Soviet Bloc, But It Is Far Smaller”, April 7, 2022,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putins-russia-may-echo-soviet-bloc-it-far-smaller>

至 45.3%，在全球 GDP 中占比从 70.6%降至 64.8%。俄罗斯更多地绑定东方，而欧盟国家大部分站队美国。

（二）全球经济大循环遭受侵蚀，大国经济局部“脱钩”

2021 年，俄罗斯、乌克兰在全球经济与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仅为 1.9%和 2.5%，但在一些领域具有系统重要性。俄乌冲突及相关制裁直接冲击甚至瓦解了固有的经贸秩序，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与大国经济“有限脱钩”。

1. 供应链面临结构性冲击，全球经贸增长进一步失速

在当前全球疫情反复、复苏基础不稳的背景下，俄乌冲突和美欧对俄制裁升级加剧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贸易景气程度大幅下降，进一步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地缘政治冲突及相关制裁直接影响国际运输，黑海航运、欧亚航线等运输链条受阻，物流成本大幅上升。同时，冲突与制裁间接波及第三方国家，影响全球供应链原有的运行秩序。根据 WTO 预测，受俄乌冲突及制裁措施影响，2022 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从原来的 4.7%降至 2.4%—3%之间。俄罗斯、乌克兰在局部供应链中处于重要地位。俄罗斯、乌克兰是粮食出口大国，两国的小麦、大麦、玉米出口总量约占全球的 26%、30%和 16%。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约 40%的谷物进口来自俄乌两国，黎巴嫩、埃及、阿联酋的小麦进口对俄乌的依赖度甚至高达 87%、73%和 52%。受俄乌冲突及经济制裁因素影响，全球将有数千万人面临饥饿威胁。在稀有金属供应方面，俄罗斯、乌克兰也占据重要份额。俄乌冲突与相关制裁的持续，将导致汽车、半导体行业面临新一轮材料短缺。

2. 美欧主导“有限脱钩”，全球大循环遭到破坏

俄乌冲突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产生蝴蝶效应，对抗与制裁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美欧等西方国家极力转向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主导，全球大循环转为区域、联盟、双边、国内的小循环，以“安全”取代效率，经贸合作更趋政治化。由此，大国及其阵营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走向“有限脱钩”，在贸易、投资、移民、资金、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对关键技术设立特殊保护，推动关键产业回流国内，或转移至同盟伙伴，全球互联互通程度进一步降低。以直接投资为例，受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等因素影响，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绿地投资与跨境并购规模分别下降 21%和 13%，第二季度全球直接投

资 (FDI) 继续环比减少 31%，此前 FDI 增长的势头难以持续，2022 年将再度陷入疲软萎缩，商业投资环境遭受地缘政治冲击，变得更加复杂严峻。这将影响竞争与创新，损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三)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步入调整与变革期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金融制裁日益成为西方围堵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国加大反洗钱与财富调查力度，逐步建立金融制裁的有效网络与全方位工具箱。西方国家凭借货币霸权，滥用金融制裁，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促使各国加快支付金融领域改革与建设。

1. 地缘政治变局下安全考量优先，全球加快调整储备货币配置的步伐

在本轮针对俄乌冲突的制裁中，美欧等西方国家首次将俄罗斯这一系统重要性主权国家的央行纳入制裁范围，完全冻结其储备资产，阻断其国际金融往来交易。可以预见，全球各国政府以及投资者出于风险与安全考量，将逐步降低美元乃至西方阵营国家货币的持有比重。特别是对于俄罗斯、伊朗等受制裁国家，将进一步“去美元化”，并降低欧元配置比例，更多转向黄金、人民币等其他选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56%，如果其调整外储配置结构的 10%，将对全球储备格局乃至货币体系带来 5.6% 的重大变化。

2. 尽管短期内美元主导地位难以取代，但石油美元的基石有所松动

当前，美元在全球支付交易、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分别为 40.5%、59.2%，加上欧元、英镑、日元、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西方阵营货币合计份额分别为 89.3% 和 94.4%。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是一个长期过程，与全球经贸模式高度相关，非美货币短期内难以颠覆美元的主导地位。然而，在西方围堵与制裁下，俄罗斯推动能源交易卢布结算，压低美元交易份额，并对伊朗、中东地区以及全球能源出口的“去美元化”，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带动作用。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沙特与美国的石油美元循环面临冲击。在原有体系下，美国大量购买沙特原油，沙特则通过购买美国商品、服务，特别是投资美国计价资产来实现“回补”。近年来，随着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以及双方政策分歧加大，沙特的“回补”逐步减少。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沙特存在摆脱过度依赖美元的动机，而这也可能促使沙特的原油

出口转向非美元计价结算。

3. 区域合作推动区域本币使用，数字技术为跨境高效安全支付赋能

随着西方制裁的加剧和逆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各国发展转向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国内循环、区域合作、联盟对接的模式，或将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原有的多边秩序，降低固有货币惯性，促使新的区域内货币脱颖而出和区域金融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首先，随着经济分化与区域合作，出于安全稳定的考虑，各国货币将更多锚定盟友、区域内主导货币甚至黄金。其次，世界各国将加快本土支付系统建设，并积极深化双边、区域支付合作。2022年4月，在金砖国家部长级会议上，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提议，金砖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更多依赖本币，整合支付系统，创建 SWIFT 替代品。再次，货币支付体系数字化提速，跨境支付成为重要应用场景。据 BIS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调查显示，2021年约有90%的央行和货币当局参与了不同形式的CBDC研发应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①与发达经济体不同，跨境支付成为近两年新兴市场探索CBDC的更重要动机。为了更好地实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目标，新兴市场将加快CBDC研发应用以及双边、区域CBDC支付系统互联。2022年9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②真实交易试点测试完成，CBDC初步应用于跨境支付，大国货币竞争将步入数字化时代。

（四）全球绿色转型进程面临波折

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和第四大天然气出口国，在能源供给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乌冲突与美欧制裁相叠加，政治经济多重因素交织，全球能源格局加速重塑。

1. 全球能源价格短期冲高，供需再平衡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随着俄乌冲突发酵以及西方制裁加剧，全球能源价格经历大幅上涨过程。截至2022年10月末，标普高盛能源全收益指数较年初上涨55%，石油、天然气、煤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能源格局再平衡将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是能源增产

^① See Anneke Kosse, Ilaria Mattei, *Gaining momentum – Results of the 2021 BIS survey o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ay 2022, p.1. <https://www.bis.org/publ/bppdf/bispap125.pdf>

^②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CBDC Bridge）是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阿联酋央行的联合项目。

步伐，特别是中东的能源增产意愿与诉求。然而，中东国家拒绝选边站队，对于原油增产态度暧昧，与俄罗斯利益趋同，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价值理念上有所分化。特别是近期，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产油国倾向于减产以平衡供需，OPEC+达成每天减产 200 万桶的协议，将一直持续到 2023 年末。二是能源制裁程度。欧洲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最重要市场，其对俄石油、天然气的制裁程度以及时间将直接影响全球能源格局走向。随着欧盟对俄原油禁运制裁生效，俄罗斯 2023 年产量将减少 140 万桶/日。同时，美欧等七国集团国家对俄罗斯海运原油设定 60 美元/桶的进口价格上限，将进一步扰乱全球原油供给。三是能源需求萎缩程度。2022 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能源需求回落，全球能源市场将在经济增长放缓与供给增长之间滑向平衡。长期来看，能源风险溢价将下降，但多重因素交织演进，可能短期冲高，出现阶段性震荡。

2. 通胀脱锚风险上升，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峰回路转

在西方制裁下，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升，对于通胀指标的传导影响是迅速而巨大的。以欧元区为例，2021 年，电费、取暖费以及交通燃料费约占个人消费支出的 9.6%。欧洲央行报告显示，石油价格在每桶 100 美元，HICP 能源分项对于石油价格的弹性达 0.4。根据 IMF 预测，2022 年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将达 7.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预期将达 9.9%。同时，随着俄乌冲突与西方制裁推进，能源供需失衡预期加剧，各国买家加快在全球范围内争抢煤炭等传统化石燃料。过去五年，尽管可再生能源比例不断提高，化石燃料在欧盟能源结构中占比依然达六成，且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进口比例分别高达 90%、97%和 70%。倡导绿色发展的部分欧洲国家，不得不改用传统化石燃料化解短期内天然气短缺的问题，甚至重新启动燃煤电厂。但是，从长期来看，经过本轮危机，主要国家均意识到能源独立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性，将强化政策导向与投资力度，进一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赖，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例如，欧盟计划五年内投资 1950 亿欧元，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建设更有弹性的电力系统和能源联盟，至 2030 年能源消耗减少 13%，可再生能源占比达 45%，切实降低化石能源消耗以及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

四、启示与建议

美欧联合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放缓，航空、汽车等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储备资产遭大面积冻结，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银行业功能发挥受限等方面。面对严峻形势，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俄乌冲突及美欧制裁将进一步加速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演进，面对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我国应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加强顶层设计，编织制裁免疫“安全网”

俄乌冲突后，大国博弈与对抗不断升级，通过提高经济金融依存度捆绑政治外交关系的做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大国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利益面前，我国面临的制裁风险显著提高。当前，应积极拓展“朋友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建立起新型国际关系。以“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 RCEP 等为切入点，共同打造和培育“制裁免疫”的经贸合作联盟，构建独立于美欧“连接点”的贸易、金融区域循环体系，提高各成员国经济、金融依存度，共同编织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议成立制裁风险应对小组，研究和制定制裁风险应对方案和反制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制裁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对俄罗斯反制措施的系统性研究，从国情出发，基于关键出口产品、产业链布局、储备资产结构及中概股回归等风险点，制定有效的应对与反制措施。考虑设立专门对接俄罗斯贸易往来、与西方金融体系“脱钩”的小型银行，绕开美欧制裁链条。

（二）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独立自主的支付体系

美国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严重破坏了美元的国际信誉，动摇了西方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应鼓励本币优先，有意识地引导企业、金融机构逐步调整资产负债摆布，降低对单一货币依赖度。以“一带一路”、RCEP 为契机，深化区域货币合作，针对战略资源进口地，升级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拓展双边本币互换功能，推动直接交易平台建设。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降低美元资产比重，增持战略性资源，动态调整资产境外分布。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本国银行、银

行卡组织对接境外支付与信息传输系统，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扩大专线连接范围，鼓励更多中外资机构参与系统。针对能源、粮食等关键领域，建立专项跨境撮合与交易平台，推动更多外币支付在境内碰头、轧差。做好 SWIFT 和美国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对我国关闭服务的应急预案演练。把握金融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契机，推动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变革与标准重塑，在新一轮变革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自主性。

（三）重新审视经济安全，提高产业链韧性

短期看，针对俄乌冲突造成的国际供应链紧张、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应加强粮食、能源等关键产品的保供稳价，加强大宗商品期货现货市场联动监管，稳定市场预期。拉直贸易链条，降低交易成本。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库存管理，通过合理使用金融工具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油气进口企业可与俄罗斯油气出口商就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达成一致，在确定交易所有元素均不在任何制裁范围的情况下进行采购。长期看，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经济发展重心从增长向安全适度转移，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高经济韧性。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如军工、能源、粮食以及重点制造行业，要确保独立自主与产业链的完整性、竞争力。加快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部署，加大对“卡脖子”关键项目投入力度，弥补关键技术缺失，切实推动科技强国与制造强国建设。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the U.S. and EU have continuously toughened their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by strengthening asset freezing, financing restrictions, financial service blocking and trade control measures. Affected by the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Western camp, Russia's economic growth rate has declined sharply, and the inflation rate has been high. Its imports and exports have been asymmetrically affected, and industries such as automobiles, aviation, and commercial real estate have been severely impacted. Russia's cross-border capital outflows have been large, and its reserve assets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as well.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 is heightened,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is challenged. The U.S. and EU sanctions have

further polarized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landscap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eroded and partially “decoupl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lobal gree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facing major setbacks. Encountering rising risks of sanctions under the evolving geopolitical situatio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weave a “security net” for sanctions immunity, order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improv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payment system, re-examine its economic security and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stern Sanction,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Russia-U.S.-EU Relationship

【Аннотация】С момента начала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в 2022 го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постоянно усилива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путём замораживания активов, финансов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финансовых блокад и контроля в сфере торговли.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санкций Запада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России резко снизились, а уровень инфляц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ти; импорт и экспорт носят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а такие отрасли, как автомобилестроение, авиация и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подверглись серьезным потрясениям;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й капитал России пострадал о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го оттока, а резервные активы были заморожены 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ь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рынка усилилась, и приемлемость уровня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вызовами. Санкции США и ЕС в связи с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еще больше поляризовали глобальную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карту,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поставок переживают кризис и частично «разорвалис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валю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вступила 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зелё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серьезн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Сталкиваясь с растущим риском санкций в условиях изменени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рхитекторика,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ледует укреплять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создавать «страховочную сеть» чтобы выработать иммунитет к санкциям;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порядоченно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юаня и повысит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платёж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улучшить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цепочк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западные санкци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цепоч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валю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я-США-ЕС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美军用人工智能竞争的战略稳定风险 及其治理路径*

张 煌 杜雁芸**

【内容提要】俄美两国围绕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竞争空间方面,呈现陆、海、空、天、网络等多维一体的特征;在竞争领域方面,呈现由常规领域向核领域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在竞争策略方面,呈现出美国追求全面领先优势与俄罗斯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策略之间的差异性。俄美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对首攻稳定性而言,人工智能会削弱俄美建立在二次打击能力基础之上的“报复性力量”,动摇“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稳定模式,从而激励实施先发打击的意愿;对危机稳定性而言,俄美核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化发展,可能增加危机意外升级和人为升级的风险,进而导致升级进程失去控制;对军备竞赛稳定性而言,俄美在人工智能军备发展意图和能力上的不透明性,降低了双方的信任度,导致军备竞赛的持续深化。实现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安全治理,必须密切人工智能军事强国之间的对话交流,增强战略互信,构建安全利益共同体;必须完善涵盖军备控制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和伦理道德约束机制在内的治理体系;必须以全球治理的理念构建安全治理网络,汇聚科技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力量,共同推动安全治理进程。

【关键词】军用人工智能 自主武器系统 俄美军备竞赛 战略稳定性 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E9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6-0157(34)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计划重点项目“ANT视域下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0AZX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

** 张煌,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杜雁芸,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军备竞赛，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以及“相互确保生存”的“恐怖平衡”。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指出，“构成相互威慑的并不是‘平衡’（即在局势中双方的全然平等或对称），而是平衡的稳定性。而且仅当双方中任意一方都无法通过抢先袭击来摧毁对方还击的能力时，平衡是稳定的”^①。在两个核大国之间，避免核突袭和维系可生存的二次核打击能力的现实需求，推动了学界对于如何实现核均势和确保战略力量稳定的深入探讨，战略稳定性作为核军备控制领域的重要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由此也形成了以核力量制衡为中心、以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为主体的战略稳定性理论体系。

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人类战争空间的不断拓展以及战略性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学界对于战略稳定性理论的研究已经日益突破以核力量为中心的传统分析框架。进入 21 世纪，人工智能、太空武器、网络攻防技术、高超声速飞行器、导弹防御技术以及具有战略射程的常规精确打击武器等非核装备技术蓬勃发展，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新技术与战略稳定性的讨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海瑟·威廉姆斯认为，“非核力量和整体的进攻-防御平衡对战略稳定至关重要”^②。德国汉堡大学的利亚纳·菲克斯和乌尔里希·库恩进一步指出，“围绕战略稳定性的讨论不能局限于核武器领域，还需要考虑其他影响战略稳定性的新兴技术，具体包括太空、网络空间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③。

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以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图像识别、自动驾驶、大数据分析以及深度伪造等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世界军事强国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发展进程，不断提升武器装备的智能化、自主化水平，围绕人工智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正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当前，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军备竞赛是否

① [美]托马斯·谢林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 年，第 246 页。

② Heather Williams, “Strategic Stabi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Future of Arms Control”, *Survival*, April-May 2018, Vol.60, No.2, p.46.

③ Liana Fix, Ulrich Kühn,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20, No.260, p.8.

会冲击甚至打破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之上的传统军备力量平衡，进而重塑全球的战略稳定性格局，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并入具有战略性影响的新兴技术这一更加宽泛的主题之中展开的研究。国外学者克里斯托弗·丘巴（Christopher Chyba）、海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莉安娜·菲克斯（Liana Fix）和乌尔里希·库恩（Ulrich Kühn）等在新技术框架下的战略稳定性研究；^①国内学者封帅在《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军用和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全球战略稳定体系的整体影响。^②另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某一特定领域，揭示其与战略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的研究。保罗·沙瑞尔、尤尔根·奥特曼（Jürgen Altmann）、弗兰克·绍尔（Frank Sauer）、迈克尔·霍罗威茨（Michael Horowitz）以及龙坤、徐能武等国内外学者，针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引发的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③此外，蔡翠红和戴丽婷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核指挥控制体系的应用，并探讨了这些应用对全球核战略稳定的新影响。^④

当前，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仍停留在整体而宏观的层面，缺乏区域国别视角的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缺乏从中、美、俄等大国博弈视角具体审视人工智能与战略稳定的专题性、深层次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存在对人工智能赋予国际安全、战略稳定的具体

^① See Christopher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Vol.149, No.2; Heather Williams, “Strategic Stabi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Future of Arms Control”, *Survival*, April-May 2018, Vol.60, No.2, pp.45-54; Liana Fix, Ulrich Kühn,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20, No.260, pp.7-11.

^② 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40-141页。

^③ 参见[美]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Jürgen Altmann, Frank Sauer,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Survival*, 2017, Vol.59, No.5, pp.117-142; Michael Horowitz, “When Speed Kills: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Deterrence and Stabilit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19, Vol.42, No.6, pp.764-788; 龙坤、徐能武：“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困境、出路和参与策略”，《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第78-102页。

^④ 蔡翠红、戴丽婷：“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第79-108页。

作用和影响解析得不够透彻的情况。

本文拟在大国战略博弈的语境中，按照态势分析、问题阐释和对策提出的研究路径，分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选取美国、俄罗斯两个军用人工智能技术先发国家，分析比较两国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特征和相互竞争态势，揭示俄美围绕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两国对于彼此人工智能军备能力发展的认知恐惧体现为受安全困境支配的军备竞赛。第二部分聚焦俄美由陷入军备发展安全困境而来的安全风险和问题，从首攻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三个维度入手，系统分析俄美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对全球战略稳定性造成的威胁和挑战。在全面讨论安全问题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就如何实现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国际安全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一、竞争态势分析

俄美两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军事价值，不仅将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作为推进新军事变革和谋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引擎，而且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视为赢得未来战争和世界领导权的关键。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功”^①，“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也是全人类的未来”^②。俄罗斯不仅制定并实施了《俄罗斯联邦 2030 年前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③还将开发具有人工智能功能的武器装备确定为国防部重点发展的五个优先事项之一，以应对美国和北约的威胁。与之相对应，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指出，“人工智能的进步将改变未来战争形态，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领先者将得到决定性和可持续的优势。在当今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战胜中国和俄罗斯，赢得这个未来”^④。在俄美

① Басилая В. Путин поручил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обновлен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24 ноября 2022 г. <https://vz.ru/news/2022/11/24/1188130.html>

② Лосев А. Военный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24 января 2018 г. <https://arsenal-otechestva.ru/article/990->

③ См. Кочетов 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уж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23 мая 2021 г. <https://dzen.ru/media/dbk/iskusstvennyi-intellekt-uje-v-rossiiskoi-armii-60a92f1fb9ff4e00deae8f2f>

④ Mark T. Esper, “Winning the Futur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une 17, 2021, <https://mwi.usma.edu/winning-the-future-with-artificial-intelligence/>

两国政府和军方高层的强力推动下，双方围绕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了日趋激烈的竞争。

（一）竞争空间呈现多维一体的特征

俄美两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向武器装备转化的进程，强化智能化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开发和应用的能力，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从传统空间向网络、太空、深海等高新空间拓展，人工智能装备的研发和应用竞争愈演愈烈。

美军高层高度重视多维一体的军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埃斯珀指出，“人工智能将改变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的战争。因此，国防部必须准备好能够在这些彻底改变的环境中运行的智能化平台和系统，同时也必须快速采用和实施新兴的、颠覆性的技术手段”^①。陆军方面，美国陆军司令部明确提出了数据分析、自主系统、安全和决策协助等 11 个受到高度关注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②同时，陆军启动了以高级瞄准和杀伤力自动化系统项目（ATLAS）为代表的战斗机器人项目，尝试研发与人类士兵并肩作战的自主武器系统，甚至在高风险环境下代替人类士兵作战。^③空军方面，美国空军利用人工智能改进传统训练系统，为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提供不可预测和适应性强的虚拟作战对手，^④同时积极推动空战装备无人化、智能化发展，形成了以“捕食者”和“收割者”无人机、“忠诚僚机”（有人/无人协同）、“X-37B”空天战斗机、“X-47B”无人战斗航空器等为代表的智能化空中作战力量。海军方面，美国海军不仅于 2019 年 1 月公布了《无人潜航器系统展望》，推动“虎鲸”等超大型无人潜航器项目，还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合作开发了识别深海潜艇的“水下猎手”

^① Mark T. Esper, “Winning the Futur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une 17, 2021, <https://mwi.usma.edu/winning-the-future-with-artificial-intelligence/>

^② See Andrew Eversden, “Army Futures Command Outlines Next Five Years of AI Needs”, August 13, 2021, <https://www.c4isrnet.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2021/08/12/army-futures-command-outlines-next-five-years-of-ai-needs/>

^③ See Kelsey Tayl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ilitary and Modern Warfare”, December 5, 2022, <https://www.hitechnectar.com/blogs/artificial-intelligence-for-military-and-modern-warfare/>

^④ See Robert W. Butt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ilitary”, September 7, 2017, <https://www.rand.org/blog/2017/09/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military.html>

(ACT Sea Hunter) 项目,^①与美国水下无人机公司 Aquabotix 联合研制“蜂鸟”小型水下无人潜航器项目,^②从而构建起水上和水下一体化的无人作战力量。在此基础上,美军正在推进研发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系统(JADC2),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不同空间传感器与火力系统的全域整合。^③

为应对美军的人工智能装备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俄罗斯军方在陆地、海洋、天空等作战空间与美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军备竞争。陆军方面,俄军将陆战机器人视为降低作战人员伤亡、高效完成作战任务的关键力量,部署和组建了以“平台-M”、“阿尔戈”、“铀-6”、“铀-9”为代表的陆战机器人部队,^④其中,“铀-9”机器人配备了战斗模块,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自主路线移动、观察、搜索和目标攻击。^⑤俄陆军还装备了“天王星-9”机器人战斗系统,能够侦察、摧毁敌方作战力量并对己方实施火力支援。^⑥空军方面,俄罗斯军方将无人机视为空中作战力量的倍增器。目前,俄罗斯军方拥有包括“奥兰-10”、“牵牛座”、“猎户座”以及“阿尔提乌斯”等型号在内的 2100 多架无人机,其中,“猎户座”是具有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⑦海军方面,俄海军试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一个由水下潜艇、空中无人机和水面无人驾驶舰艇组成的立体化作战网络。为此,俄军一方面研发和部署了以“维塔兹”无人舰艇、“加尔特尔”水下航行器、“克拉维辛-2R-PM”潜艇以及“波塞冬”无人核潜艇为代表的无人舰

① See Sandbox, “DARPA’s Newest Sub-Hunting Weapon is Shrimp”, October 29, 2020, <https://sofrep.com/news/darpas-newest-sub-hunting-weapon-is-shrimp/>

② See Manufacturers’ Monthly, “Underwater Robotics Company Agrees Swarm-bot Deal with US Navy”, June 13, 2018, <https://www.manmonthly.com.au/news/underwater-robotics-company-test-technology-us-navy/>

③ See David Vergun, “DOD Officials Discuss Advancements in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Control”,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48282/dod-officials-discuss-advancements-in-joint-all-domain-command-control/>

④ 参见马建光:《叙利亚战争启示录》,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⑤ См. Кирилл Р.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22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topwar.ru/189298-iskusstvennyj-intellekt-v-rossijskoj-armii.html>

⑥ См. Кочетов 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уж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23 мая 2021 г. <http://dzen.ru/media/dbk/iskusstvennyi-intellekt-uje-v-rossiiskoi-armii-60a92f1fb9ff4e00deae8f2f>

⑦ См. Алексеева Н., Комарова 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человеку готовые решения»: как развиваются вооружения с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м интеллектом в России. 10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russian.rt.com/russia/article/830565-iskusstvennyi-intellekt-oruzhie>

队；另一方面，2021年11月，俄罗斯国防部为海军舰艇配备了“自杀式”海上无人机编队，以协助海军打击地面目标、敌舰或执行“秘密任务”的特种部队士兵。^①与美军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系统相似，俄罗斯军方使用了ACS人工智能系统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在2019年里海舰队演习期间，俄罗斯空中、陆地和海上力量被合并到一个统一的信息空间中。^②

除了陆、海、空等传统空间，网络、太空等新兴战略空间同样成为俄美智能化军备竞赛的重要战场。一方面，在网络空间领域，人工智能工具应用于互联网络，能够快速自主地检测、评估和利用潜在的网络漏洞，达成网络入侵、木马植入、信息窃取、系统瘫痪等目的，人工智能算法的速度优势有助于美军掌控未来网络攻击行动的主动权。美国国防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于识别和应对网络威胁、加强国土防御以及阻止敌对分子袭击破坏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③2016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持续举办网络挑战大赛，邀请全球顶尖“黑客”展示人工智能的网络进攻潜力。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军事智能化的进程，引发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战略对手的警觉。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洛塞夫认为，“人工智能使得敌对国家的网络攻击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④。曾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尤里·鲍里索夫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在信息空间中提供有效的对抗，并使赢得网络战胜利成为可能”^⑤。2017年，俄罗斯在“扎帕德”军事演习中展示了其网络武器的攻击能力。^⑥2020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对

① See Ben Wodecki, “Russia’s AI Army: Drones, AI-Guided Missiles and Autonomous Tanks”,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iotworldtoday.com/2022/02/27/russias-ai-army-drone-s-ai-guided-missiles-and-autonomous-tanks/>

② See Yasmin Tadjdeh, “Algorithmic Warfare: Russia Expanding Fleet of AI-Enabled Weapons”, July 20, 2021,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1/7/20/russia-expanding-fleet-of-ai-enabled-weapons>

③ Se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ai.gov/summary-of-the-2018-department-of-defense-ai-strategy/>

④ Rod Thornton, Marina Miron, “Towar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The Russian Military’s Use of AI-Enabled Cyber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2020, Vol.165, No.3, p.6.

⑤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проблемы и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27 Марта 2018 г. <https://arsenal-otechestva.ru/article/1010-iskusstvennyj-intellekt-i-puti-resheniya>

⑥ See Pierluigi Paganini, “Zapad drills—Russia may have Tested Cyber Weapons on Latvia”, October 6, 2017, <http://securityaffairs.co/wordpress/63918/cyber-warfare-2/zapad-drills.html>

外宣布了一项代号为“栗子”的非公开竞赛，其目的是开发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作战指挥控制网络。^①在 2022 年的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金融部门和部分政府承包商网站遭遇网络攻击，导致乌克兰内阁官网以及外交、基础设施、教育等部门网站陷入瘫痪。^②

另一方面，外层空间因其维系国家安全的“高边疆”属性，也成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争的重要领域。早在 1997 年，美国空军太空部助理部长基思·R·霍尔就指出，“关于太空优势，我们拥有它，我们喜欢它，而且我们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③。从 1999 年开始，美国空军先后与美国宇航局（NASA）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合作，开发 X-37B 空天一体飞行器，并于 2010 年 4 月完成首次试飞。^④此后，美国围绕人工智能在外层空间的军事应用进程不断加快。2018 年 2 月，美国宇航局计划开发“马斯比”小型飞行协作机器人“蜂群”，作为未来探索火星的手段。^⑤2018 年 4 月，美国宇航局宣布启动自主航天飞船研发项目。^⑥俄罗斯军方自组建太空部队以来，始终追求对抗和破坏竞争对手的太空活动能力，并将人工智能作为实现其战略目的的重要手段。2014 年 6 月，俄军空天一体化防御系统 S-500 系统首次试射成功，该系统具有在无人条件下自主运行的能力。^⑦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Alexei Leonkov）指出，俄罗斯军方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对外层空间目标识别能力的提升，并着手研发适用于空中

① См. Поросков Н.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нов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23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zvezdaweekly.ru/news/2022921178-RPjfh.html>

② See Chester Wisniewski, “Russia-Ukraine War: Related Cyberattack Developments”, March 21, 2022, <https://news.sophos.com/en-us/2022/03/21/russia-ukraine-war-related-cyberattack-developments/>

③ Kevin Bonsor, “How Space Wars Will Work”, January 1, 2022, <https://jdfor2024.com/wp-content/uploads/2022/01/space-war2.pdf>

④ See Mike Wall, “X-37B: The Air Force’s Mysterious Space Plane”, August 30, 2021, <https://www.space.com/25275-x37b-space-plane.html>

⑤ 参见“NASA 资助研发新型机械人‘火星蜜蜂’可在火星飞行”，2018 年 4 月 11 日，<http://news.cctv.com/2018/04/11/ARTIVsDb7A52La5B5zylXyWk180411.shtml>

⑥ See Tristan Greene, “NASA’s New Galactic Positioning System could Lead to Truly Autonomous Spacecraft”, April 17, 2018, <https://thenextweb.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2018/04/17/nasas-new-galactic-positioning-system-could-lead-to-truly-autonomous-spacecraft/>

⑦ См. Кочетов 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уж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23 мая 2021 г. <https://dzen.ru/media/dbk/iskusstvennyi-intellekt-uje-v-rossiiskoi-armii-60a92f1fb9ff4e00deae8f2f>

和太空侦察的智能化雷达系统。^①

（二）竞争领域体现核常融合趋势

俄美人工智能的军事化竞争并未局限在常规武器领域，而是日益渗透到国家的战略威慑力量之中。事实上，在当前俄美围绕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中存在一个最具争议的安全问题，即人工智能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系统的结合，可能诱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甚至导致冷战期间“恐怖平衡”的重演。

回顾历史，美俄（原苏联）等核大国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核军备竞赛由来已久。冷战期间，美国就已经开始探索用人工智能来增强其核反击能力，并推出了名为“生存适应性计划实验”（SAPE）的研究项目，试图利用当时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美国能够瞄准原苏联的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②与之相对应，当时的苏联军方由于担心美国第一次攻击导致其失去对核武库的主动控制，在冷战期间设计、部署了名为“周界”的自动化核反击武器系统，如果美国用第一次核打击摧毁了苏联的整个军事和政治领导层，人工智能就会独立发挥作用，自主实施对美国的报复性核打击。^③美苏之间的智能化核军备竞赛引发了一系列安全风险。譬如，1983年9月，云顶反射的阳光导致原苏联卫星的错误警报，原苏联部署的“奥克”（ОКО）核预警系统自主检测到“来自美国的核导弹袭击”并发出虚假警报，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核弹危机。^④

近年来，随着俄美两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人工智能与核武器深度融合可能导致的安全问题再次引发各界关注。在核指挥控制层面，美国《2018年核态势评估》（NPR）明确指出，国防部将寻求

^① См. Азанов Р. Железо с мозгами”: какое оружие России умест “думать”. 13 июня 2018 г. <https://tass.ru/armiya-i-opk/5279032>

^② 参见[美]爱德华德·盖伊斯特、[美]安德鲁·J.罗恩：“人工智能会怎样影响核战争风险？”张关林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8期，第16页。

^③ См. Литовкин Д. «Ониск» и «Гранит»: как умные ракеты выбирают себе цель,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массово внедряет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боевые системы. 18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gazeta.ru/army/2021/11/18/14218657.shtml?updated>

^④ 参见[美]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如机器学习之类的设计支持技术，以促进更有效、更快速的战略决策。^①2021 年，美海军中将乔恩·希尔在讨论人工智能在导弹防御测试和作战中的潜力时指出，“美国军方进行导弹试验时会产生大量数据，但因为能够用于分析处理信息的人力不足，并非所有数据都会被充分使用。为此，美军导弹防御局已经开始研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检测评估、跟踪区分目标、指挥控制行动以及与战略对手交战，这些领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得到加强”^②。为提升应对核攻击的目标识别能力与反应效率，美军国防部与北方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多次联合开展全球信息优势实验（GIDE），将全球传感器网络、人工智能系统和云计算程序融入导弹防御体系之中，旨在实现美军在未来潜在的核战争中的“实时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③

这种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战略威慑力量指挥控制体系的做法，虽然能够提升战略防御力量运用的时敏性和效费比，但也可能打破现有的攻防平衡和战略稳定态势，导致战略对手的恐慌情绪并进一步推进智能化核军备竞赛。针对美军导弹防御体系的人工智能化发展动向，俄罗斯军方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人工智能载体强化核弹突防能力，从而抵消美方导弹防御能力因人工智能技术得到的提升。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非常广泛的武器装备领域，包括核武器。因此，应当将核武器系统的智能化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④。为强化战略突防能力，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启动智能导弹的研制与开发。^⑤作为俄军为应对美国智能导弹防御计划而开

① See James Johnson, “Deterre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utonomy: A Paradigm Shift in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0, Vol.36, No.4, pp.422-448.

② Todd Lopez, “Vice Admiral Discusses Potential of AI in Missile Defense Testing, Operations”, Aug. 12,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730215/vice-admiral-discusses-potential-of-ai-in-missile-defense-testing-operations/>

③ See Arsenio Toledo, “US Military Experiment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can Predict the Future”, August 5, 2021, <https://www.militarytech.news/2021-08-05-military-experimen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predict-future.html>

④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внедрить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о все сферы в России. 24 ноября 2022 г. <https://ren.tv/news/v-rossii/1049624-putin-prizval-vnedrit-iskusstvennyi-intellekt-vo-vse-sfery-v-rossii>

⑤ См. Литовкин Д. «Оникс» и «Гранит»: как умные ракеты выбирают себе цель,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массово внедряет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боевые системы. 18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gazeta.ru/army/2021/11/18/14218657.shtml?updated>

发的六种“超级武器”之一，俄罗斯计划在新的潜艇系列中部署 30 艘“波塞冬”无人潜艇，这种被称为“末日武器”的核动力无人潜艇可以深潜至水面以下 1000 米，携带一枚当量高达 100 兆吨的核弹头。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这种水下无人潜艇因其速度和体积而难以被现有防御系统发现和拦截，核弹在水下发射后将对沿海目标造成巨大破坏”^①。此外，俄军还开发和测试了用于预测战略导弹部队导弹系统剩余运行时间的神经网络模型，以帮助其维持战备状态和优化成本。^②

（三）竞争战略呈现差异化特点

谋求全方位的、可持续的军事竞争优势，是美国发展军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特征。一方面，美国军用人工智能发展追求全方位的领先优势。美国 2018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国防部将对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自主武器系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广泛的科研领域进行投资，不仅可以推进相关民用领域的突破，而且有利于获得军事竞争的优势”^③。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加大智能化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在 2020 财年预算中，国防部在无人系统上总共花费 37 亿美元，在人工智能系统上花费 9 亿美元，在高超声速武器上花费 26 亿美元。^④在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下，美军在陆、海、空、天以及网络空间的人工智能应用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据统计，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投入使用的无人机达 7000 多架，超过 12000 个机器人承担了作战、扫雷、防化、清障等各类军事任务。^⑤美军还积极探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作战应用。

另一方面，美国还非常注重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

① Inder Singh Bisht, “Russia to Deploy Submarine Armed with Nuclear Drone in Pacific”, April 7, 2021, <https://www.thedefensepost.com/2021/04/07/russia-submarine-nuclear-drone-pacific/>

② См. Стефанович Д.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и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6 мая 2019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iskusstvennyy-intellekt-i-yadernoe-oruzhie/?sphrase_id=94312192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7.

④ See Michael Klare, “Pentagon Asks More for Autonomous Weapons”, April 2019,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9-04/news/pentagon-asks-more-autonomous-weapons>

⑤ 参见[美]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7页。

势。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海蒂·许指出，“鉴于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发展高超声速、太空、核、网络和自主能力，我们无法承受丧失技术优势的风险。国防部门必须更加重视新兴技术的培育，以防止对手出现出人意料的技术反超”^①。基于此，美国国防部不仅实施了“X-47”无人空天飞机、远程反舰导弹、快速轻量化自主武器以及集群攻击作战武器等装备研发项目，面向未来智能化战争不断提升武器装备自主化程度，还与智库机构合作提出了一系列面向未来的智能化作战构想。2017 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算法战争”概念，认为未来战争胜负取决于运算的速度和情报的准确，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鲍勃·沃克为此领衔组建了“算法战跨职能小组”，旨在用计算机算法高效分析情报并提供作战决策支撑；^②2019 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战略技术办公室主任的蒂莫西·格雷森在国防与商业传感全会上提出了“马赛克战争”（Mosaic Warfare）的概念，并认为智能化战争的制胜关键在于有人和无人系统之间的适应性、协同性和互操作性。^③

较之美国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战略方针，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军情，确立了以战斗机器人系统为重点、以实战为导向的发展策略。由于受到相对有限的军费预算的制约，俄军无法在人工智能的所有应用领域与美军展开全面竞争，而是立足于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现实需求，将战斗机器人系统作为其智能化发展的重点方向。

2017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战斗机器人系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军队的运作方式，使用战斗机器人系统是俄军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主要支点”^④。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由俄罗斯军工复合体 JSC 设计的基于 BMP-3 的 Udar 作战机器人在自主性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开

① David Vergun, “DOD in Search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hat Will Enable the Warfighter”, March 8,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59378/dod-in-search-of-disruptive-technologies-that-will-enable-the-warfighter/>

② See Sydney Freedberg, “‘Algorithmic Warfare’: DSD Work Unleashes AI on Intel Data”, April 28, 2017, <https://www.utahstandardnews.com/algorithmic-warfare-dsd-work-unleashes-ai-intel-data/>

③ See Timothy Grayson, “Mosaic Warfare”, April 23, 2019, <https://spie.org/news/dcs-plenary---mosaic-warfare?SSO=1>

④ Samuel Bendett, “The Rise of Russia’s Hi-Tech Military”, June 26, 2019, https://www.afpc.org/publications/articles/the-rise-of-russias-hi-tech-military#_ftnref1

发的机器人。^①JSC 研制了 Uran-9 多用途战斗机器人，旨在为反恐、侦察和军事单位在城市环境中执行各种任务提供远程侦察和火力支援。此外，俄罗斯一直关注军用纳米机器人的研制与开发，以期可以像蝗虫或病毒一样进攻敌方。^②同时，俄军高度重视在演习和实战环境中检验人工智能武器的作战效能。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鲁斯兰·察利科夫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使用人工智能”^③。在叙利亚战场上，俄军将包括 Uran-6、Uran-9、Marker 装甲战车以及“苏霍伊 S-70”重型无人机在内的战斗机器人系统投入实战，达成测试性能和改进提升的目的。^④在“西部 2021”演习中，Uran-9 首次与地面部队的常规装备一起构建共同战斗编队。^⑤在 2022 年的俄乌冲突中，交战双方都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来自开源、社交网络和来自战场的大量数据，以便更好地组织攻击。^⑥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俄罗斯政府和军方高度重视军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但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表示，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发展要求国家在纳米技术、量子计算、大数据和云存储方面拥有广泛的能力和技术储备，然而，当前俄罗斯尚未创建完善的技术生态，因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的尝试将面临战略规模不完善的风险。^⑦

二、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挑战

阿弗里恩·阿比德指出，“人工智能的进步可以显著改变战略格局。人

① См. Федоров 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догоняя уходящий поезд. 16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topwar.ru/179975-iskusstvennyj-intellekt-v-rossijskoj-armii-dogonjaja-uhodjaschij-poezd.html>

② См. Николайчук А. Может л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разум стать причин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4 августа 2019 г. <https://mcs.mail.ru/blog/mozhet-li-iskusstvennyj-razum-stat-prichinoj-mirovoj-vojny>

③ Там же.

④ See Rod Thornton, Marina Miron, “Towar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The Russian Military’s Use of AI-Enabled Cyber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2020, Vol.165, No.3, p.3.

⑤ См. Кирилл Р.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22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topwar.ru/189298-iskusstvennyj-intellekt-v-rossijskoj-armii.html>

⑥ См. Поросков Н.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нов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23 сентября 2022 г. <https://zvezdaweekly.ru/news/2022921178-RPjz.html>

⑦ См. Федоров 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догоняя уходящий поезд. 16 февраля 2021 г.

工智能的现代化，可能潜在地塑造未来的全球核秩序”^①。人工智能技术虽然不能独立地形成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却可以集成到情报侦察、数据分析、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以及战场防御等不同领域，它的应用效果取决于对多个集成领域影响的综合叠加，因而能够对全球战略稳定性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前，由于俄美两国围绕人工智能的军事竞争已经从常规领域渗透到核领域，因此，双方人工智能的军事化进程可以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两个方面双向赋能，对两国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复合化和多层次的冲击。

（一）对首攻稳定性的挑战

首攻稳定性又称先发制人稳定性和第一次打击稳定性。詹姆斯·约翰逊指出，“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存在于以下情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突然（或先发制人）攻击对手，而不必担心来自幸存的第二次打击部队的毁灭性报复。也就是说，缺乏在危机中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动力或压力”^②。谢林的观点是，“一个反突袭的策划，不仅要让突袭变得更困难，而且应该削减或消除首先攻击的优势。必须假定，如果首先攻击的优势能够被消除或者严重削弱，就可以从根本上弱化攻击的动机”^③。在以核力量为基石的传统战略稳定体系中，有核国家通过“相互确保生存”的核战略博弈，彼此维系强有力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从而遏制核突袭的爆发。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发展，打破了俄美等核大国之间原有的攻防平衡和战略稳定格局，进而加剧了核战争发生的风险。

首先，人工智能作为进攻手段，威胁俄美建立在二次打击能力基础之上的“报复性力量”，削弱“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稳定模式，强化双方进行先发打击的意愿和动机。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报复性力量”是支撑第一次打击稳定性的重要基石。爱德华·鲁特瓦克认为，“一旦对方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变成现实可能，制定战争计划的人在谋划裂变炸弹的使用时就不

^① Amber Afreen Abid,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Strategic Stability in South Asia”, June 17, 2021, <http://southasiajournal.net/the-impac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strategic-stability-in-south-asia/>

^② James Johnson, “Deterre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utonomy: A Paradigm Shift in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0, Vol.36, No.4, p.428.

^③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245-246页。

得不更加慎重”^①。相反，如果“报复性力量”缺失，将会使先发制人的核突袭受到激励。正如谢林所指出的，“突袭之所以特别重要，乃在于报复力量可能的致命脆弱性”^②。“我们忧心的是，一次突袭能否给我们带来彻底摧毁对方报复性力量的前景，由此使得该突袭本身不会因报复的威胁而被遏制住”^③。当前，人工智能与情报侦察系统的结合，增加了以机动导弹部队及核潜艇为代表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脆弱性，这使得谢林的忧虑正日益变为现实。一方面，俄罗斯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从而使它们难以被战略对手成功地锁定和清除。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美国正在研发和部署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相互融合的卫星星座监控体系，通过类似Space-X“星链”模式发射和大量卫星部署，实现对俄罗斯广阔陆地区域内移动核打击力量的连续的、实时的监控。^④另一方面，2016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美国海军研发了无人驾驶水下潜航器“海洋猎手”，用于探测隐匿于海洋深处的弹道导弹核潜艇。^⑤此外，在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攻击的背景下，斯坦尼斯拉夫·阿巴莫夫等人指出，“敌对国家对于弹道导弹潜艇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和可能性不断增强，同样可能会对维持第二次打击能力的信心产生严重影响，从而破坏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⑥。总体而言，由于深度学习、图像识别和大数据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显著提升了对二次打击力量的侦察、锁定和摧毁能力，削弱了战略对手的战略威慑力量，强化了核大国的先发制人优势并激励了其发动先行袭击的动机。

其次，人工智能作为防御手段，能够提高防御体系的拦截效率，降低因对手报复性打击带来的损失，同样会激励拥有人工智能防御系统的一方实施

① [美]爱德华·鲁特瓦克著：《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74页。

②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247页。

③ 同上，第246页。

④ See Christopher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Vol.149, No.2, p.160.

⑤ Srijanee Chakraborty, “DARPA Christens US Navy’s First ACTUV as Sea Hunter”, April 10, 2016, <https://www.naval-technology.com/uncategorised/newsdarpa-christens-us-navys-firs-t-actuv-as-sea-hunter-4860036/>

⑥ Stanislav Abaimov and Paul Ingram, “Hacking UK Trident: A Growing Threat”, June, 2017, https://basicint.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HACKING_UK_TRIDENT.pdf

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一国能够采取可信的防御措施来削弱战略对手的进攻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战略稳定性的提升。譬如，冷战时期，研发和部署大规模导弹防御系统被美苏双方认为会破坏核遏制的可预见性和首攻稳定性。B·M·库拉金指出，“借助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对方大部分进攻性弹道导弹的可能性，为在互相实施导弹打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开辟了理论上的前景。其中的一方在实施第一次‘反力量’打击的情况下，可以期望借助己方导弹防御系统对敌方实施已经被削弱的回应性‘反价值’报复打击进行拦截，这样就出现了可能促使拥有完善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方实施先发打击的因素”^①。这一冷战时期的攻防逻辑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威慑博弈。詹姆斯指出，“一个国家认为其二次打击能力越不安全，就越有可能支持在核武器综合体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增强其战略部队的生存能力”^②。美军正在进行的智能化导弹防御实验（GIDE），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强大算力，显著改善现有防御系统的目标识别、信号处理和毁伤评估能力，并极大地缩短决策时间。美军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将军认为，“提前识别威胁的信息能力创造了决策空间。作为一名作战指挥官，拥有决策空间可以让部队建立威慑选项，以提供给国防部长甚至总统”^③。一旦导弹防御系统的“脆弱性之窗”迅速缩小，产生消解潜在导弹袭击威胁的前景，就可以进一步增强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做出先发打击决策的信心，并使其战略对手面临升级进攻性手段的巨大压力。

（二）对危机稳定性的挑战

危机稳定性通常用于衡量危机状态下（可能包括常规战争或即将发生的核战争）国家间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升级概率越大，危机稳定性越低，反之，则危机稳定性越高。丘巴认为，危机稳定性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危机人为升级的稳定性，即各国不选择故意升级为核战争，因为每个

^① [俄]B·M·库拉金：《国际安全》，钮菊生、雷晓菊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② James Johnson, “Deterre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utonomy: A Paradigm Shift in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0, Vol.36, No.4, p.430.

^③ Arsenio Toledo, “US Military Experiment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can Predict the Future”, August 5, 2021, <https://www.militarytech.news/2021-08-05-military-experimen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predict-future.html>

国家都承认，任何此类打击都将导致毁灭性的核报复；二是对危机意外升级的稳定性，即当前的局势足以防止无意或错误的升级，具体包括基于错误情报或误解带来的升级以及由于指挥和控制故障而导致的升级。^①人工智能对于俄美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的渗透，既可能增加危机意外升级的风险，也可能加剧危机人为升级的风险，同时，由于人工智能赋予核武器系统的不断加大的自主性，可能造成升级进程难以终止，进而导致核战争陷入无限升级的危险情况。

首先，人工智能加剧了军事系统的脆弱性，进而导致危机意外爆发的风险日益增长。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提出“意外战争”的概念，认为“全面战争可能通过某种事故、错误的警报或机械性故障被非故意地引发”^②。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基于历史事实指出，“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在预警系统方面的经验表明，由于人为和技术错误，会出现虚假警报和意外情况，特别有可能是在预警系统的早期操作和部署中。这些错误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在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多次发生核危机的风险”^③。当前，俄美两国人工智能技术与军事系统的融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以及后勤保障的速度和效率，但也导致了军事系统的自主性和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了危机意外爆发的风险。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分析得出的错误信息可能导致危机的升级。正如保罗·沙瑞尔所指出的，基于机器学习的视觉目标识别并不遵循传统的编程规则，而是通过模糊的神经网络算法模型直接从数据中进行学习，这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黑箱”，在应对“欺骗图像”面前表现出脆弱性，进而可能出现对潜在攻击目标的错报或漏报。^④另一方面，一旦对手掌握了己方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漏洞，将加剧战略突袭的风险。譬如，针对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的攻击，会加剧国家

^① Christopher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Vol.149, No.2, p.151.

^②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198页。

^③ Gregory Kulacki, “China’s Military Calls for Putting Its Nuclear Forces on Alert”, January 2016, <http://www.ucsusa.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2016/02/China-Hair-Trigger-full-report.pdf>

^④ 参见[美]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197页。

战略威慑体系的脆弱性甚至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罗德·桑顿和玛丽娜·米隆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寻找对手网络系统中的漏洞变得更加容易。如果俄罗斯掌握了敌对国家所有主要的核指挥控制系统的漏洞，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都有可能在几秒钟内结束。^①詹姆斯进一步指出，“尽管敏感程度不尽相同，美国和俄罗斯有一个共同担忧，即人工智能增强的网络战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可能会促使各国在危机期间采用或更多地依赖先发制人的政策”^②。一旦俄美任意一方从对方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中挖掘出致命的脆弱性信息，存在使用攻击性网络武器瘫痪敌核武器系统的潜在风险，就可能导致对方倾向于以更为冒险和升级的应对方式，这将加剧未来核危机中的不信任和紧张局势。

其次，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快了战争节奏，加剧了危机人为升级的风险。对于速度与危机升级的关系，谢林指出，“当速度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时，一场意外事故或者一个错误警报的受害者，会面临强大压力继续进行战争”。在谢林看来，片面追求速度的仓促行动，“无疑既是军事行动最大的危害，又是和平迅速演变为全面战争的最重要原因”。^③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极大地压缩了防御方对于军事行动的反应时间，使得作战指挥员和决策者面临严峻的“时间压力”，从而增大了“仓促行动”的风险和危机人为升级的潜在可能性。丘巴指出，俄罗斯使用高超声速武器以及“海洋多用途系统状态-6”无人潜航器等隐形核运载工具，可能会极大地压缩美军指挥控制系统的预警和反应时间，进而威胁到美军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因此，美军可能不得不开发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核指挥控制系统，提升预先确定核威胁的响应、检测、决策以及指导战略力量的速度。^④杰弗里·莱维斯进一步指出，

① See Rod Thornton, Marina Miron, “Towar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The Russian Military’s Use of AI-Enabled Cyber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2020, Vol.165, No.3, pp.6-7.

② James Johnson, “Deterre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utonomy: a paradigm shift in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20, Vol.36, No.4, p.431.

③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197页。

④ See Christopher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Vol.149, No.2, p.158.

“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NORAD）只有大约两分钟时间来评估来自卫星和地面雷达的预警信号，该司令部必须迅速确认攻击来源并做出反应”^①。在相互竞争的作战环境下，用于数据收集、评估和决策的时间被极大地压缩，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运算能力以及机器学习技术，固然可使防御系统的作战响应变得更迅捷，但也可能导致其更具脆弱性。在有限的时间内，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一方面，政治领导人难以严格遵循基于理性的威慑逻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倾向于追求更快的操作速度和先发制人的时间优势，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从而增加了危机不断升级的潜在可能。

再次，人工智能使得危机终止的机制失去效力。冷战期间，为遏制危机的持续升级并可能造成大规模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当时的美国、苏联等核大国之间构建了致力于限制和终止危机升级的一系列措施。谢林指出，“这些限制性措施包括：延缓机制、安全装置、复核及商议程序、预警和沟通失败的谨慎应对规则，以及其他所有为规避未经授权而开火或避免对预料之外的事件作出仓促反应而设置的机构或机制”^②。在上述措施和机制中，有关人员应当扮演类似“终结者”的角色，如果危机的升级存在失控的风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充裕的时间启动终止措施，避免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然而，伴随人工智能系统的运算能力及其与机器学习的深度融合，作战响应变得更迅捷、更精确和更具破坏性，人脑的反应速度越来越难以适应作战系统的运行速度，缺乏充裕的时间来识别、纠正系统错误，可能导致错误在高速运行的系统中快速迭代，并且在引发灾难性后果之前难以终止。2003年3月，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在自主操作状态下错误击落了友军的“龙卷风”战斗机，造成多名飞行员死亡。^③2007年10月，美军参与南非军演的防空火炮系统发生集体失控险情，操控人员多次尝试关闭火炮自动发射装置均告失败，防空火炮默认执行计算机系统下达的自动发射指令，事

^① Jeffrey Lewis, “Is Launch Under Attack Feasible?” August 24, 2017,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is-launch-under-attack-feasible/>

^② [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0-201页。

^③ 参见[美]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151-154页。

故造成多名美军官兵伤亡。^①正如沙瑞尔所指出的，美军操作高度自动化的复杂致命系统是存在风险的。^②一旦此类自动化风险扩散到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核打击系统，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入恐怖的“终结时代”。

（三）对军备竞赛稳定性的挑战

军备竞赛稳定性主要用于评估某种军备发展行为引发竞争对手相应的军备行为，并最终导致军备竞赛的潜在可能性。在军备竞赛稳定性低的环境下，己方的军备发展行为很容易引发对方跟随性地扩充军备，反之，在军备竞赛稳定性高的环境下，任意一方发展军备不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发生。^③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发展，在巨大军事价值和应用前景的驱动下，俄美两国不约而同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军备发展进程，双方在人工智能军备发展意图上的模糊性和军备能力上的不透明性，降低了维系军备竞赛稳定性的信任度和安全感，导致军备竞赛的不断深化。

首先，军备意图的模糊性引发了俄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军备竞争中的恐慌情绪。军备发展意图的模糊性是制约军备竞赛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正如谢林所指出的，“美苏任何一方的军备发展计划都必然是会含糊地——如果不是明确地——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另一方的发展计划，这种影响肯定是复杂的和不对称的、间接的和间或非理性的，并无疑常常建立在对对方计划的不准确的臆测的基础上”^④。冷战时期，美苏等核大国的战争武器发展意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不确定性，但就技术特征而言，传统战略武器系统往往具备较为明确的攻防属性。譬如，弹道导弹等军备系统具有鲜明的进攻属性，导弹防御系统等军备系统则具有鲜明的防御属性。因此，可以依据具体战略武器所体现的不同攻防属性，判断战略对手的军备发展意图，避免盲目的军备升级和超饱和的军备竞赛。较之核武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往往是渗入原有的武器系统，而非生成独立的武器系统，因而在攻防属性方面体现出一

① 参见宋广收：“如何确保自主武器安全可控”，《解放军报》，2020年8月18日第7版。

② 参见[美]保罗·沙瑞尔：《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朱启超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58页。

③ 参见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④ [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6页。

定的特殊性。譬如，人工智能与网络武器系统的结合，既可以强化原有武器系统的网络渗透和数据窃取、损毁能力，破坏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也可以基于防御目的，作为应对他国网络攻击的早期预警或监视手段，从而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由于人工智能军备意图的不明确性，近年来，俄罗斯军方对于美军大力发展智能化网络武器的军备动向高度关注。桑顿等人指出，“在俄罗斯的心目中，让美国占据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发展的‘领先地位’对俄方极为不利。如果人工智能被用作信息战、网络战和心理战武器，其关键技术被美国所垄断，那么，这种落后于潜在对手的技术滞后将会增加脆弱性，且很难用常规武器优势来掩盖”^①。由此可见，由于军备发展意图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俄美两国从维护本方安全权益的目的出发，在害怕对方领先的心态下，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持续展开并加速升级。

其次，军备能力的不透明性，导致俄美两国难以围绕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构建互信机制。除却军备意图的不确定性，军备能力的不透明性也是制约俄美两国军备竞赛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正如丘巴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现在如此之快，以至于已经超过了构建可能的军控机制的速度，甚至会超过人类文明阻止人工智能接管的能力”^②。当前，人工智能及其军事应用正处于日新月异发展的阶段，俄美等军事强国的人工智能军备能力及其应用成果也在不断高速发展。区别于核武器等传统武器，决定人工智能军备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软件而非硬件。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军事应用的领域过于宽泛，加上军事部门严格的保密性，导致对于各国人工智能军备能力的精准评估和监测面临重重困境。譬如，俄美双方均未向外界明确是否具有发展完全自主武器系统的能力，而这也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中最具争议的领域。安娜·纳迪贝兹指出，俄罗斯官方话语在对自主武器系统的信任以及它们是否应该完全自主地运作方面存在矛盾和歧义。一方面，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一些人似乎不信任人工智能的自主能力，并将这一点反映在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官方立场上。俄罗斯在联合国公开强调维持人类对机器的控制的必要性。在官方意

^① Rod Thornton, Marina Miron, “Towar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The Russian Military’s Use of AI-Enabled Cyber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2020, Vol.165, No.3, p.7.

^② Christopher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Vol.149, No.2, pp.159-160.

义上，俄罗斯并不主张用全自动武器来取代人类对武器的控制。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高层反对全面禁止“杀手机器人”，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人工智能之旅”会议上告诉与会者：“未来十年的任务是确保大规模引入人工智能。”^①与俄罗斯类似，美国同样对于是否发展完全自主武器系统留有余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前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指出，“伴随人工智能军备竞争的深入发展，一旦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倾向于将自主权赋予机器系统，那么，美国为保证自身安全利益，也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对等的发展策略”^②。由于俄美双方围绕自主武器系统等装备的研发、部署构建了自相矛盾的叙事体系，从而降低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使得一方或双方可能过高估计对方的军备发展能力，更倾向于以升级军备能力的方式来应对对方的军备发展行为。

再次，对军备风险认知的片面性进一步助长了俄美两国扩充人工智能军备的决心。对于美国和俄罗斯而言，提升军备竞赛的稳定性还取决于双方对两个方面因素的综合认知和整体考量。第一个因素是对军事应用前景和价值的认知，第二个因素则是对军事应用风险及其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的认知。如果对军事价值的认可度高而对风险的认可度低，那么，军备竞赛稳定性就会降低，反之，则军备竞赛稳定性高。一方面，就军事价值认知而言，情况正如丘巴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快速发展的、主要由商业驱动来实现的技术，对整个社会和军事行动将产生越来越大的价值，所有主要的军事强国都热衷于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进程”^③。另一方面，就风险认知而言，当前，大约有 30 个国家和 165 个非政府组织高度关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风险挑战，包括操作风险、使用责任以及对战争法相称性原则和区分原则的冲击，并呼吁颁布预防性的禁止法令。^④然而，俄美等国作为军用人工智能技

① Pavel Bednyakov, “Russia’s President Calls for Broader Implem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4 November, 2022,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is-launch-under-attack-feasible/>

② James John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one Swarming and Escalation Risks in Future Warfare”, *The RUSI Journal*, 2020, Vol.165, No.2, p.29.

③ Christopher F. Chyba, “New Technologies & Strategic Stability”, *Daedalus*, 2020, Vol.149, No.2, pp.159-160.

④ See Kelley M. Saylor, “Defense Primer: U.S. Policy on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November 14,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150>

术先发国家，从维护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并未充分正视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存在的潜在风险，而是将所有风险视为可控和可规避的。譬如，美国政府在2018年3月向联合国提交了《致命自主武器领域新兴技术的人道主义优势》白皮书，指出“自动目标识别、跟踪、选择和交战功能可以使武器更准确地打击军事目标，并减少附带损害或平民伤亡的风险”^①。在美国政府看来，可以通过计算机编程的方式给人工智能武器制定道德准则，从而规避潜在的应用风险。概而言之，在价值认同度高而风险认同度低的情况下，俄美实现对人工智能武器军备控制的难度较大。

三、管控军用人工智能战略稳定风险的路径分析

俄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带有鲜明的冷战思维和典型的零和博弈色彩，不仅给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蒙上了阴影，也对全球和地区和平构成了新的威胁。俄美军用人工智能竞争的不断升级，给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了广泛挑战，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深切忧虑，甚至出现了“新恐怖平衡”、“智能化核战争”等恐慌性言论。探寻行之有效的安全治理路径，防范两国重演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的历史，实现对人工智能军备竞争的良好管控已然迫在眉睫。

（一）密切交流合作

第一，开展官方安全对话。各国政府之间开展官方对话，围绕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和战略协议，这是体现战略互信的重要方式。在多极化格局下，俄美等国开展人工智能军备竞争的出发点应当主要是自身的安全需求，而非战胜或彻底摧毁对方。然而，由于在战略层面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加上人工智能军备发展独有的不透明性，造成并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和恐慌情绪。在害怕落后于对手的心态的驱使下，俄美双方长期陷于冷战思维难以自拔，围绕军用人工智能开启了非理性的军备扩张道路。为避免新一轮军备竞赛持续深化和冷战悲剧的重演，人工智能军事强国

^① Kelley M. Saylor, “Defense Primer: U.S. Policy on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November 14,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150>

之间应当摆脱冷战思维的桎梏，充分利用联合国安全峰会、G20 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北约理事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欧盟峰会等全球性、区域性官方对话机制，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治理密切交流合作，积极寻求战略共识，有效管控分歧和危机，理性权衡利益得失，搭建战略互信机制，为最终形成全球性人工智能军备控制协议奠定基础。

第二，密切 1.5 轨和 2 轨交流。在军备控制的历史上，以半官方或非官方对话方式来实现军控合作是一种有过成功范例、具有广阔前景的路径。通过形式多样的对话交流方式，官方和民间人士就军备控制可能的实现路径进行广泛磋商，交换经验和专业知识，避免军备竞赛的加剧和紧张局势的恶化。阿曼迪普·吉尔指出，“人工智能军控需要在 1.5 轨对话（涉及政府和非政府方）或 2 轨对话（仅涉及非政府方）中实现新的结构性创新。第一个目标应该是通过在国家层面深入讨论人工智能开发、测试、验证、部署和使用的方法，来增强相互理解。另一个目标应该是允许分享一些最佳实践或警示经验。第三个潜在目标是将思维从零和竞争转向协作解决问题”^①。在充分开展多种形式战略对话的基础上，参与者之间可以深入探讨军备核查的验证措施和可行的技术实现方式，并就防范危机升级和发生国家间重大冲突等问题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建议，避免将常规的军备力量发展和军事技术竞争催化为旷日持久的、超饱和的全球性军备竞赛。

第三，形成安全利益共同体。较之核军控，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控进程面临两方面因素的掣肘。一是传播扩散范围更广。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军民一体化特性，全球范围内掌握军用人工智能技术或拥有人工智能武器的国家为数众多。2018 年，参与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领域政府专家组军控谈判的国家数量就达到 125 个。^②二是涉及技术装备种类更多。人工智能武器不同于核武器，它并非单一的武器装备，而是广泛渗透在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的庞大武器谱系之中。不同技术、不同装备应用于作战的危害性后果各不相同，难以针对其部署和使用划出简明单一的红线。有鉴于此，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控制应当按照以重点突破带动整

^① Amandeep Singh G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ong View”,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Vol.33, No.2, pp.175-176.

^② See *ibid.*, p.176.

体推进的原则，优先在少数技术先发国家之间围绕争议较少的议题构建双边或多边互信机制，准确厘清各方核心利益关切，界定开展军备竞争的边界和底线，全面梳理军备发展中与“核禁忌”同等强度或更为强烈的“人工智能禁忌”，^①力争在禁止部署和使用完全自主武器系统、遏制人工智能武器向恐怖组织的扩散、防范核打击力量智能化发展带来的战略风险以及规避太空和网络等新域作战空间爆发智能化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等方面达成战略互信，在军事强国间形成约束和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安全利益共同体。

（二）构建管控机制

第一，军备控制机制。人工智能广泛渗透于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体系之中，并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有鉴于此，应当立足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设计面向未来的军备控制机制。总体而言，传统的军备控制机制是对称的，即以核武器为中心，围绕美、苏（俄罗斯）两个核大国展开的二元化机制，通过对等增加或削减核武器来维持军备竞赛的稳定性。正如罗兰·丹罗伊特所指出的，“即在两个强国之间引入平等感和实力相当感，使双方保证自己将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来自对方的挑衅”^②，进而建立双方相互遏制的稳定系统。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发展打破了这种对称的军备控制机制。菲克斯指出，“21 世纪的战略稳定必须包括中国等新的行动者。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库和战略性常规武器之间的不对称，对未来军控协议的概念化提出了挑战。为了顾及所有国家的安全需要并反映这些不对称性，需要新的、创新的军备控制模式”^③。由此可见，传统模式下僵化的对称性军备控制框架，并不适合约束当前的军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格局，要真正实现人工智能的军备控制，就必须构建一个非对称的、更为包容的军控机制。一方面，新机制要能够承载更多的参与主体，而且需要涵盖核武器、战略性常规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网络、太空等领域的新兴技术和武器装备。另一方面，新机制要能够讨论更为宽泛的军控议题，诸如战略性常规武器与

^① See Amandeep Singh G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ong View”,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Vol.33, No.2, pp.175-176.

^② [英]罗兰·丹罗伊特：《国际安全的当代议程》，陈波、池志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229 页。

^③ Liana Fix and Ulrich Kühn,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20, No.260, p.10.

核武器的关系、无人机以及高超声速武器等新型核武器运载平台的控制、人工智能对于战略进攻/防御体系的影响等。

第二，危机管理机制。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不仅会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还会在自然和虚拟空间放大现有安全威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加剧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的负面影响。实现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安全治理，不仅需要构建预防性的军备控制机制，还需要为应对突发情况而未雨绸缪，从危机管控方面进行实践探索。为维护首攻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各军事强国之间应针对人工智能军事化构筑强有力的危机管理机制。一是危机预警机制，即探索建立人机结合的危机信号检查方式，避免人工智能误判、漏判以及系统故障等意外因素的发生，防范因人工智能指挥控制失误引发包括核危机在内的各类危机事件。二是危机处理机制，即在危机爆发以后，国家之间如何快速构建危机处理的交流沟通渠道，高效地形成危机解决方案，阻止人工智能驱动下武装冲突的持续升级，避免传统领域危机迅速转化为核危机。三是常态化的危机预防机制，即在军事强国之间就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进展和武器试验建立相互通报机制，分享安全管理领域的经验教训，防范因过快、过度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导致的安全风险和潜在危机，将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此外，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向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广泛渗透，人工智能领域危机管控还必须与网络危机管控、太空危机管控以及核危机管控之间形成跨域联动，构建多维一体的危机管理体系。

第三，伦理道德约束机制。鉴于当前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技术标准和体系架构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因此，就管控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达成具有强制力的硬法协议为时尚早。但是，国家之间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规范人工智能的军事化进程。譬如，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指导原则，同样有利于增进国家间的战略互信。根据这一逻辑，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研发、部署和使用军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道德规范。例如，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发布的《人工智能准则：推动国防部以符合伦理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的建议》就提出了“负责任、可追溯、公正、可靠、可管控”

的人工智能准则。^①欧盟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也提出了“仁慈、善意、正义、人类自主和可解释性”五项原则。^②上述规范的提出，对于促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约束力的加强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国家层面的规范，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哪个国家提出的伦理规范，都不可避免地附有厚重的技术民族主义烙印，以及服务于本国争夺人工智能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目的。有鉴于此，必须在联合国框架下，依托日内瓦《特定常规武器条约》专家组会议所构建的军控平台，提出反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共同安全利益的伦理道德准则，并促成道德层面软性约束机制的建立。

（三）倡导全球治理

第一，构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首先，要突破由少数军事强国主导人工智能安全议程的现行治理框架，使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安全治理超越国家大小、政府权威、经济科技实力、军事发展水平高低的限制，从而能够制定出真正反映全球共同安全利益的治理规范、原则、政策和标准。考虑到不同国家对于军用人工智能的功能作用、应用价值以及安全风险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一定的分歧，因此，只有依靠联合国这一全球范围内的权威性安全机制，在联合国框架下稳步推进国家间安全合作和治理实践。其次，与核科学技术相比，人工智能和网络空间领域的尖端人力资源和前沿技术创新更多地源自于以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营部门，而这些私营部门通常被排除在关于全球安全、军备控制等方面的对话磋商机制之外。有鉴于此，要实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与其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的同步增长，就必须将跨国公司、科技智库、国际公益组织等非政府行为体纳入治理主体范畴。再次，要超越主要依靠政治家、军事家制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议程的能力素质限制。吉尔指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必须伴随着跨领域素养的加强。人工智能不能仅是编码人员和认知科学家的工作，其安全影响也不能仅是外交官、将军和律师的领域。鉴于人工智能业务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人工智能业务必须是每个人的业务。人工智能的治理只能基于对技术的力量和局限性

^① See Defense Innovation Board, “AI principle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Ethica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3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Oct/31/2002204458/-1/-1/0/DIB_AI_PRINCIPLES_PRIMARY_DOCUMENT.PDF

^② Se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raft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December 18, 2018,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draft-ethics-guidelines-trustworthy-ai>

的正确理解,而且这种治理只有成为包括政府间、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参与者在内的分层方法的一部分,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①。鉴于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安全治理涉及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科技研发、安全管理、伦理道德以及法律制度等不同领域,只有汇聚跨学科的人力资源共同参与其中,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安全治理方案。

第二,形成“共有认知社区”。建构主义认为,观念、身份和规范在国际安全的动态重构中扮演更为核心的构成性角色。^②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进程不仅是由利益和权力驱动的,还是由共同的理解和认知推进的。回顾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由美国战略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共有认知社区意识到,在相互核打击的恐惧心理支配下的美国核军备发展具有脆弱性。如果超级大国合作通过军备控制来稳定核平衡,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避免核战争的机会将会增强。伴随这些知识精英进入国家决策层和咨询机构,他们的思想在美苏两国广泛传播,并转变成了广泛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实践,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苏核军控合作的基础。^③共同认知社区在核军备控制中的应用,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同样具有启示意义。马蒂斯·马斯指出,“团结那些具有共同安全认知的利益相关者并建立一个社区,可以有效地改变军事人工智能政策”^④。就当前的人工智能领域知识精英阶层而言,已经基本具备了形成“共有认知社区”的条件。第一,在顶尖科技专家层面,包括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斯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人工智能企业DeepMind的三位联合创始人在内的全球精英科技专家,纷纷就防范人工智能的军事化风险积极建言,从而对“共有认知社区”的建立产生了关键的引领作用。第二,人工智能科学家群体已经就限制或禁止智能化武

① Amandeep Singh G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ong View”,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Vol.33, No.2, p.175.

② 参见[英]罗兰·丹罗伊特:《国际安全的当代议程》,陈波、池志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5页。

③ See Emanuel Adler,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National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Vol.46, No.1, p.101.

④ Matthijs Maas, “How Viable is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for Milit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ee Lessons from Nuclear Weapo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9, Vol.40, No.3, p.15.

器的研发、部署和使用达成了业内共识。2018年召开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共有2000多名人工智能专家和学者签署了《致命性自主武器宣言》,以集体形式表达了业界对于禁止研发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明确立场,为发展“共有认知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就发展态势而言,围绕军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共有认知已经从科学精英群体向广大知识分子群体拓展,形成了“禁止杀手机器人运动”、“国际机器人武器控制委员会”、“未来生活研究会”、“忧思科学家联盟”等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进一步扩大了“共有认知社区”的现实影响力。

第三,探索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要实现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全球治理,不能仅靠联合国和主权国家开展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还需要积极探索依靠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实施自下而上的安全治理。一方面,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可以发挥专业优势,为人工智能军备控制和其他治理实践提供全球性的统一技术标准。吉尔指出,“工程标准和代码作为人工智能软治理的一种渠道,需要一个用于评估风险和使设计与安全、可靠性考虑保持一致的通用词汇目录。人工智能专家可以构建共享的、多学科和不断发展的术语资源”^①。同时,具有战略素养的科技专家还可以用专业眼光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进展。爱德华·穆勒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学界可以联合起来,开展国际性监测工作,以推动实现军备控制,遏止具有风险的人工智能武器研发行为”^②。通过全球范围的技术监测,科技专家可以评估特定人工智能军事项目发展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伦理、道德、法律挑战,就如何应对风险向相关国家提供咨询建议。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伦理法律专家以及公益组织的社会动员力和舆论影响力,对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为代表的高风险人工智能武器实施群众性禁止运动。当今世界,美国无人机在全球反恐行动中造成的平民和儿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以自主武器系统实施的暗杀活动也层出不穷,拥有自主开火权的“杀手机器人”也从影视作品走向现实战场,全球民众对于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警惕意识和恐惧心理与日俱增,一场跨国性质

^① Amandeep Singh G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ong View”,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Vol.33, No.2, pp.176-177.

^② Edward Moore, “It’s Already too Late to Stop the AI Arms Race – We Must Manage It Instead”,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6, Vol.72, No.5, p.319.

的群众性抵制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德尼斯·加西亚指出，“‘禁止杀手机器人运动’正在引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前所未有的积极响应，跨国群众性运动在外交和全球行动的多个层面唤起了民众的安全意识”^①。为将此类跨国群众性运动发展成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应当借鉴 20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抵制核武器运动”和 20 世纪 90 年代“禁止使用地雷运动”的成功经验，多方合力，对发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行为加以规制，避免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的失控。

四、结论

俄美两国围绕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发端于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加速发展的时代，伴随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无人化、智能化武器装备在俄乌冲突中的大规模运用，不仅展现了军用人工智能的广阔应用前景，同时也给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潜在风险和现实挑战，针对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安全治理迫在眉睫。

就竞争态势而言，俄美两国政府、军方均不遗余力地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发展。双方从确保本国“绝对安全”、遏制对手战略竞争的“零和博弈”心态出发，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展开日趋激烈的军备竞赛，其竞争领域日益突破常规空间，逐渐渗透到国家战略空间和战略威慑力量之中，体现出核常融合的一体化竞争态势。一方面，美国凭借雄厚的人力资源、经济实力和技术储备优势，追求全方位和可持续的军事竞争优势，着眼制胜未来构建人工智能装备体系和作战构想。另一方面，俄罗斯受制于国力、财力限制，结合国情、军情和现实安全需要，明确了以军用战斗机器人系统为重点方向的军事智能化发展路径，以点带面地推进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发展。

就安全影响而言，俄美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展开的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了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具体而言，在首攻稳定性方面，人工智能作为情报侦

^① Denise Garcia, “Leth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hang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8, Vol.20, No.2, p.336.

察和火力打击手段的应用，削弱了俄美两国遏制核突袭的“二次打击能力”，增加了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苏冷战期间形成的“相互确保生存”的战略稳定模式。在危机稳定性方面，随着俄美战略打击力量及其指挥控制系统的智能化发展，核武器系统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加剧，核战争意外爆发和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增大，甚至出现了打开核危机不断升级、无法终止的“潘多拉魔盒”的危险。在军备竞赛稳定性方面，俄美双方对于发展军用人工智能意图的不确定性，加上人工智能军备能力的攻防两用性，进一步降低了双方对于实施军备控制的信任度，导致彼此陷入“安全困境”而难以自拔。

就应对策略而言，在安全困境心态支配下，俄美两国展开了日趋激烈的人工智能军事化竞争，对于两国的战略利益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亟待推进安全治理。在交流合作层面，应当强化两国政府、军方和民间的安全对话机制，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从两国共同的安全关切出发，在大国之间率先构建人工智能安全利益共同体。在管理体制层面，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为抓手，持续推进包括致命性自主武器在内的人工智能军备控制议程，构建战略威慑力量智能化发展的危机管理机制，同时坚持软硬兼施的治理原则，建立贯穿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全生命周期的伦理道德约束机制。此外，考虑到当前依托联合国、主权国家自上而下推进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所面临诸多掣肘，应当积极探索自下而上的治理方法和手段创新，充分发挥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民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对军用人工智能进行安全治理的“共有认知社区”。

【Abstract】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milit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In terms of competition spac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land, sea, air, space, and network. As to competition fields, it shows the trend of penetration and integration from the conventional field to the nuclear field. As for competition strategy, it sh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ith the former pursuing overall leadership while the latter seeking key

breakthroughs and point-to-area strategy. The impact of the militar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first attac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akens the “retaliatory power” of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second-strike capability, shakes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model of “mutually ensured survival”, thereby incentivizing the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pre-emptive strikes. Second, in terms of crisis st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Russian-U.S.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accidental and artificial escalation of the crisis,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 escalation. Third, a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arms race, the opacity of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maments and capabilities has reduced the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led to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arms race. To realize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of the militar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nsify the dialogue and exchanges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ilitary powers, enhanc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security interests.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governance system covering arms control mechanisms, 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ethical, moral restraint mechanisms. Besid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uild a security governance network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gathering multiple governance forces such as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exper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process.

【Key Words】 Milit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Russia-U.S. Arms Race, Strategic Stability, Security Governance

【Аннотац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РФ и США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остроту.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многоме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ей суши, моря, воздуха, неба и сети; в област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п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енденция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з обычной области в ядерную область; в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ся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стремлением США к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у лидерству и ключевыми прорывами и точечными стратегиями России. Влияние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на глобальну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конкретно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трех аспектах: дл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первой атак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ослабит “ответную мощь”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второго удара, и пошатн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модели “взаимной гарантии выживания”, стимулируя тем самым готовность нанести первый удар; дл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кризиса развити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дер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может увеличить риск случайной и техногенной эскалации кризис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риводит к потере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процессом эскалации; дл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епрозра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намерений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в области вооружений с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м интеллектом снижает доверие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оронам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постоянному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процесса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кратить диалог и обмены между во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укрепи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оверие и создать сообщество интерес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лучшить систему управления,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механизмы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механиз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ризисами и механизмы этического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ть се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концеп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ъединяющую различные сил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акие как научные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оенный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истем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СШ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责任编辑 苟利武)

《俄罗斯研究》2022 年总目录

2022 年第 1 期（总第 233 期）

- 3 齐卫平 / 《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认知的建构
- 21 崔雯怡，童珊 / 胸怀天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 37 胡德坤，徐广森 / 超越旧金山体制，搁置领土争端，走向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胡德坤教授访谈
- 65 余伟民 / 制度与人：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辑
- 84 冯绍雷 / 欧洲对抗与亚洲突围——全球转型中的欧亚新博弈
- 92 曾向红，尉锦菠 / 中断还是反复——“颜色革命”中的路径依赖
- 124 沈 陈 / 对冲策略抑或功能合作？——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议程论析
- 143 曲文轶 / 经济增长恢复、刺激模式退出、气候行动开启——2021 俄罗斯经济述评
- 164 万青松 / 2021 年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中的新调适

2022 年第 2 期（总第 234 期）

- 3 钱乘旦，刘 军 /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
- 20 赵可金 / 当代俄罗斯研究的核心问题、范式演变与发展趋势
- 40 汪诗明 / 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
- 62 刘军梅 / 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
- 89 孙 祁，尤利娅·哈里托诺娃 / 数据主权背景下俄罗斯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特点及趋势
- 108 徐 乐 / 从地理形象的重塑看俄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
- 128 李 暖 / “转向东方”：俄罗斯东方学视野中的广州航道与海洋空间建构
- 159 葛静深 / 能源与当代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一项基于互文性话语框架的实证研究

2022 年第 3 期（总第 235 期）

- 3 杨洁勉 / 中国共产党国际时代观的百年发展和深远意义
- 20 王 战，李永全，姜 锋，于运全，徐明棋，冯绍雷 / 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55 韩 冬，钟 钰 /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及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响应
- 81 施 越 / 俄帝国史与古今之变：以近代俄罗斯与中亚草原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 109 孙 超，吴 靖 / 中立身份下的战略选择——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与能源战略

- 140 郑永旺 / 从三部古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看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思维
170 刘雅悦 / “神话”的祛魅与重塑——当代俄罗斯的别林斯基研究

2022 年第 4 期（总第 236 期）

- 3 沈志华 / 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
50 信强，余璟仪 /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安全竞争
76 庞大鹏 / 俄罗斯国家观念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99 王志，屈佳荣 / 国家建构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
127 白雪冰，王萍，周应恒 / 俄乌冲突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151 苟利武，张君荣 / 乌克兰难民危机研究

2022 年第 5 期（总第 237 期）

- 3 赵可金，刘军 /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空间——赵可金教授访谈
31 刘娟 / 一级学科背景下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模式构想——基于俄罗斯高校“域外区域学”课程建设经验
52 许涛 / 从维护睦邻安邻关系到构建安全共同体——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30年
74 李建民 / 中国与中亚经济合作 30 年——政策演进、重点领域进展及未来发展路径
95 宋伟 / 追求承认的斗争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
118 焦一强，丁传彪 /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变化态势、动因及影响
148 费海汀 / “权力再集中”：俄罗斯政治趋势分析
170 朱积慧，杨康书源 / 俄罗斯的复合型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

2022 年第 6 期（总第 238 期）

- 3 吴志成，戴长征，方长平，袁正清，郭锐，黄鹏飞，信强，梁斌 /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家安全、全球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4 理查德·萨克瓦 / “政治的西方”与“政治的东方”——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根源
60 黄晨 / 现代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国内与国际秩序
87 门镜 / 欧盟与俄乌冲突：困境与出路
107 宋黎磊 / “海间联邦”构想与波兰外交思想溯源
129 熊启跃，赵雪情 / 美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逻辑、影响及启示
157 张煌，杜雁芸 / 俄美军用人工智能竞争的战略稳定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2年第6期(总第238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 元